执政党论

ZHIZHENGDANGLUN

权伟太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3年度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哲学社会科学
重点学术著作资助项目

执政党论

权伟太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执政党论/权伟太著.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11
ISBN 7—80199—134—6

Ⅰ.执… Ⅱ.权… Ⅲ.执政党—研究—世界
Ⅳ.D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8704 号

书　　名:执 政 党 论

作　　者:权伟太
责任编辑:一　青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　　编:10008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新丰印刷厂
开　　本:A5
字　　数:280 千字
印　　数:7000 册
印　　张:13.75
版　　次: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80199—134—6/K·97
定　　价:29.00 元

序一　深化对执政党的研究

沈　云　锁

欣逢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之际，权伟太同志的论著《执政党论》即将与读者见面了。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研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而《执政党论》则是在全面比较研究世界范畴的执政党的基础之上，紧紧围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个主题，对加强中国执政党的建设，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作者所研究的主题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主题不谋而合，这充分反映了作者政治的敏锐性和学术的洞察力。

对执政党进行研究是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的课题。在当代，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及其自身建设的重要性，决定了执政党研究的重要性。西方学者一般都根据西方政党运行的政治环境偏重从政党的功能上对政党进行研究，往往回避政党的阶级性，对政党的实质不予揭示；近年来，西方政党和政党政治方面的研究成果大量问世，而对执政党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极少。我国学者往往注重对中国共产党党史、党建的研究。苏东剧变后，很多学

者开始关注研究苏东执政党剧变的原因、教训，并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予以比较，出版了大量的产生了一定影响的理论成果。特别是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加强“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研究”后，全国掀起了学习和研究执政党建设理论，探求执政党建设规律的高潮。

从国内外研究现状看，人们对政党和政党政治进行比较研究的较多，而把执政党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对不同类型的执政党进行比较系统研究的较少；对有关执政党问题的研究，研究成果大多以论文的形式予以发表。在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新的历史时期，把西方执政党、发展中国家执政的民族民主政党、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和中国执政党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形成对执政党的特定内涵、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机制、执政方略、执政资源、执政环境和执政党的建设等的共性认识，对其差异性进行区分，形成执政党特定理论结构体系的研究，显得十分薄弱。这种状况无论是与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发展，还是与中国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及党所肩负的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的实际来说，都是不相适应的。因此，对执政党问题进行研究，探询执政党执政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对执政党结构体系给以科学的构建，对加强中国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就显得尤为重要。权伟太同志的论著《执政党论》是对这一工程做出的重要尝试。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该著作是一部有关执政党研究的开拓性著作。

尽管研究世界上纷繁复杂的执政党确实有很大难度，权伟太同志在全面掌握国内外政党研究概况和动态的前提下，选择新的视角，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对有关问题处理得当，立论稳妥，论述严谨，观点鲜明，有根有据。作者注重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深入考察了世界范围内执政党的分类、性质、职能、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执政机制和执政方略，形成了完整的关于执政党的理论体系，探索执政党执政的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并系统论述了中国执政党的建设和执政党的党际关系。这样，就既考虑到了执政党的内政问题，又兼顾到了执政党的外交问题，使内政和外交相得益彰。文中对现有的三种类型执政党的共同性、差异性的比较分析、对中国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阐述有独到之处，是一个突破；历史地、客观地总结中国执政党同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关系的经验，实事求是地指出以往实践中的弊端，提出了改革思路；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中国执政党执政方略的科学概括，是一个独到的见解；从意识形态、有效性（政绩）和制度几方面论述合法性，角度比较新，也抓住了根本；从政绩合法性的困局、主流意识形态的淡化和腐败损坏执政党的形象三个方面论述、探讨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危机问题，论述得很有深度，发人深思。

权伟太同志人品好，悟性高，具有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宽广的知识，相当高的文字素养和科学研究能力。相信他在今后的学习研究工作中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

《执政党论》被江苏省评定为该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术

著作出版资助对象而出版。对此，权伟太同志非常感谢。作为他的博士生导师，我也表示由衷的感谢。

2004年9月19日于中国人民大学

序二　勇于创新的力作

崇　庆　余

江泽民关于“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的论述，高度概括了创新的重要性。对于社会科学著作来说，创新是其生命力和价值的关键性因素。权伟太的《执政党论》就是一部富于创新精神的具有创新价值的理论著作。

一、题材重大，价值重要

政党在政治活动中的重要性，决定了政党研究的重要性，执政党在执政国家和地区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关键性，就决定了执政党研究的重要性。权伟太同志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抓住执政党研究这个重大题材进行深入研究，穷数年之功，拿出了《执政党论》这本很有分量的专著，无疑是做了一件很有价值的事。

党的事业历来是与党的建设密切相联的。前者是后者存在的理由和目的，规定了后者的内容和任务，后者则是围绕着前者来进行的，是前者的保证和前提。因此，要使党的事业不停顿，党的建设就不能停顿，要把党的事业顺利推向前进，就

必须把党的建设推向前进，而要把党的建设推向前进，就必须认真研究我们的党，特别要认真研究现在作为执政党的我们的党。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执政党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她就始终是以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为其奋斗目标的。党领导人民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相继夺取政权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一部中国现代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建国前作为革命党，还是建国后作为执政党，都是合格的，是得到人民衷心拥护的。而党所以能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党始终能够做到与时俱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始终能够走在时代的前列，始终明确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所肩负的历史任务。但是，我们党无论在建国前作为革命党的合格，还是建国后作为执政党的合格，并不能必然保证党今后执政的继续合格。因此，我们党必须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积极主动地根据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从时代的发展要求审视自己。因为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受到外部封锁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即已经从领导革命的党转变到领导建设的党，从在野党成为执政党，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要求党必须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加强研究党的执政内涵、执政能力、执政方略、执政方式、执政规律等方面的研究，则是党进一步解决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

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这两大历史性课题的能力所必须的。当前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社会生活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给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带来了深刻影响，给我们党掌好权、执好政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党必须在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已经深刻变化的新情况的基础上，把自身建设好，使我们党真正做到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进而始终成为一个得到人民衷心拥护的合格的执政党。

从世界上的情况来看，自政党在300多年前成立伊始，就成为进行政治活动、实现政治目的的核心组织，在政治、政权、政府的运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现在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除20多个外，都是政党执掌政权，都是实行政党政治的。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党作为执政党，都在它所执政的国家或地区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中起着巨大的和关键性的作用。其中许多国家政党在朝在野的变化、政权的更迭、民意的变迁，是一面宝贵的镜子。我们要利用好这面镜子。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制度、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不同，各国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执政方法、执政机制等方面会有很大的不同，但作为执政党都处于执政地位，都面临着巩固执政地位的任务，这些都是共同的。这就必然使各国的执政党的执政和建设，反映出一些普遍性的规律。这些共性的东西，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研究世界各国执政党的共性，大胆借鉴一些普适性的共性的规律性的东西，对作为执政党的我

们党来说会有许多有益的启示。

因此，进行执政党研究，对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意义。执政党研究题材的重大，决定了执政党研究成果价值的重要。

二、多有新意，原创性强

《执政党论》一书最值得称道之处，就是它浓厚的原创性。

这种原创性，首先表现在《执政党论》的开拓性。就国际上对执政党研究而言，应该说自政党出现以来，政党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推动着政党研究的发展，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对党的性质、地位、作用、任务等方面都有大量的论述，为我们正确认识执政党提供了指南。但那些关于执政党的论述主要是关于革命党论述的，就是关于执政党的论述，也主要是从宏观上论述的。这主要是当时时代和实践局限所致。自政党成立以来，在国际上也还有一些学者发表了一些关于政党的研究成果，当中也有部分内容涉及执政党，但往往都是就执政党的某一方面而言的，或某一国家而言的，而且是浅尝辄止的，缺乏对执政党专门的系统研究，特别是缺少对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专门的系统研究。就国内对政党研究而言，在1990年代末开始就陆续有一些著作问世，特别是2000年2月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要求后，出现了一些颇有影响的著作，如周淑真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等。这些著作对执政党也有不少论述。但这些著作的主题毕竟不是专门对执政党进行研究的。尽管也有个别著作专

门研究执政党的执政规律,还有个别著作对执政方式进行了研究,但均不能称之为对执政党的全面研究。个别著作对执政方式进行了专门研究,但也不能称之为对执政党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研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迫切需要对执政党进行全面系统的有深度的研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论》一书问世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就对执政党研究的全面和系统而言,《执政党论》可以说是一部开拓性的著作。读者一卷在手,便可以将关于执政党的基本问题了解清楚。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执政党论》是一本集国内外执政党研究成果之大成,又加上作者本人大量研究的新认识,而形成的一部具有独特原创价值的著作。所以当我拿到《执政党论》这部国内关于专门研究执政党的第一本著作时,便立即感到它的沉甸甸的分量。充满创新精神和富有创新价值,是《执政党论》一书的根本价值之所在。这也许是《执政党论》被确定为江苏省2004年度重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资助专项基金资助的主要原因吧。

其次,多有新意也是构成《执政党论》原创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执政党论》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写作的,但不是照搬照抄后的简单诠释,而是力求从时代的高度和客观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和新问题,得出反映新的真实情况的新认识。比如,《执政党论》一书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核心是保持党的先进性,指出“执政党的先进性是一个从根本上关系到党的性质的问题,也是关系其能否巩固执政地位的根本问题。保持党的先进性,

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永恒的主题。抓住先进性，就抓住了党的建设的主题，就抓住了有关执政党生死存亡、国家前途命运和社会发展的关键"。这一段论述无疑是有见地的。《执政党论》在分析了世界上一些政党虽然保持了持续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但却丢掉执政地位的史实后，得出了作为执政党，简单地靠发展经济的政绩来作为执政党合法性的基础是靠不住的，况且一国的经济发展不仅受国内，而且要受国际因素的影响，有时不是本国自己所能决定的重要结论。即使国内经济发展很快，也不能必然保证合法性，必须要有政治民主的保障，由此得出了"把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寄托在经济长期快速增长上是不明智"的警世之语。《执政党论》在论证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时，重点阐述了制度的作用，认为科学的制度是执政党执政合法的最重要的基础。其中在分析邓小平对制度重要性的论述后鲜明地指出：当执政党的制度无法反映民众的要求时，民众就会对执政党的代表性产生怀疑，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就会受到损害。文中还具体指出了执政党奉行的科学的制度，包括国家的民主制度和党内的民主制度以及确保党在宪法内活动的制度等。

三、体系完整，结构严谨

一本好的理论著作是否有分量虽然取决于许多因素，而以中心论点为内核的全书体系是否完整和结构是否严谨，则是一个重要因素。《执政党论》一书可以说是体系完整和结构严谨的。

就全书的宏观而言，全书紧紧围绕执政党执政这个主题展开论述，首先从执政党的特定涵义、类型、性质和职能的解读入手，对执政党进行了精辟的概论，接着就对执政党至关重要的执政合法性问题进行了层层论述，继而对执政党的执政机制（即如何处理党与议会、政府、司法部门的关系）、如何实施执政战略，如何建设一个合格的执政党等执政党必须解决好的一系列重大内政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最后则以对执政党的党际关系进行详尽论述作结。这样一个体系，就将执政党所必须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的基本的内政外交问题都包括了。

就全书的中观而言，每章的结构都很严谨。比如执政党的党际关系一章，分别从执政党党际关系的相关因素，执政党党际关系的目的作用和原则、执政党与其他国家政党的关系、执政党与本国其他政党的关系等方面展开论述，并对其中每一方面都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体现出很强的逻辑力量。

就全书的微观而言，每一节也堪称体系完整和结构严谨。比如第六章的执政党党际关系的相关因素分析这一部分，就分别从党际关系与国际环境，执政党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党际关系与意识形态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四、视野广阔，方法科学

《执政党论》一书放眼全世界的执政党，进行宏观的高屋建瓴的研究，视野相当广阔。由于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是由政党执政的，因此从事执政党研究这个课题就必然

要观照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执政党。这就要求广泛涉猎相关的资料,并进行深入的研究。可以看出,作者在收集国外执政党的相关资料方面是下了长功夫、真功夫和实功夫的,同样在研究方面也是下了长功夫、真功夫和实功夫的。由于作者视野广阔,就有了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得出规律性认识的条件。这就为在将世界上的执政党进行科学分类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进行重点研究提供了基础,也就为综合分析执政党的性质和职能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全书的全局把握和局部分析以及开合自如创造了前提。

由于《执政党论》一书所承担任务的繁重性和内容的庞杂性和宏观性,必然对研究方法提出了特殊的要求,采用一种研究方法是不够的,必须根据每个章节的情况,运用适宜的方法。因此,作者分别运用了比较分析法、阶级分析法、综合分析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法、历史与逻辑相结合法、结构一功能方法等多种方法对相应材料进行充分研究,从而保证了研究结论的可信性和阐述的说理性。这些都大大加强了《执政党论》一书的理论力度和思想深度。

当然,《执政党论》一书作为一本具有原创性价值的著作,也必然会有一些不足之处。比如说该书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对确保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水平提高的作用阐述不够。又如对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的论述有些薄弱等。但瑕不掩瑜,作为一块引“玉”之“砖”,《执政党论》一书所具有的独特的社会价值和比较高的学术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2004年8月于南京

目　录

导 言

放眼世界，环顾当今，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加强；经济全球化以不可阻挡之势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以波涛汹涌之势席卷而来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日益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其触角已达世界的各个角落，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已不同程度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在此宏观背景下，目前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除20多个国家和地区外，均实行政党政治。代表不同社会阶级利益并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各类政党空前活跃。有些政党不仅在本国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地区乃至国际事务产生着重大影响。执政党作为执掌国家政权的党，在各国政党政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0世纪末期，世界政党政治中最为引人深思的现象是，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曾经单独连续执政的大党纷纷丧失了执政地位。譬如：自1955年起持续执政达38年之久的日本自民党在1993年7月的大选中败北，结束了其一党单独执政的历史；作为拉美地区第一大党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连续执政71年后在2000年7月的大选中惨败，党的候选人得票率仅为33.18%，从而沦为在野党；成立于1885年、领导印度人民取得民族独立并长期领导印度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深得印

度人民信赖和拥护的百年老党印度国大党，在执政45年后，于1996年5月失去了其在印度政坛的霸主地位，痛失执政权(2004年5月东山再起，重获执政权)；中国台湾地区的国民党是一个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党”和在台湾执政半个多世纪的“执政党”，在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被成立仅14年的民进党一举击败，失去了“执政”地位；苏联共产党是成立于1898年、执政达74年、有1800万党员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竟因叶利钦1991年8月23日发布禁共令，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便于次日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解散苏共，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苏共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解散了；东欧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也在执政几十年后分崩离析，要么变质，要么解散。从1999年前后在原欧盟15国中的13个国家同时执政或参政的西欧社会党(社民党、工党)在大选中纷纷落马，目前只在英、德、希、比、芬、瑞典六国执政或参政，失去在政坛的主导地位，成为近几年来西欧政坛引人关注的现象。这些情况很值得我们深思、研究：为什么这些执政党会失去执政地位？这些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有什么共同规律？

与上述执政党情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古巴共产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等一些执政党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充满着勃勃生机，得到本国人民的拥护和爱戴。拥有6800多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二〇〇一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九万五千九百三十三亿元，比一九八九年增长近两倍，年均增长百分之九点三，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六位。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①。2002 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了 10 万亿元大关，外商直接投资达到 510 亿美元，排名世界首位。2003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 116694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9.1%，是 1997 年以来增长最快的年份。在遭受非典疫情和频繁发生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取得这样的成绩确实是来之不易的。按照现行汇率计算，2003 年我国 GDP 总量相当于 1.4 万多亿美元，人均达到 1090 美元。标志着中国走出低收入国家行列，意味着国民经济迈上一个大台阶。我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七位，对外贸易额居世界第四位，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二位，利用外资数额居世界第一位。现在中国共产党正领导中国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阔步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古巴共产党带领古巴人民顶住美国一次又一次的反古风潮，克服苏东剧变后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困难，与人民群众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党群关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自 1959 年以来，连续十一次获得大选胜利，一党连续执政已达 40 多年，领导新加坡人民建设自己的家园，使新加坡经济快速发展，跻身“亚洲四小龙”，形成了廉洁高效的政府，取信于民的执政党。这些执政党与失去执政地位的执政党相比，同样值得我们深思、研究：缘何这

①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 页。

些执政党会巩固执政地位？它们成功执政的经验有哪些？执政党执政的规律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作为"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①]，要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加强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就必须深刻认识和吸取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失去执政地位的教训，特别是"一些长期执政的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教训"[②]，"认真总结党在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长期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研究和借鉴世界上其他政党治国理政方面的有益做法"[③]。"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④]。通过我们的研究，深化对党的执政规律的认识，完善党的执政理论体系，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立在对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和自觉运用的基础之上。

一、研究执政党问题的重要意义

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及其自身建设的重要性，决定了执政党研究的重要意义。具体说来，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08 页。

②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18 页。

③ 李长春：《在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 年 8 月 5 日。

④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日报》，2004 年 9 月 27 日。

执政党研究的重要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对各国执政党进行比较研究，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科学的执政党理论体系，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建设

不同国家的执政党制度及执政理念是不同的。西方国家的执政党制度及执政理念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制度及理念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当然，它与中国执政党的制度与理念在本质上也有天壤之别。本文在对不同国家的执政党，特别是对西方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制度和理念的比较分析基础之上，重点论述中国执政党的制度和理念。

执政党在执政理念、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执政方略、执政机制、执政方式、执政功能、执政特征、执政资源、执政环境及执政党的建设等方面都存在着可供我们研究的共性。当然，各国执政党之间也肯定存在着差异，这有待于我们予以厘清。在科学把握各国执政党共性和个性的基础上，构建执政党的理论体系。这有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科学把握执政党建设的规律，搞好党的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1]。我们要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党建思想理论基础之上，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宝库。

（二）通过执政党问题的研究，了解和借鉴其他国家执政党制度和理念中对中国共产党可资借鉴的因素，有利于提高

①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日报》，2004 年 9 月 27 日。

党的执政能力，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执政党取得执政地位，必须取信于民，提高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增强党的群众基础，以此加强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要达到这种状况，就必须正确处理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党与非执政党和社会组织的关系；必须发扬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依法治国；必须具有廉洁高效的政府，德高望重的领袖，等等。而这些情况的取得，必须依靠执政党的执政能力。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的党，党的领导要通过执政来体现。我们必须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①]。“采取正确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带领人民紧跟时代潮流、不断开拓的执政党，必须具备的能力”[②]。我们的各项工作能否做好，我们能否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掌握主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能否成功，党的最高纲领最终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下，“我们必须继续围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③]。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已有 50 多年的历史，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领导方式和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 页。
②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84—485 页。
③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97 页。

领导方法，同时不断根据实践的发展和改革创新，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战略方针，党的十六大又提出要“依法执政”。但是，党在执政的实践过程中，依然存在着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人治大于法治等状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更好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如何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如何建立新型的党群关系；如何提高党和国家各级工作人员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如何建立既能确保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的法律制度和监督机制，又能充分发挥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和执政水平；如何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把法治原则贯彻于党的全部决策活动、授权活动、执政方式的过程之中，等等。这些都需要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提高。对此，其他国家执政党建设和执政的成功经验，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有很多借鉴作用。正如胡锦涛同志在 2004 年 6 月 29 日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所指出的：“对世界上其他政党执政的一些做法和措施，我们不能照抄照搬，但对它们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有益做法，我们要研究和借鉴，以开阔眼界，打开思路，更好地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规律。”[1]

（三）通过执政党问题的研究，总结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愈加认识到“三个代表”重要思

① 《认真总结执政能力建设经验 大力加强党的理论建设》，《人民日报》，2004 年 7 月 1 日。

想的重大意义，更加坚定我们深刻地理解和自觉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决心和信心

执政党的地位巩固与否，是与执政党领导国家所取得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家的综合国力相关的。

1. 理论纲领是执政党的立党之本，大凡执政党，都把其理论纲领作为公开树立起来的一面旗帜，作为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执政党在执政实践中，既要保证党的理论纲领和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又要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顺应时代潮流，及时予以调整创新。

2.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富民强国为己任是任何执政党的执政之基，尊重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规律，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是任何执政党谋求发展、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举措。政党之所以能够取得执政地位和连续执政，大多是以其经济业绩作为基础的。苏东国家共产党兴衰沉浮的经验教训昭示我们，执政党必须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尊重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规律，把握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趋势和要求。西欧社会党在1999年时，共在14个国家执政或参政（在原欧盟15国内有13个社会党执政或参政），刷新了社会党执政的历史最高记录。而近几年来大多数西欧社会党却失去了执政地位或参政地位。尽管导致这两种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其在执政期间经济发展速度和所取得的政绩不同，是其兴衰的重要因素。

3. 扩大同群众的联系，关注大多数群众的利益，是执政党的力量之源。执政党与群众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党的形象和政治影响力。“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许多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

验教训，充分说明了执政党与群众关系的重要性。譬如在2004年5月结束的印度第十四届人民院选举中，印度主要反对党国大党出人意料地击败执政的全国民主联盟，赢得选举胜利并组阁执政。在野八年后，国大党终于重整旗鼓，重新进入久违了的总理府。之所以说这次选举结果出人意料，是因为执政的全国民主联盟在瓦杰帕伊的领导下，在经济和外交上均取得了较为瞩目的成绩，并且在大选前的多次民意测验中，以印度人民党为首的全国民主联盟遥遥领先于国大党。那么，一直普遍被看好，而且信心十足的全国民主联盟为何败北，由沉寂多年的国大党取而代之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群众抛弃了全国民主联盟。在政府的经济改革中普通百姓没有得到实惠。尽管全国民主联盟大力宣扬"印度大放光芒"，称经济增长迅速，印度软件业世界第二等等。但许多选民认为，所谓的"大放光芒"实质是一场华而不实的"政治秀"，经济增长并没有给广大普通百姓带来看得见的实惠，没有使他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特别是在广大农村，许多地方至今连水电和食品等基本生活必需品都没有保障。这次选举的投票率仅为56%，许多得到改革实惠的中产阶级并没有积极参加投票，倒是广大工人农民成了这次选举的主力军。事实证明，执政党不能只搞表面文章，眼睛盯着所谓的精英和中产阶级，而是要扎扎实实地深入基层，了解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百姓的想法，这样就不会脱离群众，阴沟里翻船了。

通过对执政党问题的分析和研究，我们越发感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之所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

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中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中国执政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通过对其他国家执政党的比较分析，我们越发感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先进性所在，定会增加我们自觉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决心和信心，真正做到“不断增强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牢固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党一切工作中的指导地位，自觉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中继续创造新的辉煌。”①

（四）通过执政党问题的研究，比较分析西方国家执政党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本质、特征，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多党制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决不能实行多党制

西方多党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本质是西方多党制形成和存在的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政党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也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由于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及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的特点所决定，西方国家实行了多党制。处于执政地位的政党不仅受控于垄断资本集团，而且是垄断资本集团利

① 《胡锦涛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学习读本》，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3 页。

益的总政治代表。各政党为了取得执政地位，互相谩骂，互相揭丑，金钱收买，造谣恐吓，暴力暗杀，不一而足。在资本主义国家，上台执政的资产阶级政党只是代表本阶级和某些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执政党的作用，就是调解资产阶级内部各阶层、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缓解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维护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有什么好处？那种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它们谁也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这种状况是它们的弱点而不是强点，这使它们每个国家的力量不可能完全集中起来，很大一部分力量互相牵制和抵消。"[1]但是，长期以来，很多西方的政治学家一直讳言西方政党的阶级属性，宣扬政党的超阶级性和"民主性"、"国民性"。其目的就是掩饰资产阶级政党对国家统治的实质，为其披上民主政权的漂亮外衣而寻找的托词。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西方的多党制本质不同，具体运作的方式方法也有很大差别。这种政治制度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惟一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体制。它能克服西方政党制度的党派倾轧、政权更迭、社会动荡、工作效率低下等弊端，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有些人脱离中国国情，主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67 页。

张照搬西方多党制，是不明智和错误的。不同的国情应当实行不同的政党制度。目前世界各国政党制度的类型有多种，但不论是哪种类型，比如一党制、两党制还是多党制，都是根据本国具体情况而定的，而不能想当然凭主观臆断。就是同属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由于政治文化、历史传统不一样，其政党制度和政党政治的具体形式也不完全一样，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固定的、到处都适用的模式。在中国，不存在实行多党制的条件，多党制是与中国国情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违背的，是根本行不通的。江泽民明确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要把十二亿多人的力量凝聚起来，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前进，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否则，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四分五裂，不仅现代化实现不了，而且必然陷入混乱的深渊。"①通过对执政党问题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得出明确的结论：在中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是不容置疑的，决不能搞多党制。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

人们对执政党问题的研究，是从政党和政党政治问题的研究开始的。"政党和政党政治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性的世界现象，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和研究。"②

自从世界上最早的资产阶级政党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08页。

② 参见张小劲：《关于比较政党研究基本路径的历史考察及其思路》，《政治学研究》2002年第3期。

成立至今，政党的产生已有330多年的历史了。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大批社会主义政党在19世纪开始诞生。政党问题进入西方学者的视野并成为学术研究的主题则是随着政党组织的普遍发展而发生的。相对而言，早期的论著主要以单一国家的政党为对象，集中描述某一政党或某几个政党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意识形态立场，因而缺乏必要的分析力度和理论构建。像洛威尔在1896年发表的《大陆欧洲的政府与政党》[①]一书，便是以历史记录为主的研究著作。1902年俄国奥斯特罗果尔斯基发表了《民主政治与政党组织》一书，比较研究了最早出现政党政治的英国和美国的政党，就政党的组织结构及其与民主原则的关系问题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1911年德国米切尔斯出版了《政党论：现代民主制寡头趋势的社会学分析》一书，集中比较了德、法、意三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他对政党组织的内部问题、不同政党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及政党与政府的问题等等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著名的"寡头政治铁律"的论断。二战后，比较政党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法国迪韦尔热率先出版了《政党概论：现代民主国家中的政党及其活动》一书，继承了米切尔斯的思想，以政党的组织结构和政党制度作为中心，全面论述了政党的历史来源、组织结构、政党与领袖等主题，深入探讨了政党制度的分类、政党竞争的相互关系以及政党制度与一般政治制度之间的关联性等问题。他认为，政党是任何现代民主政体所不可缺少

① A. Lawrence Lowell, Governments and Parties in Continental Europe, 1896.

的，政党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运行方式。尔后，在有关比较政党研究的专题性成果较为丰富的基础上，综合性的研究著作脱颖而出。萨托利 1976 年出版了《政党和政党制度》第一卷、安杰洛·帕诺比昂科 1982 年出版了《政党概论：组织与权力》以及同一年由列昂·爱泼斯坦论著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都是在宏观理论和基本观点方面均有所创新的学术著作。除此之外，西方学者在政党比较研究方面还有大量的专题研究著作和文集。近年来，政党和政党政治方面的研究成果大量问世。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执政党建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中，党的建设学说虽然从未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与范式，却一直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领导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核心力量是各国共产党。每到世界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发展的重大历史关头，各国马克思主义者都会首先高度关注，努力解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基本理论问题，而且与时俱进，先后取得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学说的一系列科学认识成果。但是，放眼整个世界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建设始于马克思、恩格斯，成于列宁，再成于毛泽东、铁托、金日成、胡志明等等，堪称硕果累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却一直不够成功。

马克思、恩格斯既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创立者，又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的奠基人。他们在亲自参与创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中写下了诸多著作，特别是在《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和《哥达纲领批判》等论著中，提出了一整套

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理论。他们既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如何加强党的建设、实现党的领导作用,又对于党夺取政权以后的任务以及执政后如何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开创了共产党执政理论的先河。他们明确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首要任务是掌握国家政权;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①;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要防止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无产阶级政党要为执政培养造就本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等等。由于当时工人运动的不成熟,马克思主义刚刚被大多数工人政党所接触,真正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实践也刚刚树起《共产党宣言》这面旗帜不久,马克思恩格斯不得不通过种种理论、政治的妥协方法,不断地使一些首先觉悟的工人政党大致接受马克思主义为其政党建设的前进方向和整个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基础,以至即使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西欧工人政党中的改良妥协的工联主义、机会主义之风也是余风不衰。同时,欧洲也成为了伯恩斯坦开创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故乡,并且深深浸渍了一度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欧洲社会民主党。欧洲,特别是西欧资本主义在世界发展格局中"先行一步"所取得的巨大利益及其所造就的早就为恩格斯所厌恶的欧洲工人阶级的"贵族化"、"贵族性",极大地侵蚀了欧洲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战斗性与革命性,导致西欧和北美的工人阶级基本选择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缔造者的列宁,在领导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党和人民同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各种机会主义派别的斗争中，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基本原理，结合苏联共产党执政初期的基本经验，研究和提出了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的基本经验。列宁根据执政党要掌握国家政权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国家客观形势的变化和党所肩负的历史重任，明确提出了党的建设目标：要把党建设成为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部队，建设成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领导者。执政党要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本色，在实际工作中，要坚持党员标准，时刻注意纯洁党的队伍，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作坚决的斗争，制定严格的监督检查制度；执政党的中心任务是领导经济建设，要正确处理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党要从经济建设的特点出发，按经济规律办事，执政党要成为管理国家、管理经济的内行；执政党要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要充分认识执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性，克服官僚主义和反对特权是执政党面临的重要任务；要坚持党政职能分开的党政关系原则和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组织原则，加强执政党的团结和统一，反对派别斗争，反对分裂。列宁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内容相当丰富，这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学说在执政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是为各国共产党所留下的宝贵财富。可惜天不假年，在党的建设方面相对比较清醒、比较明智、比较民主、比较开明和比较有活力的列宁在引导苏俄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刚刚开始思考和探索解决社会主义执政党最先遭遇到的某些重大问题时，就被刺受伤而重病在身，并在不久后去世。

斯大林在捍卫和发展列宁主义党的学说的基础上，继续

坚持对执政党建设的探索。斯大林在社会主义执政党建设方面，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他坚持了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强调党的组织性和战斗性，用30年左右的时间把苏联建设成为世界上第二位的工业强国，也意识到党政关系等一些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特殊问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斯大林在党的建设和党如何执政问题上产生了很多失误，给苏联共产党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建设造成了负面影响，所造成的危害也是极其严重的。斯大林不能全面理解列宁从夺取政权的党的建设模式转到社会主义执政党的建设模式所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及其总体思路，并把布尔什维克在夺取政权年代的某些特殊做法固定下来，且长期拒绝改革，逐渐形成了高度集权、脱离群众、僵化守旧甚至残酷无情的特殊政治集团，根本不能真正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更不能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能促使人们从内心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认同感，从而根本无法赢得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爱戴和支持，也就不能应对时代和社会发展带来的挑战，一有风吹草动，顿时土崩瓦解，亡党亡国。苏联社会主义执政党建设是完全失败的。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半个多世纪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执政党建设理论，创立了完整的有中国特色的建党学说。由于执政党面临着新的更加严峻的考验，加强执政党建设极端重要。要增强执政意识，巩固执政地位；执政党的建设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来进行；执政党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用马列主义教育全党；执政党要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健全和完

善民主集中制；执政党要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坚决反对和防止官僚主义，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整党整风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有效形式，初步奠定了执政党整党整风的理论基础；执政党要防止和平演变，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列主义党的建设学说的丰富和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①"正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才建立了这样一个好党。"②可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与实践，使毛泽东最终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正确方向，党和人民的事业都受到严重的破坏。执政党主张"以乱治国"，提倡"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恐怕也只有毛泽东。毛泽东的执政党建设不但不成功，甚至都未能真正完成从夺取政权的党到领导全国建设的党的历史性转变。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初步回答了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执政党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执政党建设的科学理论体系。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从思想、政治、理论、组织、政策等各方面牢牢确立和巩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紧紧扭住"以经济建设

---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4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5 页。

为中心”不动摇的基本原则,领导了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从国内到国际,从理论到实践,从思想到组织,从领导到基层,从政策到制度,真正完成了从一个夺取政权的革命的战斗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到一个在社会主义中国长期执掌全国政权、领导全国建设的社会主义执政党的历史性转变;从一个在封闭状态下领导全国建设的党,到一个在全方位对外开放条件下领导全国建设的社会主义执政党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建设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具根本意义的是,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特别是改革作为“中国第二次革命”,又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方面,使党的建设的经济基础、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鉴于此,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严峻课题,向全党郑重提出“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问题,接着又提出“两个文明两手抓”和“两手都要硬”的指导思想,而且一再强调执政党党风建设的重要性,提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面对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问题、新挑战,作为一位老成谋国、洞察力极强的伟大政治家,邓小平同志始终不敢有丝毫的松懈与疏忽。从拨乱反正,到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提出和部署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邓小平的执政党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执政党建设真正走向成熟的开始。但是,一方面,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对党的建设的深刻影响是一个逐渐显露并为人们所认识的过程;另一方面,正如所有站在时代前列指导社会前进的伟大人物一样,邓小平也只能首先重点解决他所直接面对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问题,对

于更深层次的以改革的精神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特别是根据在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中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全面提出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划时代的建设纲领，他显然一时无法“全面”及时地顾及。再则，邓小平的思路本来就是“由经济而政治”的渐进式改革路径，党的建设与改革这样尖端而敏感的课题，显然不可能很快着手解决。更何况，如何在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是一个摆在全党面前的全新课题。包括邓小平在内，全党上下对此都缺乏足够的思想和理论准备，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对“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的总结虽然暂时告一段落，达到一定的理论和历史觉悟水平，但是对苏东剧变的历史反思则刚刚开始，尚缺乏足以形成全党共识的理论和实践条件。即使在全力积极推进改革开放的党的领导人中间，对此也存在种种不同的主张和认识，党的建设实际上也处在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结果导致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政治风波。邓小平晚年岁月的全部智慧与精力不得不集中到捍卫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领导集体交接班、正式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些更为迫切的政治课题上来。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在世纪之交这一伟大变革时代，以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大无畏的理论勇气和旗帜鲜明的政治胆识，站在新时代、新世纪和世界各国特别是社会主义各国执政党成败兴亡的历史和理论高度，高屋建瓴，气势万钧，思路如虹，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丰富和发展执政党建设理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江泽

民十分重视并认真解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根本问题,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与时俱进,坚持执政为民,保持了党的先进性。他坚持党的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明确提出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和灵魂,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全党要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牢牢把握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建设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形成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层;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活力和团结统一;从攸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出发,强调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开展以"三讲"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切实做好党的基层党建工作,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江泽民关于执政党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纲领、目标、主题、任务、方针、途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认识和发展达到了新的境界,是中国共产党面向新世纪的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如同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为社会主义中国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体制转型、社会转型的闸门,开通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进程一样,江泽民2000年2月提出的"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则以同样的历史责任感，同样的历史承担，为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开通了以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建设和改革开放为焦点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伟大道路。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加强党的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可谓匠心独运，而又矢志不移。2004 年 8 月 22 日在邓小平诞辰 10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坚定地指出：“我们要坚持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我们党。要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一步解决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提高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始终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①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年 7 月 23 日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将于 9 月在北京召开，主要议程之一是研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中共中央这样一个决定、这样一种立题、一种主动的姿态，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确切地说，在执政以来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对党的自我完善、国家的自我完善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在中国，对执政党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一个逐步拓展的过程。尽管自 19 世纪 70 年代后期开始，早期改良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就开始关注西方近代的政党政治现象，开始介绍和研

① 胡锦涛：《在邓小平同志诞辰 10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 年 8 月 23 日。

究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学说。但人们真正对执政党问题进行研究，是从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季米特洛夫等人的著作，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文件，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建设的论著开始的。这些研究都是在特定的范围内进行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专门成立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世纪之交，随着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对于世界政党的研究、对于执政党问题关注的范围拓展了，研究的视野开阔了，研究文章和著作大量涌现。很多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党史、党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富有成效的大批的理论成果。苏东剧变后，很多学者开始关注研究苏东执政党剧变的原因、教训，并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进行比较，出版了大量的产生了一定影响的理论成果。

特别是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要加强"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研究"后，全国掀起了学习和研究执政党建设理论，探求执政党建设规律的高潮，有关论著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其中江金权主编的《"三个代表"与党建理论的新发展》（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刘战主编的《实践"三个代表"，巩固执政地位》（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魏泽焕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及其发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吴振坤主编的《20世纪共产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张全新主编的《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李君如主编的《"三个代表"思想教程》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卢先福、端木婕著的《中国执政党建设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刘炳香著的《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研究》(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版)等著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国内外政党进行比较研究是党的研究领域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开世界政党比较研究先河的应该为中央党校的王长江教授。他在1996年2月和9月先后出版了《世界政党比较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和《政党的危机》(北京:改革出版社)两本专著。著名党建专家陈登才教授为其第一部著作所写序言的标题便是《进行开拓性探索性的世界政党比较研究》;中央党校副校长杨春贵教授在为其第二部著作所作的序言中写到:该专著"开拓性地探讨了政党比较研究领域的一些基本问题,富有启发性地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①]。俞邃主编的《外国政党概要》(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对现代政党的历史沿革及其发展趋势进行了阐述,并分别介绍了世界上各种类型政党的概况。周淑真著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论述了政党的起源、发展和基本要素,几种类型政党的主张与基本特征,政党制度的类型与模式比较和中国政党制度的历史探索与当代中国政党政治。梁琴、钟德涛著的《中外政党制度比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对西方主要政党与中国共产党在政党与代议机构的关

① 王长江:《政党的危机——国外政党运行机制研究》,改革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系、政党与政府的关系、政党与人事、司法及军队的关系、政党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傅金铎等主编的《国外主要国家政党政治》(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林勋健主编的《西方政党是如何执政的》(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当代世界出版社组编的《兴衰之路——外国不同类型政党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王长江著的《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王长江、姜跃等著的《现代政党执政方式比较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王长江主编的中共中央党校教学参考书《世界政党比较概论》(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等著作,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不同类型的主要政党权力的获得、执政党权力的运作、执政党权力的制约、执政党执政方式的特点、执政党和一些重要政党自身的建设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实的论述。以上这些研究成果和动态给本论文的研究以很大的启发。

从国内外研究的现状看,人们对政党和政党政治进行比较研究的较多,而把执政党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进行系统研究的较少。对有关执政党问题的研究,研究成果大多以论文的形式予以发表。在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新的历史时期,把西方执政党、发展中国家执政的民族民主政党、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和中国执政党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形成对执政党的特定内涵、执政理念、合法性基础、执政方略、执政机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执政环境和执政党的建设等的共性认识,对其差异性进行区分,形成执政党特定结构体系的论

著，据本人所接触的文献，为数甚少。这种状况无论是与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发展还是与中国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及党所肩负的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来说，都是不相适应的。因此，对执政党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执政党结构体系给以科学的构建，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研究方法

本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对执政党及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进行理论阐释；根据不同国家的执政党，特别是西方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和中国执政党的执政状况，分析、研究不同类型执政党之间的共性及其差异性，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解析执政党的执政机制，探寻执政党执政的规律；揭示中国执政党的执政方略，论证加强中国执政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以期在对执政党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研究基础之上，构建执政党论的结构体系。笔者深知，执政党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它研究的复杂性、艰难性，加之本人学术水平的制约，写好这本书实在谈何容易。

有鉴于此，对执政党问题的研究，最实际的方法，就是根据论著的客观结构，对研究的范围和问题作出适当限定，在不影响论著全貌的情况下，择其要而述之。同时，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力争使本书的研究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关于本书的研究范围

本书根据人们通常理解和便于研究考虑，把执政党分为

三种基本的类型。第一类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执政党。广义地说,这一类型既包括西欧、西南欧各国、也包括北美、大洋洲国家,通常还包括日本。第二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这类国家包括前苏联、东欧各国,以及中国、越南、朝鲜、古巴、老挝等。第三类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这一类型与前两种相比较为复杂,因为它实际上把其他所有国家(除了那些不实行政党政治的国家之外)都包括其中。

本书的研究,就是在上述分类的基础上,既对三种类型差异性进行鉴别,又对三种类型共同具有的共性进行分析;有时是微观分析,有时是宏观探讨;有时对个别国家执政党的特性进行所属类型的探讨,寻求不同类型执政党之间的特殊性,有时同时对多个国家进行分析,寻求同一类型执政党之间的相同性。对这三种类型研究的着重点也不同。对于第一种类型,更多地是从共同的政治理念、政治规则和运作机制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探求执政党的特点和规律。对于第二种类型,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共同的意识形态性,按照统一模式,建立了同样的社会制度,对这种类型国家执政党的分析,以苏共和中共为重点,来探求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和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途径。第三种类型由于国家众多,它们最初在国家发展模式选择上的差异,后在改革取向上的不同以及各国文化背景上的差异,具有多样性。对于这种类型的研究,拟采取解剖麻雀的方法,通过对若干典型国家执政党的分析,归纳出这种类型执政党的一般特性和规律。

由于篇幅所限,对于本应属于执政党研究范围的有关内容,本书有的没有提及,或虽有提及,而未予展开。如关于执

政党与民族宗教的关系问题、执政党与领袖的关系问题、不同国家执政党之间的党际关系问题，等等。

（二）关于本书的研究方法

本书力求在占有大量相关材料的基础上，运用一定的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和遵循一定的研究原则，力争使论述符合科学规范，达到较高水准。本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注重从历史到现实，从深度到广度，从理论分析到实践分析，坚持宏观与微观、横向与纵向、专题与总论、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论证方法，全方位、多层次、多视角、前瞻性地展开自己的主题。具体说来，主要的研究方法有：

1. 比较分析法。对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执政党进行比较分析；把分析的重点放在执政党的共性上；通过比较对执政党的本质和特征进行科学的抽象和提升；比较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和改善中国执政党的建设。

2. 阶级分析法。本书是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因此，在研究方法上，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

3. 综合分析法。本书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综合性课题。必须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从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社会以及国际关系等角度进行综合研究。

4.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比如我们对原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与执政党执政机制关系的探讨，对党内民主建设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关系的探讨等，无一不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方法论。

5.结构—功能方法。该种分析方法的立足点是:即使构成系统的要素和成分相同,但只要结构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功能。这一立足点对执政党问题的研究是同样适用的。把执政党看作一个系统,在此基础上分析系统的具体结构,进而研究具体结构的具体功能。

四、体系结构

全书除导言外,共分为六章。其中第一章至第三章系统地分析、论证有关各个国家、各种类型的执政党在有关问题上的共性和差异;第四章和第五章则是在执政党共性的基础上,针对执政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和建设问题进行专门系统的论述;第六章是对执政党党际关系的系统论述。

导言部分,主要论述了研究执政党问题的重要意义、国内外研究概况、研究方法和论文的结构体系等内容,为全书的总纲和指导。

第一章《执政党概论》,主要论述执政党在一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系统地分析了执政党的内涵、执政党的类型、执政党的性质和执政党的职能。

第二章《执政党的执政基础》,主要论述执政党执政的基础在于其执政的合法性,系统地阐述了"合法性"概念的缘起与内涵;对政治权力的三种主要合法性基础进行了有效的论证;进而分析了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指出了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危机。强调要未雨绸缪,加强中国执政党的建设。

第三章《执政党的执政机制》,强调执政党的执政机制是

有关执政党有效执政的关键问题，系统地论证了执政党与代议机构的关系；执政党与政府的关系；执政党与司法机关的关系。对加强中国执政党的执政机制建设提出了有关设想。

第四章《中国执政党的执政方略》，强调执政方略是执政党治国理政的谋略；它是中国执政党在新的世纪完成三大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是有关中国人民福祉和中华民族振兴的伟大韬略。中国执政党的执政方略主要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执政党执政方略的科学概括；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政治发展战略；文化发展战略；坚持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等等。对执政党的执政方略进行了评价，对部分执政方略的论述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

第五章《中国执政党的建设》，论证了研究执政党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建设。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这个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本章着重论述了中国执政党要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系统论述了执政党建设的核心是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阐释了执政党建设的总目标和总要求，具体强调了要加强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突出强调要加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要加强执政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在执政的整个过程中，都要坚持惩治腐败，取信于民。建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权力运行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第六章《执政党的党际关系》，指出执政党的党际关系包

括广义的党际关系和狭义的党际关系；论证了执政党在与其他国家政党交往过程中所必须考虑的相关因素：国际关系、执政党本身、国家关系、意识形态等；论述了执政党党际关系的目的、作用与原则；分别阐述了执政党国际党际关系和执政党国内党际关系。

第一章　执政党概论

执政党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它是一个国家的核心力量。执政党相对于非执政党而得其名，具有其特定的内涵。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中具有不同的执政党类型。阶级性是执政党的本质属性，各类执政党和各国执政党在党性的表现和要求方面各具特点。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具有特定的职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执政党的内涵

顾名思义，执政党是在一个国家执政的政党。但执政党也是政党，具有一般政党的特性。因此，在论述执政党之前，有必要先对政党作些简要的介绍。

政党是随着阶级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真正近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起源于17世纪70年代的英国，1679年5月，英国议会就信仰天主教的詹姆士公爵的王位继承资格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代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的议员们提出了剥夺詹姆士王位继承权的《排斥法案》，围绕这个法案，英国议会迅速分裂为两派，代表地主和旧贵族利益的保皇派被称为“托

利党”(Tory Party,意为歹徒,是爱尔兰人的责骂语),代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一派被称为“辉格党”(Whig Party,意为强盗,是苏格兰人的责骂语)。由于托利党和辉格党在当时仅仅限于在议会内的辩论和协商,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和行动纲领,因此这两个党还只能算是英国议会内的不同政治派别,只是到了19世纪30年代才逐渐演变为保守党和自由党。和英国情况不同,美国近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形成于北美有了相当程度发展的19世纪20—30年代。它最早的来源则是18世纪中叶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初期,在资产阶级议会中相互争斗着的两个政治派别。美国于18世纪80年代由于在国家结构形式和民众的权力自由保障方面产生分歧,美国议会中产生了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7—1804)为代表的主张国家权力应集中于联邦政府,对人民权力加以限制的“联邦党人”,和以托马斯·杰斐逊(Tomas Jefferson1743—1826)为代表的主张国家权力不应过分集中,实行地方分权制,并要求把人民的权力用宪法的形式予以确定的“反联邦党人”。两党于19世纪30年代逐渐演变为民主党和共和党。19世纪欧洲发生了几次大的工人运动,标志着无产阶级作为一支新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成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近代政党在英、美两国形成以后,陆续在欧美各国建立,并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

由于现实中的政党及政党政治的千差万别,加之世界各国对“政党”内涵的不同理解,关于政党的定义也各不相同。

西方学者一般都根据西方政党运行的政治环境偏重从政党的功能上对政党进行定义。对此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述有："政党是以取得国家权力为目标而基于共同的政策组织和动员国民、开展一切政治活动的持久性的政治团体。"(《日本大百科词典》)；奥·艾普斯坦认为政党是"在一定标识下尽管也许组织松散，但追求当选政府职位的任何团体"[①]。"政党是政治体制内为取得和行使权力的目的而组织的集团"。(《大英百科全书》)；萨托利认为："政党是一种在大选中向政治体系的代表议会同时也向其他政治职位推荐候选人的一种组织。"[②]"政党首先是执行表达功能的表达工具"。"而且还整理，实际上是操纵(manipulate)意见"[③]。日本学者冈泽宪芙认为，政党"在竞争与对抗中发现存在的根据和生命的源泉"[④]。这些论述回避了政党的阶级性，没有揭示政党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从政党的阶级实质出发，根据政党的组织和活动内容，对政党做了全面和深入的分析。列宁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

① Leon Epstein. Political Parties in West Democracies, New York: Praeger, 1967, P9.

② Sartori, G.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63.

③ 荣敬本、高新军主编:《政党比较研究资料》,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18—219 页。

④ 冈泽宪芙:《政党》,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 页。

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①]"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这个先锋队的力量比它的人数大10倍,100倍,甚至更多。"[②]"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③]毛泽东指出:"政党就是一种社会,是一种政治的社会。政治社会的第一类就是党派。党是阶级的组织。"[④]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旨在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以实现其政纲的政治组织。政党代表一定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它为政治斗争而产生,因政治斗争而发展,它是本阶级开展政治斗争的工具。

政党作为近现代社会一种独特的社会政治现象,具有以下基本特征:第一,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目标,以及具体的政治主张和方针政策;第二,有定型的从中央到基层的组织系统;第三,有一定数量的党员和各级领导人,有比较稳定的领导核心;第四,有约束党员行为规范的纪律;第五,通过党组织和党员的各种活动,力争非党群众的支持,力图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以实现自己的纲领和目标。

执政党是指代表统治阶级掌握或领导国家政权、负责组织政府的政党。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政党通过一定形式取得和掌握领导国家的权力以后,便成为执政党。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又称在朝党(与在野党相对),是指负责组织政府(内

①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页。
②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页。
③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35页。

阁),掌握国家行政权力的政党。如在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的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是指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议席或在总统选举中获得胜利并负责组织政府的政党。实行多党制的国家,如果在选举中没有一个政党能够获得多数,内阁就由几个政党联合组成,这几个政党就都是执政党。在有些国家,还存在着中央政府中执政的党和地方政府中执政的党不是同一政党的情况。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其执政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它对社会各个领域实行全面领导。

二、执政党的类型

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国家中的执政党类型往往是不同的。根据各国政党制度的差别,执政党可分为以下类型:

(一)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执政党

由于资本主义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和历史情况不同,执政党的类型也有差异。

1. 一党执政

一党执政是指一个执政党在一个国家长期执掌国家政权。在一党执政的国家,有的不允许其他政党存在和活动;有的虽然允许其他政党存在和活动,却不允许其他政党与执政党争夺政权;还有的国家尽管在理论上其他政党有执政的可能,但在实际运作中没有执政的可能。现代国家的一党执政

有两种形式，一类是法西斯主义的一党执政，一类是民族主义国家的一党执政。

法西斯一党执政，是指执政的法西斯党通过颁布法令和其他强制手段，禁止其他政党活动；实行党政合一的机制，党的领袖兼任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军队的最高统帅，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它"是资本主义国家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表面化、尖锐化后在政治制度上的一种体现"①，是垄断资产阶级无法以资产阶级民主制形式来维持其统治时所采取的一种专政形式和政党制度。最早使用"法西斯"一词的是意大利的墨索里尼。1919 年，他建立了一个名为"法西斯意大利斗士团"的政党，1921 年改组为"法西斯国民党"。尔后，他便发动"进军罗马"政变，夺取政权，废除议会制，自任政府首脑，宣布其他政党和工会组织为非法组织，确立起法西斯一党执政的独裁统治。德国希特勒自 1921 年夺得纳粹党的领导权，成为党魁后，便采取各种手段谋取权力。1933－1934 年，希特勒以纳粹党党魁身份组织政府，并兼任总统和军队最高元帅，集最高权力于一身，开始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日本大政翼赞会军国主义政权、西班牙长枪党的佛朗哥政权以及土耳其、葡萄牙、希腊等国，也都实行过这种法西斯一党执政模式。法西斯一党执政模式已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唾弃。

民族主义国家的一党执政，是指取得民族独立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执政党（主要是非洲国家）长期执政的状况。

① 王惠岩主编：《政治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00 页。

这些国家的具体国情不同，一党执政的形成过程和具体表现也各不相同：一是有的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就是由现在的执政党所领导的。该执政党在国内享有崇高的、绝对的威信。如莫桑比克、几内亚、安哥拉、佛得角、津巴布韦等国。二是有的国家在民族独立后，执政党由多党合并而成。这些政党一般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已经独占了领导权，在独立前经过选举获胜成为独立后的执政党。如坦桑尼亚、科特迪瓦、几内亚、乍得、肯尼亚、喀麦隆、塞拉利昂等国；三是有的国家先通过法令取消全部政党后，重新组建执政党。如赤道几内亚。四是有的国家通过军管，取消一切政党，再组建执政党。如扎伊尔、埃及、索马里、马里、埃塞俄比亚、贝宁等国。五是有的国家在法律上尽管允许其他政党合法存在，并参与竞选和议会活动，但在事实上，执政党长期单独执掌政权，如新加坡和墨西哥等国。

2. 两党轮流执政

所谓两党轮流执政是指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中存在着势均力敌的两个政党，通过在议会或总统竞选中获得胜利成为执政党而相互交替执政。由于实行两党轮流执政的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体不同，执政党执政的经济、政治环境不同，各个国家两党轮流执政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内容也有所不同。现在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实行两党轮流执政的类型主要有三种模式：

第一，以英国为代表的议会内阁制下的两党轮流执政。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制：上议院议员由贵族世袭或国王任命，与政党制度无关。下议院议员由选举产生，两大党靠竞选争夺

下院议员议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成为执政党，组织内阁，执掌政权。获得议会议席数次之者为法定反对党，对政府进行监督和牵制。反对党往往组成“影子内阁”，处于候补政府的状态。在每次议会大选后，如果两大政党在议会中所拥有的席位发生相反的变化，执政党与反对党就相互易位。一党在朝，一党在野，轮流执政的格局即告形成。

第二，以美国为代表的总统制下的两党轮流执政。两个主要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通过竞选总统以争夺执政地位。总统竞选获胜者为执政党，失败者为反对党。美国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国会和总统的竞选分别进行，两者的结果没有必然的联系。两党在议会中席位的多少与执政党和非执政党的地位无关，执政党不一定同时是议会中的多数党。对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竞争，美国著名漫画家汤姆斯·纳斯1824年在漫画中用驴讽刺民主党，用象讽刺共和党，之后驴与象就分别成为两党的标志。

第三，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国家所实行的两党轮流执政。这些国家过去是英国的殖民地，在政党制度方面受英国的影响很大，其政党制度与英国相近。但是也有其明显的特征：反对党的责任和力量都没有英国的那样大；越来越多的政党在议会中能够获得议席，小党的作用越发突出，在大党难以赢得议会多数时，小党的支持往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3.多党轮流执政

多党轮流执政是指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多党并存，各政党依法单独或联合其他政党参加竞选，获胜者成为执政党组成政府，交替进行执政。在议会中只有少数议席和未参加

政府的政党成为反对党。目前,大多数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获得民族独立的一些国家实行多党轮流执政。多党轮流执政起源于法国。尔后,德国、意大利、爱尔兰、比利时、卢森堡、荷兰、丹麦、希腊等国也实行了多党制。多党轮流执政在欧洲大陆国家兴起,是因为这些国家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所致。这些国家社会结构比较复杂,存在多元的利益、思想和宗教,这些多元的利益、思想和宗教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政治主张,从而形成多党纷争、竞相执政的局面。在选举制度上,这些国家普遍实行比例代表制或少数代表制,一些小党也能取得选票和一定数量的议席,因此在议会选举中很难形成取得绝对多数议席的大党,有利于巩固多党政治的局面。同时,也给一些工人阶级政党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提供了机会。实行多党轮流执政的国家,虽然在法律和制度上允许任何政党都可以单独或联合参加竞选,获得议会多数情况下单独或联合执政,但实际上一个政党单独获得议会的多数席位而执政的情况极为少见。多党联合参与竞选和执政,是执政党竞选胜利和获得执政地位的主要形式。由于各执政党代表的利益和政治主张不同,执政党之间的矛盾客观存在,当执政党联盟成员之间的矛盾达到无法解决时,极易出现分裂,往往导致多党政府危机和垮台。

实行多党轮流执政的国家,因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的差异,多党轮流执政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两极多元格局。在议会多党中,没有哪个政党占有绝对多数,在竞选和组阁时,各政党往往分成阵线分明的左右两大阵营,轮流执政。法国、德国即属于这类国家。

第二,多元并存。在议会多党中,任何一个政党在选举中都很难单独获得绝对多数席位,常常是多党联盟参加竞选和获胜后组成联合内阁,予以执政。进行这种多党轮流执政的国家有意大利、芬兰、瑞士和1958年第五共和国建立之前的法国。

第三,一党独大。在议会多党中,各党均有可能因选举获胜而组阁,但其中一个政党长期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常常单独执政,即使联合其他政党共同执政或暂时下野,也能控制局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实行"一党独大"轮流执政的国家有日本、墨西哥、印度、突尼斯等国家。

(二)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执政党

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一般都明文规定:无产阶级政党是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由于各社会主义国家历史条件的不同、阶级构成的不同、革命进程的不同和执政环境的差异,执政党的类型也有一定的区别。

1.一党执政

一党执政是指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是惟一合法的执政党,其他政党不存在。前苏联是实行一党执政最早的社会主义国家。俄国十月革命后,面对政党林立的政治现实,布尔什维克党设想实行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列宁曾起草法令,提出在苏维埃中实行在多党和党派基础上的比例选举制。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及其他一些政党和团体,同布尔什维克一起参加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按平等原则共同承担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工作。

布尔什维克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还共同组成了联合政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有七名代表加入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的许多职能部门也都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在苏维埃政权初期，苏俄实行的是多党联合执政。后因社会革命党人发动叛乱，被苏维埃政权所镇压，从此，苏俄和其后的苏联便实行了共产党一党执政。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实行和曾经实行一党执政的国家还有蒙古、南斯拉夫、匈牙利、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古巴等国。

2.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

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是指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由共产党领导同民主党派长期合作共同管理国家的执政方式。该种执政方式是共产党为执政党，各民主党派为参政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的执政党类型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它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多党合作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具体体现这种合作关系的是政治协商制度；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参与国家政权的工作，担任领导职务；宪法和法律是各党活动的基本准则。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有利于协调社会各阶层、集团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促进政治团结和社会稳定；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凝聚社会力量，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还有朝鲜和东欧剧变前的波兰、民主

德国(东德)、保加利亚等国家。

三、执政党的性质

性质是一种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属性。执政党的性质是一个执政党固有的本性,是其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也是一个执政党区别于其他执政党(政党)的本质特征。阶级性是执政党的本质属性。执政党在长期政治斗争和执政过程中,通过具体实践,高度集中地反映并发展执政党所代表的阶级本性和特性而形成为执政党的党性。执政党的性质是执政党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活动的本性和特性的最高和最集中的表现。执政党一般都要求其党员不断增强党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实现党的纲领和目标。各类执政党和各国执政党在党性的表现和要求方面是不同的。

资产阶级执政党否认党性,标榜无党性、非党性和超党性。它往往是以代表全社会利益、反映全体民意的面目出现的,他们自誉为“全民党”、“社会党”、“民主党”,极力掩盖其阶级和阶层色彩,抹杀其本质属性。实则不然,资产阶级执政党具有鲜明的党性: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统治是其最高利益和最高目标;不择手段地运用一切方法,在议会选举或总统大选中取得政治地位,并竭尽全力来维护其执政党的地位。

无产阶级执政党公开申明自己的党性,公开宣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揭露了标榜无党性、非党性和超党性资产阶级执政党的虚伪实质,是掩盖其阶

级统治而欺骗愚弄人民的伎俩，其危害是巨大的。无产阶级执政党一向重视自己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在为他们所创建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纲领《共产党宣言》时，深刻地阐明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明确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①]列宁总结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经验，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作了明确的阐述："严格的党性是阶级斗争高度发展的伴随现象和产物。反过来说，为了进行公开而广泛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②]"把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显然是绝对不行的。"[③]"确定一个党是不是真正工人的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它是由什么人领导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④]因此，"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并密切注意使党性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且要见诸行动"[⑤]。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2页。

③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3页。

④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6页。

⑤ 《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9页。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所固有的明显的区别于其他执政党的特性，也由此构成了她的党性。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先进性。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以工人阶级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章程》历来都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尽管国际国内出现过种种否定和篡改共产党性质的思潮，我们都始终坚持党的性质。”[①]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任何特权，“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②]。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及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都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党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性质，早已为它 80 多年的历史所反复证明。在民主革命时期，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况，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5 页。

锋队，在全中国人民面前创造性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人民群众取消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带领人民群众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进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社会主义的全面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带领全国人民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努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增强综合国力，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地推向了21世纪。

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它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一个本质要求。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阶级状况、阶层结构发生了并将会继续发生较大的变化。在此背景下，要正确地理解和衡量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仍然是工人阶级；党仍然是由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党员的人数已达6800多万；党的指导思想仍然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宗旨仍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外，党没有自己的任何特殊的利益；党的最高纲领和最终目标仍然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党仍然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因此，中国共

产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对此，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有丝毫的动摇和怀疑。

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强调党的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决不意味着排斥其他的阶级和阶层。党只有巩固自己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才能更好地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和促进民族发展而诞生的。在 80 多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肩负着阶级和民族的双重使命，始终高举着两面旗帜，这就是共产主义的旗帜和爱国主义的旗帜。两面旗帜相得益彰，缺一不可。党不仅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中国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不仅要为实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奋斗，也要为中国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而奋斗。80 多年来，我们党全心全意地站在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解放与发展的最前列，不懈努力，宣传、动员和组织群众，领导人民群众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在各个历史时期，党在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同时，也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党的先进性和代表人民利益的广泛性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告诉我们，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其历史使命是为了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工人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此，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同全体人民和整个民族的根本利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94 页。

相一致;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也同全体人民和整个民族的历史命运紧密关联。共产党为完成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就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同时也是为全体人民和整个民族的利益而奋斗。中国工人阶级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革命的坚定性、彻底性等品格,是最有远见的阶级,它的利益与其他人民群众的利益和中华民族的利益是一致的。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就精辟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但代表了工农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①]。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党章都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的十六大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②]。党长期以来,坚持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基本立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实际工作中时刻注意坚持走群众路线,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党在每一个具体历史阶段的工作任务有所不同,为人民服务的内容和方式有所不同。但是,党一直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没有改变,而且一以贯之地付诸于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之中。

第二,中国共产党党性的先进性。一个政党是不是先进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8页。

② 《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的，并不取决于它自己的主观愿望，而要看它的理论和纲领是什么样的，看它对社会发展方向预测和把握的程度，看它代表了哪一部分人的利益。对此，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看一个政党是否先进，是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主要应看它的理论和纲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不是代表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是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放到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放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奋斗中去考察，归根到底要看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实际作用"①。这两段重要论述相互贯通，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借鉴世界某些执政党的历史教训所得出的结论，明确标示了党的先进性的判断标准。"历史表明，正是因为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制定和执行的路线、纲领集中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党才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正是因为我们党紧密联系党的纲领和路线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始终重视从思想上建设党，才解决了在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课题，保持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保持了党的先进性。"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

① 《江泽民"5·31"重要讲话学习读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执政党建设十人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4页。

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制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方针政策，代表了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了时代发展的方向和要求。

“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所谓具体的，是指事物不是抽象或虚拟的，而是实在的、客观的。党的先进性不仅体现在先进的理论基础和阶级基础之上，而且体现在它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能够推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能够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最终推动历史的前进上。所谓历史的，是指事物的存在与发展总是与特定的环境及条件相联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党的先进性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党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必须把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建立在与时代发展相一致的基础上。党的先进性总是同党在一定历史时期或阶段的中心任务相联系的，总是随着历史任务和时代要求的变化而变化的，也必然是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衡量和审视党的先进性问题，紧密联系当代中国的实际，把党的先进性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同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联系起来，把保持党的先进性问题放到了影响当代中国社会进步最基本的问题中去思考。“三个代表”既坚持了对党的性质的

基本规定，又进一步回答了这一性质所集中体现的内涵，把党的阶级性、先进性、代表性更加紧密地结合了起来，把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内容和要求更加紧密地统一了起来，把对党的组成成分的要求与对党的路线纲领的要求更加紧密地融合了起来，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党的先进性的内涵。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抓住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三个基本要求，很好地体现和把握了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把党的先进性的内在要求和外在形式有机地统一了起来，把深刻地认识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统一了起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高屋建瓴，总揽全局，言简意赅，含义深刻，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科学地集中和概括了党的先进性理论。

四、执政党的职能

作为一个国家政治主体的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具有特定职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执掌政权，行使国家权力

执政党代表特定阶级的利益和意志，执政时就必须把它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和意志集中起来，上升为国家意志。国家意志通过国家机关制定政策的形式予以实现。执政党最重要的职能就是执掌政权，行使国家权力。它凭借国家政权的力量、设施、制度和机制等，贯彻其纲领、方针和政策。

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行使国家权力，主要是立法权、行

政权和司法权。执政党掌握政权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在议会中,执政党议会党团动员、组织本党的议员,把本党的政纲、本党政府的各项议案或代表本党利益的立法案制定为法律,尔后由政府执行;二是以执政党的成员充任官吏,组织政府。执政党领袖担任总统、首相(总理)职务,以总统、总理的行政首长身份,对政府的行政运行予以领导,执政党组织一般不直接干预行政事务。相对于立法权和司法权来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司法(司法权、法官)是独立的。它们"独立于当政的政府","对政府不承担任何义务,无需按政府的命令去做,或看政府的脸色行事"①。但这并不是说,执政党执政不能涉足司法权领域,事实上,执政党常常以符合资本主义政治和法律的各种方式,来行使自己对国家权力的影响和控制。执政党往往通过任命法官的形式来控制司法领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政治生活中,执政党在调节议会和政府之间的权力制衡关系、调节联邦制国家中央和地方分权之间的矛盾以及对政府进行监督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②

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通常是通过对国家机构的领导来实现的。执政党直接或间接地行使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和监督权等权力。执政党代表人民的意愿和利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和权力。党通过国家机器把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的意志,安排其组织和成员进入国家政体的各级机关、各个部

① 拉尔夫·密里本德:《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2页。

② 参见王惠岩主编:《政治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页。

门，贯彻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政党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有效地保证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二）政治整合与稳定

执政党作为国家的领导核心，在执政过程中要兼顾各个阶层和社会团体、各个民族和地区的特殊情况，综合考虑各个方面的利益。它通过全局调控和利益协调，有效地统一人们的思想观念，整合社会的组织、体制和机制，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执政党常常把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政治整合过程中贯彻下去。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各国政治的变化，当代很多国家的执政党都开始改变其发展战略，不再作为其主要是一个阶级或一个阶层、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利益的代表面目出现，而是争取巩固原有阶级基础，扩大在全国其他阶级阶层中的影响，以获取支持。英国工党成立于 1900 年，原名劳工代表委员会，最初目的是使工人运动的支持者能够在议会反映工人阶级的要求。1906 年大选后，组成独立的议会党团，正式改名工党。在 1917 年通过的党章中，第四条第四款明确写道：“要使从事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工人获得他们的全部劳动成果并享受最公平的分配，从而使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的公有制和可以实现民众管理及控制企业与公用事业的最佳体制成为可能。”主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明确党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此后，工党的力量和影响迅速壮大，二战前便成为英国政坛的两大政党之一。1945 年工党在大选中以绝对优势获胜，组成战后第一届工党政府。以艾德礼为首的工党政府在执政

期间，实施了一系列至今对英仍有影响的政策，大规模实行国有化，对内建设福利国家，对外积极促进马歇尔计划和倡导成立北约。尔后，由于党内矛盾和纲领政策不适应时代发展，工党的影响减弱。特别是从1979年大选起，连续四次大选失利。1994年布莱尔就任工党领袖后，提出缔造“新工党”，建设“新英国”口号，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工党进行“现代化”变革。其中，较为重大的就是1995年4月29日对党章有关公有制条款所进行的修改。存在了77年的著名的公有制条款经过35年的争论后终于被修改，这是工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取消公有制条款为吸引中间阶级和其他选民做出了重大让步。1997年工党以绝对多数赢得大选胜利，工党执政后，推行“第三条道路”政策，加强党的建设和变革，政绩显著。2001年工党再次以绝对多数赢得大选胜利，工党实现了在该党历史上的第一次连续执政。

执政党具有政治稳定作用。实现国家富强、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政治稳定是前提条件。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所具有的政治稳定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执政党注重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通过制度和机制的健全，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第二，制定并注重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政府行为来运作，宏观驾驭政治、经济与社会，确保国家持续和谐地发展。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30多年来，遵循其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制定并推行了一整套适合新加坡国情、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精神和道德观念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使新加坡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岛国变成了今天的政治稳定、经济发

达、环境优美、公用事业完备、民族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的现代化“都市花园”。第三，执政党通过特定的程序和渠道，把党员和人民的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诉求及政治主张予以收集并条分缕析、综合概括，以系统化的方式表达出来，向政府反馈或施加压力。执政党以其利益的表达功能，快速准确地表达民意，驾驭复杂的社会局面，使整个社会保持有序、公平的发展态势。第四，执政党通过控制司法机关、军队、警察等国家暴力机关，在国家遭遇外敌入侵或国内暴乱时，保家卫国。

（三）政治教育与动员

执政党为了加强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其首要任务就是争取自己所代表的阶级、阶层和集团的那部分群众的支持。群众是执政党生存的基础，如果执政党脱离群众，丧失民心，就有丧失执政地位的可能。执政党获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是其执政地位加强和巩固的关键。为此，执政党就必须使广大人民群众和党员干部最大限度地了解其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使自己的立场、观点和主张获得广泛的支持，也就必须进行大量的政治教育和动员活动。

执政党往往会在其内部设有专门的教育部门，设立党校、专门的政治教育学校、培训中心和干部大学，创办各种政治教育的报纸杂志，建立电台、电视台等宣传工具；利用组织教育、培训和宣传手段，将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传达到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去，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灌输给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以期把这些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内化为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个人性选择，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变为自己的自觉行动。比如，布莱尔亲自做控制英国大部分媒

体的国际报业大王默多克的工作,使其支持工党。在日常生活中,英国工党对正面报道该党形象的记者给予特别关照,对负面报道工党的记者通过各种渠道施压并拒绝提供信息。

(四)政治录用与选拔精英

在现代民主社会,执政党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政治录用与选拔精英。执政党往往会在其内部培养精英人物或将社会优秀分子吸收党内,最终将这些遵守本党章程,信奉本党意识形态、忠诚于本党组织和贯彻本党政策的政治人物选拔和推举到党和政府职位或公共权力职位上去。选举作为现代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途径,是主权在民的基本保证。执政党通过举行和组织各级各类的选举,履行其政治录用与选拔精英职能。

政治录用与选拔精英的职能是各个民主国家的执政党非常重视的一项职能。在各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传统的政治录用方法正在被选举方法所取代。各个民主国家十分重视优秀政治人才的录用与选拔,因为,杰出人才是执政党兴旺发达的基础。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十分重视任用富有才华和诚实可靠的人才,把人才作为国家兴衰成败的关键问题。李光耀认为,"有好领袖才能有好政府"。"要建立好政府,非有优秀人才不可。不论政治体制有多好,差劲的领袖仍会给人民带来伤害。相反,我见过好些社会,尽管缺乏健全的政治体制,却管理得很妥善,正因为有优秀强悍的领袖当政。"[①]李光耀

① 李光耀:《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外文出版社、新加坡联合早报、时代媒体(新)私人有限公司 2001 年版,第 612 页。

说:20 世纪 60 年代,"我和同僚们着手发掘年轻人才,以便进行自我更新"[1]。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长期执政并取得骄人的成绩,是与其合理的政治录用与精英选拔分不开的。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前苏联则实行党政干部自上而下的层层任命制。党不仅任命自己的干部,还直接任命政府部门的干部。执政党政治任命尽管有其积极的一面,可以以此选拔优秀人才,吸引社会精英,以壮大执政党的力量和声威。但其消极方面也很突出:政治任命,必然造成干部只对上负责,而可以不对下负责;造成弄虚作假,溜须拍马;造成任人唯亲,而不任人唯贤;造成官僚主义,而不是实事求是;造成行贿受贿,买官卖官。这些现象与无产阶级执政党的性质和执政方式是极不相符的,败坏了党的形象。应该说,苏共的瓦解与党的干部制度没有及时地从任命制转向选举制是有一定联系的。

(五)影响和参与国际政治事务

执政党除了处理好国内事务外,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影响和处理国际政治事务。在处理国际政治事务过程中,执政党既可以维护本国的利益,又可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展示自己的风采,所以,许多执政党都很重视党的外交工作,都力图影响和积极参与国际政治事务。执政党与国外政党之间的关系以及执政党在国际事务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情况下,执政党之间、执政

---

① 李光耀:《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外文出版社、新加坡联合早报、时代媒体(新)私人有限公司 2001 年版,第 613 页。

党与非执政党之间、执政党与其他社会政治组织之间，包括不同性质政党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有些还成功地推动了国家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许多国家的执政党为了加强自己同世界各国政党之间的交往，还专门成立了对外联络和交流机构。譬如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执政地位后不久的1951年1月16日就成立了对外联络部。中国共产党历来都非常重视对外交往工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更趋活跃，形式和内容都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中国共产党遵循"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积极发展与各国政党的新型党际交流与合作关系。目前，中国共产党已同世界上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个各种类型的政党和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系和交往。它们当中既有执政党、参政党，也有重要的在野党和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的政党；既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也有社会党、工党和保守党；既有欧、日等发达国家政党，也有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国际、基民党国际等政党国际组织也都有联系。通过不同形式、不同层次、不同渠道的友好交往，中国共产党可以与各种不同类型的政党就共同关心的各种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意见。双方既谈双边关系，也谈国际问题；既探讨兴邦立国之道，也交流建党治党之策。这种以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为基础的对话和交流，不仅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友谊与合作，推动了整个国家关系的全面发展，也对世界和平、发展和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章 执政党的执政基础

执政党执政的基础在于其执政的合法性。因此，执政党不断探寻自身的合法性是政党政治运作的基本规律。在现代民主政体下，执政党因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而掌握国家权力。任何执政党要巩固和加强执政地位，除了其在执政过程中能遵循国家制度运作的基本原理并取得相应的成效外，关键是其执政要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人民群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是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核心基础。世界上许多长期执政的大党之所以纷纷下台与它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忽视合法性基础或执政过程中合法性基础的丧失有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高屋建瓴，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作出了最具权威的理论诠释和客观论证。

一、“合法性”概念的缘起与内涵

合法性关注的主要是权力问题，它以权力为研究对象，是指该权力是否和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的认同、信任和支持的问题。合法性在英文中称为“Legitimacy”，它来自于古拉丁文中的“Legitimus”，意思是合乎法律的(Lawful)或法治的

(Legal)。从绝大多数学者的论述可以看出,人们对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往往不作区分而等同使用。政治合法性关注的是政治权力问题,它以政治权力为研究对象,是指该政治权力是否和为什么能够获得其支配客体的认同、信任和支持的问题。本文在研究有关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时,主要涉及的是政治合法性问题。

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观念由来已久,中外很多著名的思想家对此皆有论述。早在古希腊,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其所关注的责任义务(Obligation)、服从(Obedience)和权威(Authority)等概念里就包含有合法性的意思。亚里士多德指出:"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民都能参加而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①春秋时期的孔子在子贡追问政之要时答曰:"民无信不立。"②这里很清晰地表明,亚里士多德所指的人民的"愿望"和孔子所谈的"信"实质上已涉及政治合法性问题,因为政治合法性主要就是指大多数社会成员对现行政治体系及政治行为的认同和自愿接受性。同时,古往今来,人们在探究历史上一些王朝兴衰、统治良莠时,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从"人心向背"方面找原因,并会得出一条千古不变的真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就说明人们一直比较注意从合法性角度考察政治统治的基础问题,早已意识到这一因素的重要性。

---

①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88 页。

② [春秋]孔子:《论语》,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80 页。

中世纪以后,合法性理论得到了发展。由于古代社会直接统治的覆灭,人民自己治理自己的直接民主已不可能。政治统治或政治管理的发生和存在成为人类社会的必然现象。此时,政治权力必须为自身何以能够对社会或民众进行统治或管理作出合法性的解释。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大众对政治权力的认可在合法性理论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到了近代,合法性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从一定意义上说,西方近代政治哲学史的主流思想就是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问题。格劳秀斯对国际法的构建、布丹的君主主权说、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卢梭的公意说,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合法性问题进行了哲学层面的探讨。在这些先哲中,笔者认为,从理论上最早明确提出合法性概念的是卢梭。卢梭认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这种变化是怎样形成的?我不清楚。是什么才使这种变化成为合法的?我自信能够解答这个问题。"[①]对此问题的解答是:人民的公意是合法性的惟一基础,惟有人民自己才能决定由谁来统治他们。尽管卢梭所谈的公意是一个模糊抽象的概念,且其合法性是以强制为基础的。但在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为主要内容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在卢梭激进的人民主权思想的影响下,人们日益重视合法性问题,合法性理论有了较大的、全面的发展。

对合法性问题作出全面和深刻系统论述的是德国著名的

①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版,第8页。

政治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于当代社会学和政治学来说，韦伯的著作是合法性研究的经典文献。韦伯认为，由命令和服从构成的每一个社会活动系统的存在，都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建立和培养对其存在意义的普遍信念。他在其名著《经济与社会》中指出，没有任何一种统治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者仅仅以情绪的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机会。毋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①]。为了取得合法性，就需要促使人们服从某种命令的动机。人们服从统治者命令的可能性及其程度主要取决于统治系统的合法化程度。当统治系统拥有的合法性程度高的时候，统治者的命令得到服从的程度就高。反之，当统治系统拥有的合法性程度低或出现危机的时候，统治者的命令得到服从的程度就低。从统治者和服从者的相互关系中，可以明晰合法性的内涵：对于处于命令——服从关系中的服从者来说，是一个对统治的认同问题；而对命令者来说，则是一个统治的正当性的问题。统治的正当性与对统治的认同的总和就构成了统治的合法性。[②] 当权者们总想把他们自己的地位当作是"正当的"，把他们的优势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并把多数人的服从解释为"应得的命运"。"因此，所有的统治者都制造某种关于他们具有天生优越性的神话。这种神话通常都为处于稳定环境中的人民所接受。但

---

①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第 239 页。

② 参见张康之：《合法性的思维历程：从韦伯到哈贝马斯》，《政治学》2002 年第 4 期。

是，当某种危机使现存秩序变得可疑时，这个神话也许会成为激烈仇恨的攻击对象。"[①]韦伯认为，一种统治要巩固它的持久存在，该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必须有其相应的类型。合法统治有三种纯粹的类型。它们的合法性的适用可能首先具有下列性质：

1. 合理的性质：建立在相信统治者的章程所规定和指令权利的合法性之上，他们是合法授命进行统治的（合法型的统治）；——或者，

2. 传统的性质：建立在一般的相信历来适用的传统的神圣性和由传统授命实施权威的统治者的合法性之上（传统型的统治）；——或者最后，

3. 魅力的性质：（建立在）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他所默示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概，或者楷模样板之上（魅力型的统治）。[②]

具体述之，在依照章程进行统治的情况下，被统治者服从的是有合法章程的、事务的、非个人的制度和由它所确定的上司——根据他的指令的正式合法性和在他的指令的范围内服从他。在遵循传统进行统治的情况下，被统治者是在习惯的范围内，由于尊敬而服从传统所授命进行统治并受传统（在其范围内）约束的统治者个人。在魅力型的统治情况下，被统治者服从的是具有魅力素质的领袖本人。传统型的统治主要存

---

① [美]莱因哈特·本迪克斯：《马克斯·韦伯思想肖像》，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11 页。

②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第 241 页。

在于传统社会中，它是社会结构分化程度较低、社会相对封闭、社会主要以血缘、宗法以及个人的忠诚为联结纽带的产物；魅力型的统治主要以领袖人物的非凡才能为基础，这种统治类型的合法性基础是不稳定的；合法性的统治是建立在遵守正式制定的非个人专断的法规基础上的，统治者和其他任何人均须受法律约束，统治者进行领导和统治必须根据选举方式，在普遍、公平、自由的原则下，通过竞选而获得政治权力。韦伯认为，在现代国家中，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必然要求是法理型的，即通过法律程序实现合法化。

自从韦伯以来，合法性概念日益为学术界广泛接受，成为现代政治分析的一个重要术语。如韦伯以后的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希尔斯、埃森斯塔德，政治学家李普塞特、伊斯顿、达尔、阿尔蒙德、亨廷顿，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葛兰西、卢卡奇、阿尔都塞、波朗查斯等许多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合法性问题进行了探讨。近年来合法性问题也日益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时和兴在《关系、限度、制度：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一书中，对当今有关合法性问题的研究进行了分类和概括。他把自马克斯·韦伯以来有关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大致分为了结构功能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现代规范民主理论学派，并对每个学派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较为高度的概括。[①] 在研究合法性问题时，我们有必要对这三种学派的基本观点予以分析。

---

① 参见时和兴：《关系、限度、制度：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第 6 章，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1.结构功能学派的合法性理论是对马克斯·韦伯的直接继承与发展。其代表人物有利普塞特、艾森斯塔德、阿尔蒙德、亨廷顿、卢曼、让—马克·夸克等,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合法性与政治制度化的关系问题。塔尔科特·帕森斯对此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概括了马克斯·韦伯对合法性类型的划分标准,认为"韦伯的分类不是一种根据不同类型的价值来划分的合法类型"。因此,他提出应根据价值划分权威类型。利普塞特认为,"任何政治系统,若具有能力形成并维护一种使其成员确信现行政治制度对于该社会最为适当的信念,即具有政治的合法性。"[①]阿尔蒙德认为,"如果每一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而且还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处,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么,这种政治权威就是合法的……正因为当公民和精英人物都相信权威的合法性时要使人们遵守法规就容易得多,所以事实上所有的政府,甚至最野蛮、最专制的政府,都试图让公民相信,他们应当服从政治法规,而且当权者可以合法地运用强制手段来实施这些法规。"[②]当代法国学者让—马克·夸克则认为:"合法性是对被统治者和统治者关系的评价。它是政治权力和其遵从者证明自身合法性的过程。它是对统治权力的认可。这种认可是建立在一系列条件基础之上的。而这些条件

---

① S. M.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 53 (March 1959), p. 86.

② [美]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5—36 页。

主要与认同,价值观及同一性和法律有关。"[①]可见,把合法性等同于社会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是当代社会对于合法性概念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认识。公众对政治制度的认同与忠诚的程度是政治制度合法性评价的标准。

2.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有葛兰西、波朗查斯、密利本德、哈贝马斯等,他们主要关注的是意识形态对于合法性的影响和作用。葛兰西强调文化霸权主义、非常主义意识形态对于国家合法性的意义。波朗查斯把政治合法性基础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结合起来,强调"不能低估主要依靠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那些合法性的存在"[②]。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对合法性理论贡献最大的应为哈贝马斯。他将历史上的合法性理论分为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两类,并批评其各自的片面性,尔后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其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经验主义的合法性概念,将有效性即被统治阶级相信、赞同与否,作为合法性的标准,而缺乏对有效性基础的说明;规范主义的合法性概念完全排斥大众赞成、认可的经验基础,而去寻找一种抽象的思辨。哈贝马斯从批评性重建的角度指出:"合法性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有着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这个定义强调了合法性乃是某种可争论的有

① [法]让一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佟心平、王远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 页。

② [美]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46 页。

效性要求,统治秩序的稳定性也依赖于自身(至少)在事实上被承认。"[①]在此概念中,哈贝马斯力图将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结合起来,十分强调合法性的实现过程,使合法性在符合价值规范的基础上获取支持和忠诚。当一种政治秩序在当时的社会规范中存在被认可的价值时,该种政治秩序、政治权力就具有了合法性。

3.现代规范民主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利普塞特、卡尔·弗里德里奇、戴维·海尔德等,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制度化的程序和国家成就对合法性的影响。在对合法性的认识问题上,人们往往有一个误区即认为只要政治制度能满足人们实际生活的需要,就能够维护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这是把合法性和有效性混为一谈所造成的。尽管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是相互联系的概念,但有效性不具备合法性所蕴涵的信念的力量,有效性主要是指"实际的政绩。即该制度在大多数人民及势力集团的大商业或军队眼中能满足政府基本功能的程度"[②]。而合法性指的是确定价值。利普塞特认为,"群体按照政治制度的价值观念是否符合他们的价值观念来确定该制度是合法的或非法的。"对于一个特定的政治制度而言,"合法性涉及该制度产生并保持现存政治机构最符合社会需要的这种信念的能力"[③]。任何一种具体的政治制度,都包含着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不同程度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决定政治制度

① [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84页。

② [美]利普塞特:《政治人》,刘钢敏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3页。

③ [美]利普塞特:《政治人》,刘钢敏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3页。

稳定的关键。“从短期眼光来看,效率很高但缺乏合法性的社会……要比效率相对低但合法性高的政权更不稳定。”[①]弗里德里奇认为,合法性是表示“统治者有可能表示具有统治的资格,亦即是说,国民相信统治者有统治的权力”。“只有当存在一种用以提供统治正当资格的普遍信仰时,合法性才能得以实现。”卡尔·弗里德里奇十分重视有效性问题,他认为有效性是一种成就偏好,指政治权力主体取得的成就如战争的成功、国家繁荣的保持、秩序与和平的维持等,并将有效性与宗教信仰、哲学的正义观点、传统观念和程序观念一起构成了政治合法性的五大信念基础。戴维·海尔德认为,现代民主制国家取得合法性的原因,主要在于理想中的规范性的同意,即人们服从规则与法律是出于他们认为规则和法律是正当的,而且值得尊重。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人们认定一种政治制度是否有效,主要根据该种政治制度是否为人们提供了参与或选择的机会,能否为其带来利益要求的满足。

人们关于合法性问题的论述,尽管各持己见,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概念。但是从韦伯关于合法性概念的理论始点出发,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种一致的看法:合法性是一种制度、一种统治、一种权力的基础,它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②]。任何政治统治要想得以维持,不仅需要通过强制手段所带来的强制性服从,还需要社会成员起码限度的自愿服从,即:起码得有足够数量的人在心里觉得这种统治是“适当的”、

① [美]利普塞特:《政治人》,刘钢敏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3 年版,第 57 页。

② [法]让-马克·夸克著:《合法性与政治》,佟心平、王远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 页。

"正当的",从而是"应该服从的",政治统治才能维持下去。人们对于一定政治统治的起码认可或自愿服从,即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是任何一个政治体系得以稳定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基础与前提。由此有人认为,所谓合法性就是大众对政治统治的认同、支持或忠诚,合法性的强弱与大众认同度的高低有关。这种定义不够全面。那么,究竟对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内涵如何界定呢?笔者认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合法性是政治制度、权力与社会基本信仰、价值的内在一致性程度;第二,合法性是民众对于现实制度和政权的认同、信任和支持程度。

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

政治权力是指"某一政治主体依靠一定的政治强制力,为实现某种利益或原则而在实际政治过程中体现出的对一定政治客体的制约能力,政治权力所要达到的目的,主要地表现为利益"①。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既然合法性是任何一种有效的政治权力所必须具有的客观要求,那么,我们就必须对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进行有效的论证,对诸如政治权力在什么条件下才是合法的?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源于何处?以及这些基础、条件是如何赋予政治权力以合法性的等基本问题给以明晰的解答。笔者认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主要有以

① 李景鹏:《权力政治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下三种。[1]

(一)意识形态基础

1.意识形态的源流与内涵

意识形态也称为"观念形态"或"思想体系",它既是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也是政治、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一个基本范畴。意识形态是对社会经济基础和相应的政治制度的客观反映。它是一定社会或阶级的思想体系,是一定社会集团、阶级基于自身根本利益对现存社会关系自觉反映而形成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是由一定的政治、法律、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社会学说、观点所构成,并成为一定的政治纲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社会理想的思想理论依据。社会意识形态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变化而发生变化。在阶级社会里,意识形态是有阶级性的,它是一定阶级的根本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目的的表达,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

自从法国思想家德斯杜特·德·托拉西于1796年在其《意识形态原理》一书中首先使用"意识形态(Ideology)"一词,特别是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2]1927年的发表和曼海姆的巨著《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在1929年的出版而逐渐流行起来。托拉西认为,意识形态是"思想的科学"或

① 政治权力合法性基础问题的解答,为对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进行有效的论证,将起到重要的理论铺垫作用。由于本章论证的主题是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所以在以下行文中对有关执政党问题的论述,将把统治合法性概念换用执政合法性概念。

②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1856年合写的一部著作,当时只发表了该书第2卷的第4章。直到1927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该书才得以全文发表。

"观念的科学"，其任务是向人们解释观念上的成见和偏见的根源，它是政治学、社会学等其他科学的基础。对于什么是意识形态，托拉西以后的哲学大师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都没有直接使用过意识形态的观念。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指出，意识形态是一种思想方式，它有两种类型，一是特殊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尽力掩饰、扭曲真相，有意无意地为了自己的利益自欺并欺人。二是全面的意识形态，它指的是一种世界观或对一种生活方式的彻底信奉。[1] 新闻报道中所说的意识形态，往往指前者，而学术研究中所涉及的意识形态往往指后者。

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概念没有进行专门的定义，他主要强调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尽管马克思没有直接给出意识形态的定义，但是他明确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2]在这里，马克思很清晰地表明了意识形态是"观念的上层建筑"。马尔库塞对马克思有关意识形态的论述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归纳。他认为，马克思所理解的意识形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概括：一是对历史唯心主义的

① 参见毛寿龙：《政治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3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3 页。

否定和揭示，因为以往的哲学和社会政治理论，将其观念和体系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二是对社会存在的系统解释，马克思在此关心的是意识形态是如何与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权力结合起来的；三是认为意识形态在总体上是一类文化，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受社会存在的制约，个人或群体都要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其影响。[①]

尽管人们对于意识形态的定义和解释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但是人们对于意识形态是人们行动的思想前提，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个人或集体的行动，则具有较为一致的看法。意识形态具有广义的意识形态和狭义的意识形态之分。广义的意识形态是指特定的社会集团（或共同体）对自身社会地位和利益要求的自我意识和自觉表达，类似于哲学或世界观的“行而上”的理论学说或主张；狭义的意识形态指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人们通常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自觉地反映一定社会集团（在阶级社会就是阶级）经济政治利益的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观念体系，是一定社会集团、阶级的政治理想、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思想基础。”[②]

2. 意识形态的特征

第一，阶级性。阶级性是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意识形态是对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直接反映，总是代表着社会的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根本利益。意识形态是对国家和

① 参见杨雪冬：《论意识形态与经济增长》，《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年第2期。

② 郑永廷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一切政治设施的本质认识的理论表述，是对于阶级、政党、民族、国家之间实际政治关系问题的基本理论立场。所以，意识形态从来都是有阶级性的，在现代社会也是如此。正如列宁所说："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1]这明确地告诉我们，在一定的阶级社会只有一种思想体系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它直接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服务，是统治阶级进行思想控制的基本理论根据。虽然，在冷战后时代，在意识形态中也包含着某些反映全人类利益的因素和成分，但就意识形态的总体和核心而言，意识形态的本质仍然是为其阶级性服务的。

第二，系统性。意识形态是由思想家、理论家创立的一种系统的理论观点，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体系。它能够系统地概括经济和社会的需要，以及阶级的利益、愿望、目的及其实现的条件。意识形态是一定阶级或一个社会自我认识理论水平的标志，表明它的理论水平所达到的高度。意识形态的发展与社会物质经济关系发展状况不完全一致。物质和意识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在社会生活中，先进的经济政治制度残留着大量的落后思想意识，落后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可以孕育出先进的思想观念。

第三，实践性。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系统复杂的思想体系，总是与社会政治利益集团的实践行动密切相关，它是社会政治集团行动的思想观念前提，是人们参与社会政治性集体行动的指导思想和合法性论证工具。意识形态思考论证的不仅

①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7页。

是一些相当重要的实践问题，而且是直接关注人们以特定的方式组织政治、道德、宗教、经济和文化等各种活动和机构的本质和价值的理念。《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指出："从广义上说，意识形态可以表示任何一种注重实际的理论，或者根据一种观念系统从事政治的企图。"因此，意识形态是基于一定的利益要求通过指导人们的实践而达到某种社会目标的理论、观点、学说体系。它具有强烈的实践性。

总之，意识形态作为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和一种理论体系，它有严密的逻辑系统性；作为政治文化范畴，它有明确的阶级性；作为社会教育范畴，它有强烈的实践性。

3. 意识形态的功能

第一，政治导向功能。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思想观念体系，是一定社会阶级、集团在政治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是其根本利益在观念上的反映。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就是政治导向，即它对于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具有直接的价值导向和行为导向的作用。阿尔图塞指出："意识形态是一个诸如观念和表象(representation)的系统，它支配着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群体的精神。"[1]在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能够为一定阶级和社会团体提供政治行动的合法性。一方面，对于统治集团内部来说，意识形态可以使其成员确信他们的理论、信仰是正确的，其行动是合理的，进而动员、激发集团所有成员的政治信心和行动热情，使政治集团便于根据特定的目标，采取统一的集体行

① Louis Althusser: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n Slavoj Zizek, ed., Mapping Ideology, London: 1994. p120.

动；对于统治集团外部的人来说，意识形态可以使他们认同、相信、接受特定政治集团的理论、信仰，整合社会力量，为统治集团所制定的目标而奋斗。意识形态往往通过强调长远利益，强调政治行动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共利益，不仅是为了本阶级、集团的利益，而且是为了全社会乃至全人类的长远利益，由少数政治精英通过宣传、动员来完成。意识形态在现代政党政治中，往往反映的是执政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

第二，社会服务功能。意识形态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思想上层建筑，它不仅与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相一致，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为经济基础服务，而且也为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并对其进行保护的政治上层建筑服务，即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服务。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①]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主要体现在可使社会交易费用的节约。具体言之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可以把诚实、信用等观念灌输到人们的价值体系中，从而减少市场交易中的机会主义；意识形态可以灌输敬业精神，从而约束生产中的偷懒行为，节约监督成本；意识形态可以使社会成员相信现存制度的公正合理性，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从而减少制度运作的费用。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主要体现在维护论证某种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波朗查斯认为："在分析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时，不能低估主要依靠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页。

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那些合法性的存在。”[①]“任何统治阶级都要在意识形态上论证其社会制度和权力支配的合法性，并用这种合法性去限制排斥甚至清剿妨碍该社会制度和权力支配的其他思想意识，设法证明其他社会制度和国家政权的不合法性。”[②]

第三，政治教育功能。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本质决定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论证现实社会或未来理想社会制度及权力行为的合法性。因为“合法性作为对政治利益的一种表达，将它所证明了的政治机构描绘成为最为卓越的，甚至是必须的，以至于它们并不需要合法性就可以运行自如”[③]。因此，在阶级社会中，虽然“政治统治是以一定阶级的经济政治地位为基础的，但政治统治也不仅仅是经济力量的统治，它还必然表现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对于人们精神世界的‘宰割’才能实现”[④]。这里便体现了意识形态的政治教育功能。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意识形态是文化和政治的相互作用。”“从世俗的意识形态的角度看来，(其政治作用)现在已经变成了关于末世信仰的政治表现……意识形态这个术语处理的是这样一些社会运动，他们千方百计地动员人们为实现这些信仰而

① [美]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6页。

② 郑永廷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③ [法]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佟心平、王远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④ 张星久：《论合法性研究的依据、学术价值及其存在的问题》，《法学评论》2000年第3期。

奋斗。"[①]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尽管都由该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但意识形态中的各种形式、各种思想观念、各个理论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却不相同，只有统治阶级的思想才能在意识形态中占有统治地位。"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②]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思想先导的作用，在统一人们的思想、意志和行动，促进社会的稳定，巩固统治阶级的地位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有效性基础

有效性是指政治权力的实际效果，是指政治权力对社会进行政治管理或政治统治的绩效。利普塞特认为，"有效性是指实际的政绩。即该制度在大多数人民及势力集团如大商业或军队眼中能满足政府基本功能的程度。"[③]大多数社会成员主要是根据现行政治统治是否为其提供了参与或选择的机会，能否为其带来利益要求的满足，来认定该政治权力合法与否。

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人们往往把合法性与有效性混为一谈，认为只要政治权力能满足人民的实际生活需要，就能维护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利普塞特对此作了明确的区分，他认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与有效性是两个相关的概念，但两者是有

① ［美］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0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52 页。

③ ［美］利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刘钢敏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3 年版，第 53 页。

差异的。合法性是指确定价值,它"涉及该制度产生并保持现存政治机构最符合社会需要的这种信念的能力"[1]。有效性主要是指作用,即实际的政绩。合法性与有效性对政治秩序的稳定具有直接的影响,利普塞特认为,在合法性水平与有效性水平均较高的情况下,政治制度最具有稳定性;在合法性水平较高,而有效性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政治制度尽管也具有较稳定的秩序,但比起前一种状况的稳定性要差;合法性较低但有效性水平较高的政治制度要比合法性较高而有效性较低的政治制度更不稳定;在合法性水平和有效性水平均较低的情况下,政治制度极不稳定,往往需要依靠暴力来维持。从短期来看,效率很高但缺乏合法性的社会,要比效率相对低但合法性高的社会政权更不稳定。但当延续几个世代,长期保持效率的政治制度也可以得到合法性。在现代世界,这种有效性主要意味着持续不断的经济发展。那些成功地适应产业体制要求的国家,国内的政治纠纷最少,而且会保持它们传统的合法性,或者会培养新的强有力的象征。[2] 良好的政绩是政治权力获得合法性的重要源泉。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公众利益的普遍提高、社会秩序的安定、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对政治合法性的提高都起着重大的作用。政治权力主体一般都会去努力谋求社会经济发展,以此来提高公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以增加自身统

① [美]利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刘钢敏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3页。

② [美]利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刘钢敏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6—58页。

治的合法性，巩固和延长其统治。即使是通过不合法途径获得政治权力的政治主体，也会努力提高有效性，寻求和提高其自身统治的合法性。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威权政权几乎毫无例外地被迫去把政绩当作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

当政治权力主体的统治不能取得有效性或有效性降低时，它不能给公众提供公正平等的参与、选择机会，它的政绩不能满足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要求，其合法性就将面临威胁和缺失的危险。利普塞特指出："如果一个政治制度长时期地缺乏有效性，也将危及合法制度的稳定。"[①]大多数社会成员主要是根据现行政治统治是否为其提供了参与或选择的机会（尤其是在他们有了政治要求之后），能否给其带来利益要求的满足，来认定该政治统治合法与否。而对一个政权来说，他的统治若不能提供公正平等的参与、选择机会，他的政绩不能满足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要求，它的统治的合法性就将面临丧失的可能性。

（三）制度基础

人们对已有政治制度的遵循是政治权力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基础。要论证政治制度对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必须首先明晰什么是"制度"。通常认为，制度是"人类共同生活所需要的约束个体行为的规则，是共同生活质量的保证"[②]。其基本含义是指"一定范围的成员共同遵守的、按一定秩序办事的规程；是在一定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的、经济的及文化的等方面

① [美]利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刘钢敏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3 年版，第 53 页。

② 毛寿龙：《政治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66 页。

的体系”[1]。有的学者认为,制度至少包括三层含义:第一,它指的是一种政治统治形式,是对社会形态的性质的一种规定。如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基本制度等。第二,它指由各个要素组成的一个有机系统。如选举制度、干部制度、组织制度等。第三,它指规范人们行为的各种具体规则、准则、条例、规定等。[2]

不同学科对制度的理解也不相同。以研究制度见长的制度学派经济学家们,对制度的解释就不相同。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认为“制度”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3]。诺斯指出:“制度实际上是人和资本存量之间及资本存量、产品劳务的产量和收入分配之间的过滤器。”同时,制度又是“为约束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行为准则”。制度能够“提供人类在其中相互影响的框架,使协作和竞争的关系得以确定,从而构成一个社会特别是构成了一种经济秩序”[4]。除了经济学家以外,社会学家、法学家和政治学家们也给制度下了多种不同的定义。例如,社会学认为,“制度是非常稳定地组合在一起的一套规范、价值标准、

---

① 王韶兴:《政党政治与政党制度论》,《政治学研究》2000 年第 4 期。

② 参见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05 页。

③ 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对制度的经济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10 页。

④ [美]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195—196 页。

地位和角色，它们都是围绕着某种社会需要建立起来的。"①帕森斯认为，"制度是规范的一般模式，这些模式为人们与他们的社会及其各式各样的子系统和群体的其他成员互动规定了指定的、允许的和禁止的社会关系行为的范畴。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总是有限制的模式。……也就是说，它们与合法取向的行为结合在一起。"②政治学认为，制度是"在有关价值的框架中由有组织的社会交互作用组成的人类行为的固定化模式"③。

政治制度是在特定社会中，统治阶级通过组织政权以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原则和方法的总和。政治制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对于政治制度的定义，国内外学者对此有多种解释。有的学者认为，广义的政治制度是一个国家用宪法、法律确认和规定的国家性质（国体）和国家形式（政体）两方面的总和。④ 它包括一个国家的阶级本质，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国家结构形式和公民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狭义的政治制度则不包括国体，仅指政体，即政权的组织形式。

无疑，政治制度是为调节社会中的政治活动服务的。由于人与人、阶级与阶级或集团与集团之间的政治利益的冲突，有着利益冲突的人民需要制度化的行为规则来约束和指导人

① ［美］伊恩·罗伯逊：《社会学》（下），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53页。

② ［美］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梁向阳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45页。

③ 杰克·普拉诺等：《政治学分析词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7页。

④ 杨祖功、顾俊礼：《西方政治制度比较》，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们的政治行为的原因，所以，政治制度在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亨廷顿认为："如果完全没有社会冲突，政治制度便没有必要存在；如果完全没有社会和谐，政治制度也无从建立。"在社会生活中，如果没有政治制度，政治就会无秩序。"在任何一个社会势力复杂且其厉害关系纵横交错的社会里，如果不能创设既与各派社会势力有关联又是独立存在的政治机构的话，那么，就没有哪个社会势力能够单独统治，更不用说形成共同体了。"①"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社会便会缺乏去确定和实现自己共同利益的手段。"②帕森斯把"政治制度作为权威的空间，道出了制度化的重要意义"③。"政治制度的直接作用或首要功能就是通过规范各种追逐权力的政治力量，形成一种强制性的公共权力。"④同时，一个社会政治制度的状况，还是该社会政治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一个社会政治发展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活动家隶属和认同各种政治机构的多寡。"⑤

政治制度的社会功能是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础。第一，政治制度具有社会价值定向功能。一旦一种政治制度被确

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9 页。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3 页。

③ 时和兴：《关系、限度、制度：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00 页。

④ 马德普：《论政治制度及其功能》，《政治学》2000 年第 6 期。

⑤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1 页。

立，那么就意味着它便为社会确立了一个基本的价值目标体系，社会的其他制度必须以该体系作为参照物，政治权力的合法政治活动要在这个体系内进行，政治权力者在政策的制定和权力的运作过程中必须以此体系为依据。第二，政治制度具有社会整合功能。政治制度通过对政治参与渠道的安排，通过对政治活动程序的制定，把社会政治生活中各种政治力量整合在一个统一的体制和秩序之中，化解矛盾，解除冲突，整合各种政治力量，使社会政治生活得以和谐健康的发展。第三，政治制度具有限制有害价值生产的各种活动的保障功能。① 政治制度通过直接限制人的某些政治活动，或通过在该政治制度体系中制定的法律规范限制人的其他一些行为，防止政治行为体两败俱伤的行为冲突，保护人们的合法利益，维护某些价值生产所需的条件和秩序。政治制度对有害价值生产的各种活动的限制首先是通过维护现有的政治秩序，而后是通过维护各种社会秩序予以实现的。

当一种政治权力的获得和运作是遵循制度的，而且制度自身的合法性又是可以证明的，那么，该种政治权力通常就被认为具备了合法性。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当政治权力主体在选举中获得胜利并在行使权力时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运作的；另一方面，依据制度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力，要达到完备意义上的合法性，其制度本身必须具有合法性。也就是说，"规定权力的规则必须按照统治者和服从者共有的信

① 参见马德普：《论政治制度及其功能》，《政治学》，2000 年第 6 期。

仰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①，才能充分证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三、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是指执政党在一定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实现稳固有效执政所应具有的基础和条件。它通常是指执政党凭借非权力因素和非暴力手段，通过其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执政绩效及其在社会中的影响，民众出于自觉或自愿主动地接受执政党的执政和领导的状况。执政党执政是否具有合法性，关键看其占有政权的合乎法理、情理的性质。一般来讲，“合法”是指符合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当然包括这方面的内容，但它又不限于这些内容，还应包括社会存在、社会成员的认可。一个执政党具有执政的合法性，就意味着它执掌国家政权具有正当的理由，从而获得人民的自愿的广泛认同和有力支持。

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对于增强执政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执政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和加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提高执政的有效性，具有固根护本的作用。人们越发重视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主要由以下原因所决定：

第一，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是世界政党政治的共性问题。在现代政治制度中，执政党执掌政权并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

---

① ［美］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7 页。

处于中心地位。执政党对时代和环境变迁反应及时、执政绩效明显及其执政过程中自身表现出来的良好形象，使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得以加强；反之，则使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存在危机。国际风云变幻中，执政党的潮起潮落、兴衰更替，都与执政党的合法性有关。执政党具有合法性是其维持持久执政地位的关键。

第二，人们对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关注已久，为合法性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政党政治自产生以来，一直被视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标志和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由于各国政党政治的环境不同，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最初来源是不同的。有的是通过继承获得，有的是通过竞选的形式而实现，还有的是通过暴力的形式而夺取。但是，“由政党作为民主政治工具的性质所决定，执政党权力的持续的合法性，归根结底只有从民主政治中才能得到”[①]。对世界上各种类型的执政党如何取得执政的合法性？取得执政地位后如何继续巩固其执政的合法性？这些便成为人们所时刻关注的焦点。

第三，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能够使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执政党拥有合法性，民众对其认同心理较高，贯彻、执行执政党及其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比较顺利。对于化解执政党的风险，避免执政党执政的危机，推动自身改革，实现自身建设的现代化，等等，都具有重大的作用。

---

① 王长江、姜跃等:《现代政党执政方式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49 页。

任何政党体制下的执政党之所以能够上台执政，至少有足够的理由得到国内相当部分民众对执政党的广泛支持和认同，证明其执政具有合法性。但是，“如何维护和加强合法性，是任何一个政权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的问题，更是执政党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①。因此，关注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就显得尤为重要。结合以上有关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的论述，笔者认为，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主要有以下内容。

(一)鲜明的意识形态

执政党尽管手中掌握强制性的力量，但是，它要维持和巩固执政地位，就必须注重意识形态的力量。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是执政党关于政治、法律、艺术、宗教、哲学、道德等的理论和见解，它是执政党组织、号召、武装和凝聚民众的精神武器，是执政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执政党通过这些路线、方针、政策的实施，解决施政过程中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重大问题，从而实现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作用。意识形态直接关系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与否，关系执政党的政绩，关系民众对执政党的认同和支持程度，乃至关系到执政党历史作用的发挥和其执政地位的巩固与否。人们经常借助意识形态来判断政党的性质。正如马克思所说：“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②因此，意识形态是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之一。

---

① 胡伟：《三个代表：党的建设面向新世纪的坐标》，《探索与争鸣》2000年第10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6页。

不同国家、不同类型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不同。

1. 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意识形态

尽管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都是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体系，具有强烈的阶级性，但具体的表现形式却不相同。其中主要有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督教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和生态主义意识形态。

恪守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政党主要有英国保守党、美国共和党、加拿大保守党、意大利天民党、日本自民党、法国保卫共和联盟等。18世纪末，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埃德蒙·伯克在《法国革命感想录》中，对保守主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主要内容有：国家承认宗教的重要性；在政治或社会改革的过程中不应侵犯个人权利；维护等级和地位的差别，反对革命的平等观念；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变革应是逐步推进，注意保持社会发展的连续性，不能破坏原有的政治秩序。美国学者伯恩斯把保守主义概括为："人性的脆弱和罪恶；普通人缺乏应用理性的能力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大多数积极的社会行动形式无益甚至有害；民主制度不可能，因此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行政元首，或者某种形式的杰出人物统治，或者少数统治；需要把宗教作为社会戒条的源泉和作为促成基本一致的制裁力量；个人主义及其思想和制度上的自由实验将导致法西斯主义或其他形式极权主义的危险。"[①]保守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实践中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改变着自己的内容和形象。

① [美]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89页。

在当代，保守主义在赞美过去的同时，主张适度的变革，认为应该限制政府的作用，要在机会平等的基础上理解自由，实行适度的民主，让“新阶级”管理社会，提高效率，使之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这种保守主义被称为新保守主义。20 世纪 80 年代英国的“撒切尔主义”、美国的“里根主义”就是这种新保守主义的典型表现。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是指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对社会进行改良。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的美国民主党是这类政党的典型。自由主义经历了一个从古典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资产阶级是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帜走上政治舞台的。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个人主义、个人自由，其中关键是个人的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反对政府权力的干预，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实质。古典自由主义也被称之为自由放任主义。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的社会化这一固有矛盾更加尖锐化了。古典自由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可以在自由市场机制之下和谐发展的神话破灭了。自由主义者不得不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寻求新的意识形态根据，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1926 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文，强调要放弃以极端个人主义为核心的古典自由主义，要以国家权力来限制垄断资本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威胁，倡导实行“公正”的分配制度，用福利政策来缓和社会分配中的尖锐矛盾。1932 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发表接受提名的演说，提出

要“为美国人民实行新政”。他当选总统后从1933年起推行的“新政”，是一场规模宏大、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由一般的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改良运动。“新政”的主要内容有：主张积极扩大和发挥联邦政府的作用，强化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全面干预；主张“公平施政”来调整国内阶级关系，缓和劳资关系；主张福利主义，大力发展公共事业和社会福利。“新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大危机，对美国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是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它强调种族的优劣，强调等级的存在，强调生存竞争、复仇主义、国家至上主义和反共主义，赞美暴力、战争和强权，仇视人类，是一种以对他人的敌视为特征、代表着大垄断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历史上，法西斯主义曾经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危害，尤其是法西斯主义挑起的世界大战更是贻害无穷。这种意识形态因为其反人类的本质而遭到了人们的唾弃。

民主社会主义是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从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中蜕化出来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和派别。它以抽象的人性论、人道主义为其理论基础，是全世界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社会党国际）的意识形态，其实质是社会改良主义。它主张：第一，指导思想多元化。1951年社会党国际发表的《法兰克福声明》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国际性运动，它不要求观点严格一律。不论社会党内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或其他的分析社会的方法

上，不论他们是宗教原则还是受人道主义的启示，他们都是为共同的目标，即为社会公正、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制度而奋斗。”第二，政治自由、民主。1951 年社会党国际成立大会通过的宣言称：“没有自由，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才能完成。而民主也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能充分实现。”主张通过议会斗争，利用资本主义民主参加议会选举，争取多数，取得驾驭国家的权力。第三，经济民主。主张不必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主张实行“混合经济”体制，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并不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先决条件，在重要的生产部门必须有私有制存在。主张增加生产、充分就业，提高生活水平，实现社会保险与收入和财产公平分配，实行工人参与制等。第四，实行多党制。1951 年社会党国际正式成立时通过的宣言指出：“民主需要有一个以上的政党存在和彼此反对的权利。”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一党制领导，它一概攻击为“一党独裁”、“极权主义统治”，是“对自由和世界和平的威胁”。第五，在党际关系上，它强调社会主义运动是一个国际运动，不能强求一致，不必在意各社会党的信仰和方法上的一致性。第六，奉行独立自主与和平的国际政策。反对军备竞赛，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合作，支援第三世界。积极参加诸如生态环境、能源危机、失业、饥饿等世界性问题的讨论和解决等。

基督教民主主义是基督教民主党、天主教民主党的意识形态。作为教派的党，基督教、天主教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存在，例如德国中央党、意大利民主党等。但作为面向全体选民的党，则是在二战后才出现的。主要有德国基民

盟—基社盟、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比利时的基督教党等。基督教民主主义坚持三个基本原则:第一,基督教原则。即基督教的宗教和道德原则。它不是强调宗教本身,而是它的“原则”,即“人格主义”。它的精髓是强调全面发展的人的个性的重要性。第二,民主的原则。它主张建立多元化的社会结构。民主是和多元主义相联的,主张“横的”和“纵的”多元主义。“横的”多元主义是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有平行的和竞争的机构,例如基民党和社会党、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等;“纵的”多元主义是指最大程度地支持政治、经济和社会民主,尽可能由基层决定和提供情况。要权力下放,以防中央集权。[①] 第三,一体化原则。主张国际关系一体化,不要对立。一方面,它支持国际和解,特别支持欧洲一体化;另一方面,它主张阶级调和,建立具有广大群众基础的人民党。基督教民主党常常把自己作为“跨阶级”的党,十分重视“联系群众、动员群众”的工作。

生态主义是绿党所坚持的意识形态。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生态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绿党认为,要用一种全新的观念来对待整个世界的发展。绿党主张:第一,在政治上,建立各种“生物区组织”来取代国家。生物区组织是指按照文化传统、民族习惯、社会风俗、语言文字和生物分布的标准划分而成的区域群体。绿党认为,在这种划分的基础上实行区域自治,就有可能避免战争和压迫。现有的民族国家是一种

① 参见梁琴、钟德涛:《中外政党制度比较》,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第 329 页。

固有的危险，它巨大的权力集中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竞争、剥削和战争。绿党反对军备竞赛，主张和谐整体发展。第二，在经济上，绿党以生态优先原则为指导，主张对目前的经济制度和经济行为进行彻底改造。人类应该变消费性经济为保护性经济，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和创造利润转变为满足人们必要的需求上来，减少浪费和污染，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2.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它是德国人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积极参加当时的革命实践活动并“创造出新的天才世界观”的结果。它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它为共产党人分析、研究客观物质世界及社会历史运动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科学地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资本主义由于存在着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资本主义本身无法克服，因此，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都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由于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代表着人类的前途，因此，肩负着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由于建立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现实基础之上，使其由空想变成了科学。

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指路明灯。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指导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抵制和排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1917 年，俄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及其以后党的领导人斯大林高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伟大旗帜，坚持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思想，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卓越贡献。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理直气壮地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正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不能丢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相结合，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获得和加强了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二)明显的政绩

执政党执政所获得的明显的政绩，即执政给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带来符合其内在规律的实际效果，是其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之一。执政党与现代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执政党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在发展中国家，执政党不仅是现代化的领导者和推动者，也是社会稳定的核心力量。中国执政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社会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取得了明显的政绩。

人们对执政党政绩的观察，往往比较注重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效果。"为了使共同体中的成员能够认为统治者的指挥地位是具有合法性的，那么就需要这种地位明确地表现出它

所具有的公共福祉的活力。”①谋求执政或已执政而想长期执政的政党，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大多是因为其务实的经济纲领或所取得的经济业绩的作用。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在刚刚获得执政地位的初期，一般以谋求经济发展和满足部分民众经济利益需求为主要手段来巩固执政地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通常是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允诺中获取执政地位的，为了本国的经济发展，它们可能会不择手段（包括发动侵略战争）。例如，美国为了自己战略利益的考虑，于 2003 年 3 月 20 日，不顾国际社会强烈的反战呼声，纠集少数国家悍然地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公然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导致大量伊拉克无辜平民伤亡，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苏共丧失执政地位，是与经济建设没有搞好，导致人民对其产生信任危机，从而动摇了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密切相关的。苏联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开始形成的以高度集中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和战后恢复国民经济时期，曾经起到过积极作用。但是，这种体制存在着严重弊端。其中最突出的弊端主要有：第一，缺乏刺激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集中过多，统得过死，企业缺乏发展生产和改进经营的内在动力，广大劳动者在生产中缺乏主人翁感，其积极性和主动性不能得到有效发挥。第二，不尊重经济规律，排斥市场的作用。第三，落后的粗放经济增

① ［法］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佟心平、王远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7 页。

长方式长期不能改变，经济效益低下，缺乏竞争力。这种经济在国际市场上与西方资本主义进行竞争时，必然处于下风。第四，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必然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导致官僚机构庞大，官僚主义横行，政府效率低下。同时，由于高度集权，在政府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阶层，这一阶层严重脱离群众，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而是为自己谋取利益，与广大人民的矛盾日益尖锐，日趋失去群众的信任和拥护。第五，经济结构严重畸形，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显著的提高。从50年代后期起，美苏开始争霸。为了满足军事上的需求，苏联一贯侧重发展军火工业和重工业，导致农、轻、重比例失调。这严重影响了苏联经济的健康发展。尽管自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导人对这种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进行了改革，但是，从总体上说改革没有取得成功。进入20世纪80年代，长期积累的经济恶果导致苏联经济急剧恶化。到1991年12月，国民生产总值下降20%，财政赤字达3000亿卢布，通货膨胀率高达300%，经济已全面萎缩。经济的严重不景气，导致人们对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产生了信任危机。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民主政党，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创立于1954年，自1965年建国以来，一直以绝对优势一党执政）、马来西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成立于1946年，是马执政党联盟国民阵线中第一大党，一直在马政坛上起主导作用）、埃及民族民主党（自1978年成立一直为执政党）、突尼斯宪政民主联盟（简称宪盟，成立于1920年，1956年突

独立后,取得政权执政至今)、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简称复兴党,成立于1947年,1963年上台执政至今)及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简称复兴党,成立于1947年,1968年上台执政直至2003年美英等国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结束)之所以能够长期执政至今,注重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逐步使人民的生活得以改善,提高了执政的合法性是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领导中国人民敢叫日月换新天,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卓越成就: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其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向国内外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有资格、有能力执掌中国政权。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使中国人民以极大兴趣和史无前例的参与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主战场。2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的增长,GDP已达世界第六位,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节节升高,使我们党获得了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普遍认同,执政党的合法性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三)科学的制度

科学的制度是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最重要的基础。执政党取得执政地位后,要使自己保持足够的合法性,得到民众的认可和继续支持,执政党就必须想方设法建立一种科学的制度,这种制度能够较好地体现执政党与民众之间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既能保证党的执政地位,又能使民意得到顺畅的表达。制度的作用是明显的。正如波普所说:"我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我们渴望得到好的统治者,但历史经验向我们表明,我们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人。

正因为这样,设计使甚至坏的统治者也不会造成太大损失的制度是十分重要的。"①对于执政党来说,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当执政党的制度无法反映民众的要求(尽管不少政党主观上在这方面有强烈的愿望),民众对执政党的代表性产生怀疑,执政党和民众之间就会逐渐产生矛盾,乃至发生冲突。在此状况下,执政党的合法性无疑会受到损害。以苏共为代表所建立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尽管自己声称所代表的是全体人民,但人民的参与愿望是无法在其制度的范围内实现的。最后遭到了人民的遗弃,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丧失殆尽,失去了执政地位。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土耳其、墨西哥、智利以及部分非洲国家的长期执政的政党是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为主要手段来换取民众支持和认同的。但是 90 年代以来,这些长期执政的政党无一例外地先后失去了执政地位。其原因并不是在于它们在执政的过程中治理经济无能,恰恰相反的是大部分执政党使它们的国家摆脱了贫困和落后。当脱贫以后的民众又有了对民主政治和社会平等的新追求时,执政党制定的制度因不能满足他们的这种要求,因而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从而被逼下台。邓小平在深刻分析和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存在的主要弊端时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

① 参见赖辉亮、金太军:《波普传》,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33 页。

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没有好的制度,“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的伟大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①]。

科学的制度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一,是指民主制度。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民主的”这个词,在德语里是“人民当权的”[②]。在不同的层面上,民主具有不同的意义:从制度层面看,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和一种国家形态,即民主制度和民主政体;从人民权利的层面上看,民主是指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从组织管理层面上看,民主是组织管理的民主原则;从思想观念层面上看,民主是指民主观念和民主精神。执政党应注重民主制度建设,增强执政的合法性。在具体的实施中,要实行和用好选举制度。选举是执政党获得合法性的一条根本途径。哪个国家的选举比较规范,执政党的合法性就强;哪个国家的选举不规范或根本就没有选举制度,执政党的合法性就弱。一个执政并想长期执政的执政党,要尽可能地实行并完善选举制度,使之科学化、规范化。其二,是指执政党要在宪政制度的范围内活动。执政党要在宪政制度的范围内活动才是合法的,才能使自身具有政治合法性。执政党要正确处理党和政府、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现党和政府、中央与地方的制度性分权。对此部分的论述,本书将在第三章予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3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2页。

以展开。

四、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危机

纵观人类政治历史舞台，政权的危机无不与其合法性基础的丧失有关，合法性危机往往是政治变革或政治变迁的根源和前兆。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执政的合法性危机。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Identitaskrise）。"[①]人们对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会产生怀疑、不信任，直至抵触和反叛。执政党为什么会出现执政的危机？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所决定。

（一）政绩合法性的困局

显著的成绩固然是执政党取得和维持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因素，但是，这种因素的维持是有一定限度的。亨廷顿在提出"政绩合法性"的同时，提醒人们也要注意"政绩困局"问题。他指出："在民主国家，统治者的合法性通常依赖于他们满足一些关键选民对他们政绩的期望。但是这一制度的合法性却建立在程序之上，建立在其选民通过选举选择其统治者的能力之上。那些在职的统治者不可避免地会作不出政绩，这样，他们就失去了合法性，也就会在选举中被击败。一群新的统治者会接替他们。因此，统治者失去统治的合法性导致了这个体制重新肯定其程序的合法性。不过，在除一党制之外的威权体制下，在统治者的合法性和政权的合法性之间都不可

① ［德］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5 页。

能作出明确的区分。政绩平平既瓦解了统治者的合法性,也瓦解了这一制度的合法性。"[①]罗斯切尔德也认为,如果政治体系能长期满足成员的需要和利益,也可赢得统治的合法性,但如其长久以来表现得昏庸无能,亦会慢慢蚀耗其合法性。[②]

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会出现固有的周期性波动,其增长速度也不可能永远保持令人满意的水平,靠政绩来作为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是靠不住的。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政权虽然维持了30多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印尼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直接导致了苏哈托政权的解体。印尼虽然不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策源地,但却是金融危机中遭受损失最为严重的国家,印尼盾累计贬值50%。金融危机引起国内局势的动荡,1998年5月21日,眼看众叛亲离,大势已去的苏哈托只得宣布辞去总统职务,由副总统哈比比代理总统。就这样,统治印尼长达32年之久的印尼政坛强人苏哈托无可奈何地丢失了政权。这说明,没有民主政治的保障,持续的经济增长是难以维持的。

中国社会处在转型时期,各种不稳定因素大量存在,这些不稳定因素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得以缓和。但是人民群众

---

① [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9页。

② J. Rothschild, "Political of Legitimacy in Contemporary Europe", in B. Benitch (ed.) Legitimation of Regimes,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79, pp38—39. 转引自白钢、林成华:《论政治的合法性原理》,《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的要求会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增多，对党和政府的期望也不断提高。这就要求党和政府作出更多承诺。而这一切都有待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我们只要客观地予以分析，就会发现中国要保持以往那么快的增长速度有很大困难。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经济的发展要受多方面的因素影响。有时，不是本国自己所能左右，还要受到国际的影响。1998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就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造成很大影响。因此，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把希望都寄托在经济长期快速增长上不是明智之举。

(二)主流意识形态的淡化

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是和该党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和坚持所分不开的。如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坚持的是民主社会主义等。建立在不同民族、地域、宗教基础上的文明冲突，基于不同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的思想交锋，是长期困扰执政党对自身意识形态定位的重要因素。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政党在历史上大肆鼓噪民族沙文主义、排外主义和极端宗教主义，给人类历史造成了重大创伤。人们痛定思痛，使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逐步地走向了务实化的方向。发端于美国的 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美的一些资产阶级政党在自己的意识形态中对外“抄袭社会主义”，对内“抄袭了反对党”。意识形态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客观上促进了各国政党之间意识形态的相互接近。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出现了一股非常重要的思潮，这就是“第三条道路”思潮。它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是介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

由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东欧各国和苏联相继发生了执政的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社会主义制度被推翻的历史悲剧。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根本的原因是执政党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社会主义执政党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全体党员、干部，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但是在实践中却存在着两种倾向：要么借坚持马克思主义之名，拒绝接受任何新生事物，把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僵死的教条，使其失去生命力；要么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除了用马克思主义的名称做假相外，实际上却抛弃了它的所有内容，用其他思想和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前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损害是间接的、隐性的，后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损害则是直接的、显性的。在长期执政过程中，苏共对马克思主义机械化、教条化的理解和坚持，脱离了苏联社会的实际，制约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苏联社会就开始出现信仰危机、信心危机和信任危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共从长期的“左”，一下子跳到了右，搞意识形态多元化。他所极力主张的以“多元化”、“公开性”、“民主化”为核心的新思维及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苏联的泛滥，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导致人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产生严重动摇。最后，戈尔巴乔夫竟主动地从根本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造成党内公开分裂和思想混乱。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

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1]在"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旗号下，各种腐朽思想，包括最反动的法西斯主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资产阶级专制主义等纷纷出笼，诋毁马克思主义，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最终造成了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境况。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为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但是，中国社会处在转型当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不再简单地服从和跟随，经济上富足起来的人们逐渐变得求实，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受到冲击。有些共产党员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面前，不能正确地面对资本主义"西潮"、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低潮"和市场经济"商潮"的冲击，不严格要求自己，不注重世界观的改造，思想悄悄起了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产生了怀疑，理想信念发生了动摇。有人信仰宗教，大搞封建迷信活动，坚信李洪志的"法轮大法"；有的党员干部背弃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丧失了党性立场，沉湎于灯红酒绿的生活，贪污受贿，腐化堕落，使党的形象受到了严重损害，极大地败坏了党的威信和党员的声誉，使相当一部分群众失去对党的信任，严重削弱了共产党人对社会的示范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多样化的社会存在，必然会相应地产生多样化的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的多样化，则容易导致各种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相互碰撞和激荡，使思想领域的矛盾和斗争变得异常复杂和激烈。

---

①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7页。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四个多样化”的出现，必然会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影响，不可避免地会与原有的思想观念发生矛盾和冲突。一方面，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的多样化，分配方式的多样化，人们经济收入差距的扩大，造成一些人心理上的焦虑和不安，因而产生了大量思想认识上的矛盾和问题。这便会对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产生影响。利普塞特认为，“一再地或长期地缺乏有效性，也将危及合法制度的稳定。”而退一步讲，“即使一种政治制度具有合理的有效性，如果在任何时候主要保守群体的地位受到威胁，或在关键时期新兴群体被剥夺参与政治的机会，该制度的合法性仍将成为问题”①。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的行为受市场经济规律支配，其内在的动力和目的就是趋利避害，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极易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同时，封建腐朽思想沉渣泛起，西方思潮和观念不断冲击，使得人们的思想认识矛盾变得更加复杂。当前人们思想认识方面的矛盾主要有：马克思主义思想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矛盾；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封建残余思想的矛盾；传统文化积淀与现代文明冲突的矛盾；改革创新与因循守旧之间的矛盾；不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之间的矛盾；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道德观、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矛盾；认识上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以及不同意见之间的矛盾，等等。各种思想认识矛盾时隐时现、相互叠加、错综复杂。这些

① ［美］利普塞特：《政治人》，刘钢敏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3 年版，第 56 页。

都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三)腐败损坏执政党的形象

腐败像一个毒瘤,严重地吞噬着执政党的肌体。不管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执政党,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也不管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执政党,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执政党,都无一例外地存在着一些掌权者的权力腐败现象。譬如一批批在政界呼风唤雨的人物被曝光,其中不乏有些国家的第一把手——国家总统、总理、首相等纷纷卷入腐败的丑闻之中。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竹下登,韩国前总统全斗焕,德国前总理科尔,意大利前总理克拉克西、秘鲁前总统藤森等等,这些昔日风光无限的政界名人运用各种不同的手段去谋取私人的利益,引起政坛的动荡不安。

在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官员腐败一直是一个长期无法克服的恶病。例如,日本自民党长期一党执政局面的结束,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政治权力的腐败所致。在自民党执政38年的历史中,对其执政地位构成最大威胁的,并不是在野党的反对和抗争,而是自民党自身的腐败。金权丑闻一直伴随着自民党的长期统治。战后日本较大的政治丑闻有60余起,大部分与自民党有关,正是一系列重大腐败案,诸如"洛克希德事件"、"利库路特事件"和"金丸信事件"等重大受贿案的发生,导致了自民党执政的政治体制的崩溃。在发展中国家,腐败情况也是触目惊心。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自1929年到2000年连续执政71年,墨西哥从一个封闭、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发展成为一个对外开放、经济较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在2000年12月福克斯新政府接手墨西哥时,墨西哥国

内生产总值达6700亿美元,在世界排名第13位,经济增长率为7%,失业率仅为2%。[1] 革命制度党缘何而失去执政地位?执政党的腐败是重要原因之一。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革命制度党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利益集团。从执政党内部到政府各部门腐败无所不在,大小官员都有捞取好处的办法。一些政府要员借国营企业私有化之机,大量侵吞国家资财,国有资产的流失严重。仅从近年来陆续曝光的重大贪污腐败案看,上至萨利纳斯总统及其亲属、内阁部长、州长、副总检察长等政府要员,下及政府一般公务员,都牵扯其中。前总统萨利纳斯的胞弟劳尔·萨利纳斯在私有化过程中非法致富,聚敛上亿美元。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内也确实存在着权力腐败的现象。面对腐败,许多执政党既存在着斗争不力乃至很不得力的现象,也存在着包庇和纵容的现象和行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崩溃,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权力腐败孳生蔓延斗争不力,致使腐败恶性发展,严重地损害了执政党的形象和威信,严重地损害了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使党脱离群众,丧失人心,从而威胁到了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党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性质,始终坚持做到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它的执政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源泉就是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

---

① 王志先:《执政老党大权旁落——墨西哥革命执政党丢失政权剖析》,《当代世界》2001年第10期。

建设时期，无数共产党人所发挥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广大中国人民心中树立起了党的光辉形象。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少数党员干部的腐败现象严重地败坏了党风、政风，破坏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损害了党的形象，也势必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构成潜在的威胁。同时，尽管党对反腐败工作一向高度重视，但是彻底铲除腐败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一蹴而就。当一个执政党的党员对本党的纲领和章程所确立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动摇和转移时，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便会受到最严峻的挑战。因此，江泽民明确指出："要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充分认识反腐败的重大意义。"

我们要针对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所出现的危机，未雨绸缪，对症下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与时俱进，坚持党的先进性，坚持执政为民，增强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中国人民的坚强领导核心和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

第三章　执政党的执政机制

执政党的执政机制是有关执政党有效执政的关键问题。执政党执政与哪些权力部门相关？执政党的执政机制如何运作？不同执政党的执政机制有何异同？这些都是我们探讨执政党问题所必须回答的问题。通常理解，“机制”具有三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指事物各组成要素的相互关系；二是指事物在有规律性的运动中发挥的作用；三是指功能发挥的作用过程和作用机理。概括而言，机制就是“带规律性的模式”①。执政党的执政机制，是指执政党控制国家政治生活的程序和方式，及其自我内部调节的能力。它通常包括执政党与代议机构、政府和司法机关的关系，即执政党对立法、行政和司法这三个部分进行控制所采取的方式方法等内容。

一、执政党与代议机构

近现代社会所实行的民主，是由公民通过选举代表（或议员）组成代议机构来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间接民主制。

①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3 页。

这种间接民主制就是政治学所界定的“代议制度”。中国和西方国家尽管性质不同,但在国家权力的行使上实行的都是代议制度。这种代议制度在西方国家叫议会制度,而在中国叫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以议会为国家政治活动中心,政府由议会产生,并且对议会负责的一种政治制度。议会制度的主要特点是:议员由公民选举;议会执行立法职能,并且享有监督政府的某种权力;国家元首不论是君主还是总统,都不掌握实权;内阁由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一个党或几个党组成,内阁对议会负责;如议会对内阁的施政方针不支持,或通过对内阁的不信任案,内阁必须辞职,或者要求国家元首下令解散议会,重新选举。执政党执政机制的基本的首要问题,便是执政党与代议机构(议会)[①]的关系问题。执政党与议会的关系是密切而不可分割的。在不同制度的国家,执政党与议会的关系不同,如西方国家执政党与议会之间的关系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与议会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在实行同一制度的不同国家,执政党与议会之间的关系也是有一定差别的,如在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总统制国家的执政党与议会之间的关系同实行议会内阁制国家的执政党与议会之间的关系是不尽相同的。

(一)西方执政党对议会的控制方式

西方政治制度是按照“三权分立”原则设计的。在政治学说史上,最早明确提出“三权分立”原则的是法国政治思想家

---

① 在不同国家,议会的名称不同,美国称之为 congress(国会),英国叫作 parliament(议会),法语 leparlement 通常也译作议会。本书皆用议会统称之。

孟德斯鸠。他主张国家应当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立，使之“彼此牵制”、“协调前进”。三权分立制度为绝大多数的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机关组织与活动的基本制度。但因各国国情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形式。美国是实行三权分立制度的典型国家，总统和国会议员都分别由选民选举产生，直接对选民负责。国会行使立法权，总统行使行政权，联邦法院行使司法权，这三种权力机关既互相独立，又互相制衡，不存在最高权力机关。

由于议会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政党总是千方百计地在议会中寻求自己的立足之地。西方实行总统制国家的议会，一般拥有立法权、财政预算批准权、建议和批准总统对其所属行政官员的任命，建议和批准总统对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宣告惩治叛国罪，弹劾审判最高法院法官，通过弹劾案撤换总统等。实行议会制国家的议会，除了上述权力之外，还有组阁权（通过多数党）、倒阁权等。政党只有进入议会，才能取得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机会，当它在议会选举中取得多数席位成为执政党而拥有组阁权时，便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政党都把议会看作是为本党谋利益，使本党开启最高权力之门的钥匙。在西方国家是议会孕育、培养了政党，议会是政党的栖息之地，又是政党的活动舞台，是政党控制政治权力的根本途径，政党的活动贯穿于议会活动的始终。西方国家大都存在着两党和多党的状况。这些政党都是合法的，宪法和法律允许它们通过政治竞争活动来获取执掌国家政权的地位。因此，每一个政党都具有成为执政党的潜在可能性。政党主要是通过竞选取得议

会多数,由此掌握、控制政权,在议会中进行党的活动,否则,政党的作用将无从发挥。同时,议员具有特殊的政治社会地位,能够给其带来巨大的利益。西方国家议员具有以下特权:(1)言论免责权(在议院内的发言免受追究);(2)人身免捕权(在议院开会和往返途中不受逮捕);(3)获得高报酬权。例如,从2000年1月起,美国议员平均月薪为97497元。除月薪之外,议员还享有其他特殊待遇,如可以分配到至少有三室一套的办公室,领到可雇用18名助手和工作人员的津贴,每年可免费来往于华盛顿和其选区33次,还有电话、电报津贴和数千元的文具费。议员还享受健康保险、人寿保险和较优厚的退休年金等。[①] 这些优厚的待遇是政党及其成员趋之若鹜地争当议员的强心剂。

政党对议会的控制和影响,主要是通过在议会中组建议会党团(parliamentary groups)及其本党的委员会来实现的。在西方国家的议会中,不论是多数党或少数党,也不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反对党,都有议会党团的存在。当一个政党在议会内具有一定数量的议员时,就组成议会党团,并形成法律规定或法律惯例。所谓议会党团,就是指议会中同一政党或政党联盟的议员所组成的党派组织。议会党团作为各政党或政党联盟在议会中的最高权力机构,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一个政党单独组成议会党团。大多数具有一定数量议员的政党都采取这一组织形式,并以该党名称命名。二是由两个

① 参见徐育苗:《论中西"代议制度"的主要差异及其相关性》,《政治学研究》2001年第4期。

以上的政党的议员联合组成一个议会党团。如联邦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联合组成一个议会党团，称为基督教党团。三是跨国议会党团。在某些区域性的国际组织的议会（如欧洲议会）中，由各成员国的有关政党的议员组成的政党组织。议会党团的组建，应符合议会规程的规定。一般而言，具有一定数量议员的政党方有权建立该党的党团。拟建立党团的政党要向议长或议会领导机构提交一个签名或名单。如德国规定联邦议院中凡拥有5%以上议席的政党可以组建该党党团；法国规定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分别要达到30人和15人，意大利参、众两院分别要达到10人和15人，方可组建议会党团。当然，也有的国家对议会党团的组成没有法律规定。一般实行两党制的国家，各党可在同一议院分别自行建立党团。如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主持党团工作的领袖由该党议员选举产生。一般而言，议会中各党提出的议长候选人不论当选与否都是该党党团的领袖。但如果他同时是政府的首脑或总统制的总统，即成了全党的领袖，就不再兼任议会党团的领袖。由于执政或参政是西方政党一切活动的目标，因此，各党的领袖、精英一般都经由议员选举而进入议会。各党虽然还保留着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系统，其中央机构仍称“全国委员会”，设有主席职务和适当人数的班子。但在非大选年的情况下，党的全国组织机关只从事党务、财务的管理，与党的大事和活动关联不多。

议会党团的主要功能是了解本党或联盟党的议员的意见，协调他们的立场和行动，使他们在议会中采取一致的行动，以便使本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得以贯彻，从而维护本党

的利益。党团的主要活动是以群团的身份参与议长提名、内阁人选的审议、议会活动程序的安排、专门委员会的组成以及各项法案的提出、审议、协商和表决,等等。通常在议会正式表决之前,各政党通过议会党团实际上已经预先决定了各自的立场和态度。在提案提交议会之前,党内首先进行审议和审查,尽可能取得共识;政党为了达到本党的目的,意图通过或阻止议案的通过,便会在会下与其他政党和组织力量进行协商,达成谅解和妥协。一般来讲,执政党的议会党团的任务是保证本党政府地位的稳固和各项法案获得通过。而反对党的议会党团则视政府议案对自己的利害关系而决定反对或有条件的支持。在多党制国家,各政党往往通过议会党团同其他政党的议会党团进行纵横捭阖,决定进退,影响整个政局。为对各种专门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及时调整各方面的利益,各议会党团都组织各种专门委员会,以便控制某一方面的事务。如美国两党便在国会两院中设立了竞选委员会、政策委员会、委员会事务委员会等委员会。竞选委员会主要负责为该院本党议员竞选连任或非在职的候选人募集资金、提供帮助;政策委员会,主要通过磋商协助党的领袖制定立法计划和策略;委员会事务委员会,主要负责挑选本党在国会各常设委员会的委员人选。

议会党团的地位因各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选举制度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一般来说,议会制条件下的议会党团比总统制条件下的议会党团的地位和作用要大一些。在实行议会内阁制的国家,党的工作重心随着党的领袖及骨干当选议员而转移到了议会。这样,由这些人组成的议会党团就成了实际

上的首脑或心脏部分，通过党团组织而实现政党对议会乃至对内阁的领导或指导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执政党执政后，议会就成了执政党的立法和议事工具。如英国工党，其议会党团的权力和地位十分突出。党团与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设主席、副主席），名义上是平行机构，都直接向工党的年会负责，但党团及其领袖拥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和特权，甚至凌驾于全党之上。而在实行总统制的国家，例如美国，因为议员和总统分别由选民选举产生，议会同某一政党是否执政并没有直接联系，多数党并不一定是执政党，议会权力相对较小，再加上美国是联邦制国家，从各地方选上来的议员往往强调其本地利益，这时对党的忠诚就有可能要让位于维护本地区利益的立场，在投票时，往往不一定服从本党党团及其领袖的安排。这就造成美国两党的议会党团在国会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要弱一些。此外，党团的作用强弱除了与政体有关外，还与政党的组织严密程度有关。

为了保证本党议员在议会中协调一致，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往往都制定了严格的党纪党规。对于违反党纪的党员议员，政党，尤其是执政党会给予严厉的处罚。如将不支持该议员在下一届继续参加议员的竞选；可以把本应该由该议员担任的职务推荐给别人；对于严重违纪者予以开除，等等。通常情况，对党员议员最严厉的处罚是除名，这意味着被处罚的议员将失去政党的支持。在政党政治成熟的国家，除名相当于终结了政客的政治生命。为了执行政党的纪律，很多议会党团都实行督导员制度。督导员本来是议会党团建立之前各政党为了督促本党议员准时参加会议和投票等活动而指派的人

员，但在实行了议会党团制度以后，却形成了一项固定的制度，其职责和作用越发广泛和重要。督导员由党的领袖任免，执行领袖的指示，监督本党议员的活动，督促他们按党的要求开展工作。每当议员讨论和投票表决重大问题时，党督们会对本党议员三令五申地说明党的领袖的意见和决定。例如，按照英国议会工作习惯，每一个议员在出席议会会议时，都会接到本党的一份政策倾向说明书，上面用划线的方法显示该党的要求。在标题下划一道线，表明这是一个一般性议案，议员在发言和表决时只要注意维护党的利益就行了；在标题下划两道线，表明这是一个重要议案，议员在发言和表决时必须以党的利益为重，和党的决定保持一致；如果在标题下划三道线，表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议员在发言和表决时无论如何都要服从党的意志和决定，决不允许有与党的意见唱反调的言论和行动，否则，将受到党的纪律的严厉惩处。

执政党为了保证对议会的控制，往往还会采取另外一些措施。例如，执政党要把对自己绝对忠诚的党员送进权力机关。并对于进入权力机关的党员，通常给予其较大的自主权。另外，执政党对于议会中众多的委员会，往往要对两种重要的委员会予以控制。这就是常设委员会(standing committee)和监督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前者主要负责审议法案，为立法工作服务，后者主要负责监督其他国家机关尤其是行政机关的活动。在实行议会内阁制的国家，执政党利用议会多数可以较容易地控制议会大会和工作委员会的议程和内容，使议会活动按照执政党的路线来进行。

(二)中国执政党对人大的领导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当代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则是当代中国的政党制度。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中国的代议机构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广阔沃土，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息息相关，在宪政地位、组织模式和工作方式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

1.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涵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组织形式，它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在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奋斗的重要成果，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②]。

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整个国家机构按照一切权力属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0页。

② 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年9月16日。

于人民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成和运转,各个国家机关以及中央与地方合理地划分职能,使国家权力既避免过分集中又避免不必要的牵扯,从而保证国家的各项工作有序、高效地进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存在着各项政治制度,其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其他各项政治制度赖以建立的前提,反映了中国政治生活的全貌,是具有根本性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以人民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的整个政权体系、政权组织制度,是包含了各级人大以及由它产生的其他国家机关的组成、职权、活动原则和相互关系的制度,是包含了人大与人民、中央与地方国家机构职能划分关系等的制度。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其常设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军队依照选举法选出的代表组成,代表以间接方式选举产生。其代表包括社会各阶层、各民族、各地方、各种团体和政党的代表人物。代表大会由近3000代表组成,每年春季开会一次,会期半个月左右,主要决定一些国家和地区最重要的问题。由代表大会产生一个常委会,200人左右,每两个月开会一次,会期通常五天至七天,作为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经常行使权力的机关,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国家权力。常委会对代表大会负责,受代表大会监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专业分工设若干常设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主要包括:第一,制定、

修改宪法并监督宪法的实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54、1975、1978、1982年先后颁布了四部宪法。尔后，在1988、1993、1999和2004年分别对宪法进行了修正。1982年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宪法的实施，但对实施宪法监督权的程序未作规定。第二，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行政和其他的基本法律。第三，选举决定并罢免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包括选举和罢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成员；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选举中央军事委员会，并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选；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罢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或决定的国家领导人。第四，审查批准和决定国家的重大事项。包括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执行情况的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设置和制度；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决定战争、和平问题等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向全国人民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人民的监督，人民有权罢免自己选出的不称职的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既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又克服了由人民直接决定国家大事的困难，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形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经建立，就成为国家其他制度建立的基础，在国家各项制度中居于决定性的地位。

“议行合一”原则是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设计基础。这一原则最初是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提出来的。他指出：

"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①]它表现为由公社委员会作出决议，同时由各位委员直接管理的行政部门加以贯彻执行，即巴黎公社的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是同一机构。而当代中国实行的"议行合一"体制较之巴黎公社有了很大发展。这主要表现为：第一，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的代表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国家行政、司法机关由代表机关产生，各自对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并受其监督。第二，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不是同一机关，但行政机关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第三，国家权力机关不与行政、司法机关分权，但在职能上存在分工，权力机关行使立法和监督的职能，行政机关担负行政管理职能，审判、检察机关分别担负审判和法律监督的职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由民主选举产生，获得人民全权委托后，即分别选举、决定任命其他国家机关组成人员，产生其他国家机关。中国的政权体系开始于人民代表大会，其他国家机关都来自于人民代表大会，在组织上始终置于人民代表大会的基础之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和司法权，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的最高政治地位、人民意志的统一性和人民民主的广泛性，也体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要求，具有高效、迅速、直接的特点。邓小平在讲到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时指出："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我们说搞经济体制改革全国就能立即执行，我们决定建立经济特区就可以立即执行，没有那么多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我讲的是总的效率。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①

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式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会议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赋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在建国初期的历史条件下，由它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对于团结全国人民，胜利完成当时的革命和建设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政治实现了向人民民主的伟大跨越，开辟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纪元，亿万中国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

主人。1953年，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空前规模的普选，在此基础上自下而上逐级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从而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成立奠定了法律基础和组织基础。1954年9月15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标志着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制度全面确立，国家权力开始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实行民主集中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成立和宪法的公布施行，开创了我国人民民主的全新阶段。为了保障宪法关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各项原则规定，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先后通过了关于我国国家机构的五个组织法。根据1954年宪法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四年，基层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二年。从1954年到1965年召开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全国人代会基本上做到按期举行。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从1953年到1963年先后进行了五次选举，也基本上做到了按时选举。但是，在1966年—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遭到了严重破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连续十年没有召开，直到1975年1月才召开了为期五天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也十多年没有进行，这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受到重大损害。1975年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基层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1982年宪法规定,任期届满的前两个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完成下届代表的选举,如果遇到不能进行选举的非常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全体组成人员的2/3以上的多数通过,可以推迟选举,延长本届大会的任期。但在非常情况结束一年内,必须完成下届代表的选举。"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得到恢复和逐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走上了正常轨道。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邓小平总结我们党和国家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深刻地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摆在党和国家工作极端重要的位置,不断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我们把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范围扩大到县,实行普遍的差额选举制度;完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职权,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共同行使国家立法权,共同监督宪法实施,并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织建设;在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赋予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较

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职权。这一时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现行宪法和四个宪法修正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了200多件现行有效的法律，国务院制定了650多件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了7500多件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600多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有力地推动和保障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①

50年来的历程充分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能够保证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党在国家政权中充分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的最好实现形式，同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这个制度健康发展，人民当家作主就有保障，党和国家的事业就顺利发展；这个制度受到破坏，人民当家作主就无法保证，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会遭受损失。长期以来，全国各族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牢牢地把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我们国家和人民能够经得起各种风浪、克服各种困难、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可靠制度保证，也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可靠制度保证。

3. 中国执政党对人大的领导方式

在以上论述中笔者已经谈到，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① 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年9月16日。

表是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军队、特别行政区选出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没有党派色彩。在选举中，代表候选人不以党派的身份出现，不分你是哪个党的，他是哪个党的。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国家事务实行领导。因此，在讨论、协商候选人提名的过程中要解决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候选人名额的分配标准。中共为了实现执政党的领导地位与作用，通常中共党员的全国人大代表约占总代表人数的65%左右；同时，为了有利于实行多党合作，中共希望民主党派人士在人大代表中占有适当的比例，8个民主党派成员及民主人士的人大代表约占全国人大代表总数的17－19%左右。[①] 这样的比例结构，对于保证中国共产党在人大中的领导地位，对于团结民主党派并发挥其参政党的积极作用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由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决定了它在当代中国社会执政的主体地位，并且是我国惟一具有执政主体资格的党。这种由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所形成的政治格局，决定了在我国不存在执政主体被替代的可能性和实行任期制的特点。中国的各民主党派不是反对党，它们是代表着各自联系的那部分群众利益的，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的、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党。这种特点是中国执政党不同于西方政党执政的一个基本特点。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具有这种执政地位，并且它在过去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享有极高的威望，因此造成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

① 梁琴、钟德涛：《中外政党制度比较》，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53页。

间，执政党对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采取了一种直接指挥人民代表大会工作的方式。这种由党组织直接指挥代议机构工作的情况，表面看起来似乎加强了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是一种直截了当、便于操作的领导方式，但实践证明，这种方式破坏了人大制度的正常运行，不利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不利于扩大人民民主，也不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也是明确载入中国宪法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都要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要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科学规范党委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支持人民代表大会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能。党不代行人大的职权，它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保证人大依法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工作。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同充分发挥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是完全一致的。具体而言，执政党对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主要有直接领导和间接领导两个方面：

第一，执政党对人大的直接领导，主要是执政党就国家的重大问题以及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人选，直接向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建议案。作为执政党，要对国家进行政治领导和国家的宏观发展负责，因此，就必须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国家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些重大的方

针政策往往以建议案的形式，经由人大主席团提请人大会议或人大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使之变成国家意志，交由国家行政机关或其他国家机关予以实施。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人选，执政党首先提出，经与参政党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协商、征求意见或作出调整之后，向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人事建议，由人大表决而任命或罢免。

第二，执政党对人大的间接领导，主要是通过人大中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发挥领导作用。当前人大机构中有三种党的组织形式：一是在人大机关建立中共党委，负责机关中中共党员的教育、管理；二是在人大开会期间，大会和各代表团建立中共临时委员会，组织人大代表中的中共党员积极参加会议的各项活动，以保证会议的顺利召开；三是在人大常务委员会里设立中共"党组"，由中共中央（在地方为党委）指派党员委员长、副委员长（在地方为主任、副主任）等人组成，直接受中共中央（在地方为党委）的领导。执政党通过这些党组织来对人大进行领导，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对人大的工作方针作出指示。执政党根据形势需要作出人大工作的指导方针，人大常务委员会的党组必须接受，并就此提出贯彻执行的建议或工作计划，报经党中央批准后，提请人大主席团或常委会和人大会议审议通过。其二，对人大立法工作进行领导。对政治类型的立法案，在制定之前由人大常委会党组把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报请中共中央批准。重要的立法草案基本成熟后，人大常委会党组要报送中共中央审批后再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常委会进行审议通过。其三，对人大重要工作作出批示。人大党组经常就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工作向

中共中央及地方同级党委请示汇报，从而得到中共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领导和批准。同时，执政党党员干部作用的发挥对执政党对人大的领导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执政党的干部在人大中兼任重要职务，对于党的主张在人大中贯彻执行十分有利。第二，在人大及其常委会中执政党党员具有多数优势，便于体现执政党意志的各种立法和有关议案得以顺利通过，并具备权威性而得到有力的贯彻执行。第三，执政党的党员代表就执政党的主张和建议进行宣传和解释，赢得非党代表的支持和赞同。第四，执政党在党员代表中实行严格的纪律约束，保证全体党员代表的行动一致。

由于中国的政党制度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中国大陆的其他八个政党皆有各自的党员当选为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委员。在制度上，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宪法或宪法惯例保障共产党和其他八个政党分别享受执政权和参政权；另一方面，执政党和参政党在人大均不组成党团，不以党团名义行动。党在人大的党组并不是履行其执政党职能的议会党团，而是党行使其对人大领导权的组织设施。其他政党虽然各有代表进入国家权力机关，但是他们不以政党的名义在人大内活动，更谈不上在人大与共产党对阵；他们在人大工作的目的不是取代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而是帮助共产党将其政策更好地转化为由人大所通过的法律或决定。

在当代中国，执政党对人大的领导方式是有效的，成功的。但是，在执政党与代议机构的关系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一

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诸如在体制上还存在着党组织直接指挥人大工作的情况。尽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设计上和法律规定上都是优越的,有着资本主义民主政体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在实践中也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但不得不承认,直到目前,它的实际运行与宪法和法律规定仍然存在不少差距。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伟大功效"显示得不够,它的优势在一些方面仍处于应然状态。实际情况是民主不够,效率也不够。尤其是在发挥人大制度的决策效率方面,由于历来存在的党政双轨行政、"党委决策、政府执行"的传统决策体制,有关重大事项的决策基本上游离于人大制度所规定的"人大决定、政府执行"的体制之外,这在地方更突出,以至人大制度的决策效率优势在实践中没有得到有效运用。

执政党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借鉴世界政党政治一些带共性的成果,树立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使人大制度的优势从应然状态变为实然状态,更好地发挥其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做到把党的领导、发扬民主、依法办事统一起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杜绝直接向人大发号施令的做法;人大及其常委会要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作出的决定和决议既不能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也不能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违背;执政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带头遵守和执行人民代表大会所制定的法律和通过的决议,自觉接受宪法和法律的监督。理顺执政党与代议机构的关系,使其各负其责,各尽其职,做到既要加强和改善党对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又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中国执政党对人大的领导方式与西方执政党对议会的控

制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是，在我国，只有人民才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真正实现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资本主义国家虽也标榜“主权在民”，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决定了他们只能是资产阶级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只能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其目的在于巩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二是，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与共产党长期合作共事的参政党，不是在野党，更不是反对党。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多党制或两党制，有执政党，有反对党和在野党，各党派明争暗斗。但不论哪个党派上台执政，都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都要极力维护自己及其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西方议会无论是一院制还是两院制，都是各党派争权夺利的场所。三是，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国家机关。各国家机关分工不同、职责不同，但目标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全国各族人民服务，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这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机关“三权鼎立”、相互掣肘，从根本上讲是完全不同的。[①]

二、执政党与政府

政党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获得政权并控制政权。因为，政党只有成为执政党，即只有取得政治上的统治权力和控制政

① 参见吴邦国：《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年9月17日。

权机关才能实现自身的政治理想。政权机关通常是指政府。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政府泛指国家权力的所有机关,既包括行政机关,也包括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狭义的政府,只是指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即掌握行政权力的机关。我们所研究的执政党与政府的关系,主要是指执政党和狭义上的政府即作为行政机关的政府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探讨执政党对政府的控制方式。

(一) 外国执政党对政府的控制

当代西方国家的执政党,不论是议会制还是总统制下的执政党都是体制内的政党。它们的执政,从本质上看,都是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执政党对政府的控制,在执政内涵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从横的方面考察,西方国家政党的执政客体不包括全部的国家政权,而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即国家的行政权力。因此,西方的执政党是执掌国家行政权的党。从纵向角度看,西方执政党的执政客体并不都包括从上到下的国家行政权。执政党执掌了国家最高行政权,却不一定执掌地方的行政权。民族民主国家的执政党对政府的控制情况也不尽相同。

外国执政党对政府的控制方式,虽情况各异,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

1. 执政党控制政府的组成

执政党的执政活动并不是在自己党内进行的,而是由执政党派出领袖人物进入政府并依法组织政府。执政党对政府组成的控制,往往因政治体制的不同而不同。在实行议会内阁制的国家,政党是通过在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而获得组阁

权。在实行总统制的国家,政党是通过其领袖参加并赢得总统选举,从而组织政府。

议会内阁制国家执政党对政府组成的控制形式,通常是一个政党在大选中获胜,取得议会多数席位成为执政党,它就拥有组阁权并实施组阁。执政党领袖为内阁首相(总理),他在全党充分参与的基础上产生,尔后便被赋予组织内阁的权力。执政党对政府的控制,往往集中体现在内阁首相(总理)对内阁的控制上。例如,英国执政党的领袖(内阁首相、总理)在组阁中的权力就非常大,他提出内阁成员和各部大臣的名单,一般都会得到议会同意并得到国王的批准。内阁成员的任用、调整、更换或内阁改组,都由他来决定,基本上是大权独揽。在英国的宪政体制中,内阁具有不可替代的政治权威。根据宪法和法律,内阁是政府的核心,是英国社会的组织和领导机关,更是国务的决策中心。普通文官无论政治信仰如何,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内阁的命令。内阁是英国最高的行政机关,英国执政党通过控制内阁的组成来达到控制政府的目的。当然,有的执政党的领袖在组阁时的权限是很有限的,往往受制于党的组织,服从党的整体安排。例如,根据澳大利亚工党的组织原则,在其组阁时工党的领袖只有建议权,没有完全组阁权。部长和内阁部长人选由工党议会党团投票决定,并且按得票率的高低安排职务。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工党政府总理在组阁问题上的建议权有所增强。

总统制国家的执政党对政府组成的控制形式,较议会内阁制国家执政党对政府的控制力要小得多。由于总统所在的党即为执政党,即使他所在的党在国会中是少数党,也不影响

它的执政党地位。执政党的组阁是由总统来进行的。执政党对总统组阁的指导和影响是比较松散和微弱的。

民族民主国家中,执政党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控制程度要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领袖担任总理,并根据《宪法》规定,从当选议员中提名各部部长、政务长、政务次长组成内阁,同时议长也由行动党所控制。行动党的治国理念就便于通过法律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和政府政策。突尼斯宪盟主席兼任国家总统和三军最高统帅,副主席任政府总理。总统行使国家最高行政权,总揽大局,协调党政关系并通过法律程序把党的干部安排到政府部门担任重要职务,保证各部门按照党的治国方针制定和执行政策。

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牢固掌握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例如,越南共产党在安排中央政府的人事时,保证政府总理、副总理、部长基本上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担任。政府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必须征求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党对政府决策有最后决定权。越共还在国家机关中设立党组,负责落实和检查党的方针政策贯彻落实的情况。各级地方党组织也都掌管着同级政府的行政事务。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同时兼任国务委员会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

有必要指出,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对政府的领导是不成功的,乃至是完全失败的。在取得政权以后,苏俄布尔什维克党由一个领导革命暴动的党变成了执政党。作为执政党如何适应地位的变化,如何管理国家,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都是必须正视的问题。在实践中列宁逐渐认识到,应该把执政前后革命的方式、方法区分开来,不能

用急风暴雨的方式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遵循客观规律，实现执政方式的转化，处理好执政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不能以党代政。早在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初期，列宁就明确指出："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能；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独立负责精神；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而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① 但是历史留给列宁的时日太短，对于执政党如何执政的问题他仅仅开了个头，而没能进行系统的探索。列宁过世后苏联党始终没能处理好党政之间的关系。从最初执政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苏共始终没有把执政党和政府区分开来，没能够跳出党政不分的怪圈，总是把党政之间的职能混为一谈，党直接掌握国家权力，党政融为一体，以党代政，把党的力量强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党成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做法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执政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削弱。东欧国家的执政党遵循苏联模式，同样是党政不分。苏东国家的执政党最终丧失执政地位，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但是没有正确处理党政之间的关系应该是首要的因素。

政党体制的不同，将会影响执政党对政府的控制程度。西方国家在两党制条件下，执政党往往由一个政党单独组成，执政党对政府的控制是比较有效的。但是，在多党制条件下，由于一个党在议会选举中经常不能单独获得多数，往往需要

① 《列宁全集》第 43 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4 页。

和其他政党联合才能取得执政资格，因此行政机构（总统）往往是多党妥协的产物，执政党对政府的控制力要弱得多，并且面临着由于各党之间的政见不同而导致政府垮台的危险。

2.执政党通过间接方式控制政府

执政党不因为自己获得执掌行政权力的地位而使党也权力化了，党仍然保持政党组织的性质，在宪法与法律上仍然与其他政党平等，不对政府机关发号施令或进行干涉。执政党组织对政府的控制，大都采取间接介入或通过各种渠道施以影响的方式来进行。第一，大多数国家的执政党都以政府总理、首相或总统的身份出面掌权，而不采取或很少采取以执政党组织的名义直接执掌政府的权力。执政党在执政后，作为政党角色，其功能与色彩已大大削弱与淡化，党往往隐于政后，不在前台出现。第二，由进入政府的党员个人来体现执政党对政府的控制。在政府机关里的执政党党员，担负着贯彻和执行党的政策和主张的任务。进入政府的党员，由于他们对党的忠诚和日后继续当选需要而对党具有依赖性，所以，他们在工作中往往能够较好地贯彻本党的意图。执政党的成员进入政府后，常常利用执政地位，把党的主张转变成国家的政策和措施。这种"转变"必须依照法律程序进行，不能越俎代庖由执政党自己制定方针、政策再由党的机构自己执行。第三，执政党对大政方针的制定，往往给进入政府的党员留有较大的余地。执政党通常只制定基本的政策主张，对于政府里党员的具体行为，给予相当的自主权。避免执政党对党员的要求具体时，党员既要完成本党对政府的控制，又要以政府官员的身份活动所容易产生的矛盾出现。

3. 注重在野党作用的发挥

一方面，执政党适时化解在野党的批评，把在野党有价值的主张变成自己的政策。在野党由于自己所代表的利益原因，常常向执政党施压，提出自己的各种要求和社会发展的各种建议。执政党则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对在野党进行反击；同时，针对在野党提出的有价值的主张、建议，则予以吸收，形成自己的政策。另一方面，接受在野党对自己的监督。执政党通过接受在野党对政府的监督，体现出执政党对政府的控制作用。在英国，在野党被称作"英王陛下忠诚的反对党"。长期以来，英国形成了这样的惯例，即在下议院的次多数党，是法定的反对党。反对党在政党政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通过监督和制约执政党的政策和行为，防止执政党独裁专制，保证政治权力的运用在公众可以容忍的范围里进行。最大的反对党组成"影子内阁"，监督政府的运作，向执政党不断施加政治压力。反对党会利用各种机会，如质询、调查、听政、辩论、提案、弹劾等等，向社会公布执政党和执政党党员的劣迹，有时还会起用法定程序追究执政党及其党员的法律责任。同时，通过"影子内阁"，就可以在政府倒台时迅速组建内阁，填补政治真空。

4. 执政党注重引导和教化公务员队伍，保持政府的有效运作

文官制度是实现执政党所体现的人民意志的有效机制和政令畅通的重要保证。文官制度也称公务员制度，它把公务员区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政务官是以自己所在政党在竞选中的胜败为转移的行政首脑、内阁成员、部委主要长官及由他

们直接委任的官员。他们掌握着行政机关的决策权和领导权,负有决策、计划、组织、协调、监督等重要行政职责,以宣传和推动执政党的政策为己任。事务官是政府的中下级公务人员。他们经过公开考试,择优录用,不受执政党和政府更迭的影响,受文官制度保护,非违法失职,不得任意撤换。尽管文官中立是西方政治文化的传统和习惯,但文官制度的阶级属性并没有完全消失,执政党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和手段来教化文官队伍,通过对文官系统的控制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例如,英国的政府官员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政务官由执政党委任,负责制定规则和政策,与执政党同进同退;事务官(文官)实行常任制,不随政党成败而进退,负责政策的具体执行。事务官名义上保持政治中立,没有党派倾向,但由于事务官必须服从政务官,因此,执政党往往通过具有本党色彩的政务官就能控制整个文官系统,从而保证执政党对政府系统的整体控制。日本自民党执政时,作为政府公务员的主管课长多为自民党的"党友",尽管他们不是自民党党员,但是在政治观点上倾向于自民党,并按规定交纳党费,享有选举权,只是不在党内担任职务。执政党的"党友"领导主管部门,自民党的意图在行政事务中自然就容易得到贯彻落实。

(二)中国执政党对政府的领导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务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是最高的国家行政机构。中国执政党对政府的领导,在执政内涵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从横的方面考察,中国执政党的执政客体不光是国家的行政权力,而是全部国家政权。从纵向角度看,中国执政党的执政客体包括从上到下、

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权力机关。而且对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各方面，都具有组织、指挥和引导的责任。本书在此主要论述的是中国执政党对政府行政权力的领导问题。

具体而言，中国执政党对政府的领导方式主要有以下方面：

1. 直接领导的方式

第一，执政党为政府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规定行政的总任务和总目标，同时对各级政府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情况进行必要的督促和检查。

第二，政府在编制国家（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或计划，起草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议案，出台新的方针政策时，一般都事先提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党委）及其常务委员会进行讨论，经过修改并获得同意后，再提请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议表决。

第三，政府在决定任用有关干部时，事先经过党委组织部门的审查，或直接请组织部门拟出名单，经政府审议决定。

第四，在政府内建立党的组织，党的指示和命令直接向政府里的党组织和党员发出，使党的各级组织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成为党影响政府的主要形式。

第五，对于一些经常性的或突发性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和工作，党委和政府或党委办公厅和政府办公厅常常联合提出指导性的意见或决定，要求有关党政机关部门共同重视和合作完成。等等。

2. 间接领导的方式

第一，执政党向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推荐政府领导人的人

选,并培养、教育、考核和管理行政领导人员。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一般都由中共党员担任。执政党通过这个干部优势及其努力来贯彻执行来自人大的决定和议案的行动,从而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行政中有效地贯彻执行,实现其对政府的领导。

第二,中共中央(各级党委)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经过党内的决策程序,就国家(地方)的发展问题作出重大的决策,并以建议的形式向全国(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提出,由后者依法定程序进行审议。由于执政党党员在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中占有绝大多数,加上人大常委会党组的努力工作,从而确保这些建议案能够在审议中通过,再交由政府贯彻落实,以此来实现执政党对政府的间接领导。

由中国的政党制度所决定,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结成了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这种关系受领导党与被领导党关系制约,因而参政党维护执政党的地位,对之不提出挑战;执政党则对参政党坦诚相见,与之协商执政。在我国,人们一般不认为执政党是国家机关;同理,人们也不会认为参政党是国家机关。中国大陆的八个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对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第一,民主党派成员通过参加各级政府发挥参政作用。第二,民主党派通过与执政党的政治协商,对执政党及其政府发挥参政议政作用。第三,民主党派人士可以通过人民政协会议、党派间的政治协商或别的形式,以党派的名义对政府工作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建议或意见,实施民主监督。第四,政府召开全体会议和有关会议讨论工作时,可视需要邀请民主党派人士列席;政府及其有

关部门聘请民主党派人士兼职、任顾问或参加咨询机构，对某些重大问题的调查、论证活动，提出决策建议，以影响政府的决策和运作。

按照什么方式执政，怎样处理党政关系，体现着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乃至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实践证明，中国执政党对政府的领导是成功的，卓有成效的。但是，目前仍然存在着党政不分的现象。许多本属于政府职责范围内的事务或业务，仍由党的有关部门包办。有些地方党组织直接干预政府的工作，政府似乎不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而是同级党委某一部门的下属机构，造成政府系统混乱，职责不清，威信下降的不良后果。缺乏把党的方针、政策转化为国家意志的、健全的法律程序机制，在很多情况下，党的方针、政策代替了国家的法令或措施。党组织由于包办了政府事务，耗费了时间和精力，分散了力量，影响了本该自己主管的“大事”，使党的方针、政策的研究、干部的任用和考核，以及党的建设问题受到损失，削弱了党的领导。对党的有效领导来说，党政不分危害极大，势必造成权力过分集中；必然使各级党委陷入日常行政事务，形成党不管党的现象；必然妨碍政府部门建立相对独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必然损害党政机关的工作效率，助长官僚主义，败坏党的形象。

坚持党的领导是我们建设事业的根本保证，但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改善党的领导。为此，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关键。从理论研究和现实情况考察，主要是解决党政分开的问题。要真正理顺党政关系，使党组织和政府部门各负其责。既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又要提高政府自主负责

行政的能力。必须做到:

第一,党要坚持政治、思想、组织的领导。所谓政治领导,就是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不是行政的、技术的、业务的、管理的领导。党组织必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分析形势,研究不断变化的新情况,体察群众的情绪,倾听群众的呼声,反映群众的要求,集中群众的智慧,掌握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制定出符合客观规律的、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给人民指明前进的方向、目标、条件、步骤和方法,并且通过细致的宣传工作、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使它们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的强有力的实际行动。

第二,党组织要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和监督,使党员在各自的岗位上真正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党的领导的实现和加强,既要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靠党的组织工作的坚强有力,也要靠广大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靠党员的模范行动去带动、影响、吸引广大群众贯彻执行,而不是也不能靠强迫命令去加以推行。如果党员自己都不能遵纪守法,模范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怎么能希望群众很好地执行呢?要求人民群众做到的,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首先模范地做到。这是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增强群众对党的领导信任的一个重要原则。

第三,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一方面,宪法和法律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广泛发扬民主的基础上,由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一经通过,它就具有极大的权威,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严格遵守。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

队，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本身就是人民的一部分。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宪法和法律，自己更应该模范地遵守它。另一方面，宪法和法律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和人们行为的准则。它既是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体现，也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定型化、指令化。遵守宪法和法律，实际上也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再者，不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必然会给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带来危害。“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煽动无政府主义，肆意摧残国家机关，公然践踏宪法和法律，致使整个社会长期处于没有法制的混乱状态，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其教训是深刻的。

第四，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努力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一项事关国家全局和长远发展的系统工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取得显著成绩。党的十五大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这一治国方略载入宪法。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把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经过多年的努力，各级政府依法行政取得了明显进展。2004 年 3 月，国务院发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纲要》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确立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明确提出了今后十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目标、基本原则和要求、主要任务和措施，是指导各级政府依法行政的纲领性文件。同年 7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正式颁布施行。这是一部规范政府共同行为的重要法律,必将对政府工作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新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对加强国务院及其各部门自身建设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这三件大事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最重要的是坚持做到:职权法定、依法行政、有效监督、高效便民"[①]。也就是说,行政机关的权力来自法律,行政行为应当遵守法律,行政违法必须承担责任,行政管理要提供优质服务。当前,要着力抓好以下五项工作:一是加强制度建设,做好政府立法工作;二是加强和改善行政执法,确保法律法规正确实施;完善行政监督机制,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严格执行行政许可法,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认真落实《国务院工作规则》,切实加强国务院自身建设。中国执政党要切实加强对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领导,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为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而不懈努力!

三、执政党与司法机关

司法机关是指行使司法权的国家机关,它是执行法律的主体。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司法机关包括审判机

① 温家宝:《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努力建设法治政府》,《人民日报》,2004年7月5日。

关、检察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狭义的司法机关仅指审判机关，即法院。在资本主义国家，司法机关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相互独立，互不从属；在社会主义国家，司法机关从属于国家权力机关而相对独立于其他国家机关。我们所研究的执政党与司法机关的关系，是指执政党与广义的司法机关的关系。司法是公共权力的一个重要部分。执政党对司法机关的控制是巩固其执政地位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执政党总会千方百计地设法对司法机关予以控制。

（一）外国执政党与司法机关

西方资本主义司法制度形成的理论基础是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分别赋予议会、法院、政府掌握和行使。西方国家司法制度的一个普遍的重要原则是所谓的“司法独立”原则。司法权由司法机关独立行使，法院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独立行使司法审判权，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任何政党及个人都不能行使司法审判权，也不能干涉司法审判活动。法院独立审判，不受别的法院的干涉，上一级法院也只能根据上诉程序进行审理和作出变更。对法官实行保障制度，即从职业身份、工资、人身等方面对法官履行职责予以法律保障。法官独立，一经任命，非经弹劾，不得免职、撤职或令其提前退休。实行高薪制。很多国家都实行法官终身任职制。一些国家法律规定，法官任职后不能兼任行政职务或当议员，也不能有政党党员的身份和从事政党活动。例如，美国法律就规定了法官不可更换制、专职制、退休制和高薪制等法官保障制度。这些制度，使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立法权，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无权干涉司法活动，同时也决定了政

党(执政党)不能直接领导和干涉司法机关的活动。

那么,外国执政党,特别是西方执政党是如何对司法机关进行控制的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执政党通过议会立法规定司法机关的结构和功能,通过法律条规的实施来贯彻本党的政治意图。国家司法系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一般情况下,不会因为执政党的更替而发生本质性的变化。但执政党执政后,可以采取许多必要的措施对司法活动进行控制。一方面可以根据需要对司法系统进行结构改革和重组;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立法机关修改、制定、颁布大量的法律法规来规范社会的政治经济活动,体现执政党的政策意图。例如,西方国家的宪法一般都赋予司法机关具有司法审查权,即对宪法的解释权和对于议会及政府违宪问题的仲裁权。同时,宪法又规定议会拥有修改宪法条文的最后权力。如果司法机关经常利用宪法中的某些条款来阻止议会有关法案的生效实施,议会认为有必要时便修改宪法的有关条文,保证法案的通过并予以实施。此外,在外交等问题上,政府认为这是有关"国家利益"的问题,司法机关对有关案件的审判要维护国家利益,服从行政机关的决策,按照政府对外政策为准绳来处置,决不允许自行其是,以自己的见解来判案。这在处理涉外贸易案、国际间谍案时,表现得特别明显。这些都与执政党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2.执政党通过推荐或直接任命高级司法人员影响司法机关。美国宪法规定,联邦法院的法官由总统提名并经参议院同意后任命。联邦上诉法院和联邦地方法院的法官人选,由总统委托政府司法部长负责物色挑选,总统在征询该法院所

在州的国会参议员意见的基础上提名，经参议员投票同意后任命。尽管政治原则规定，司法系统应严守公正，保持中立的准则，要超越于党派政治之上，但"实际上在选择最高法院或联邦法院法官时，政党倾向或司法哲学是其中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①。叙利亚《宪法》规定，由复兴党担任的共和国总统主持最高司法会议，最高宪法法院的法官均由总统任命。在英国，大法官、上诉法院首席法官和法官、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军事法院法官、总检察长和司法总监等，都由内阁首相向国王提出建议，由国王任命。作为执政党领袖的首相，往往向国王推荐本党的党员。通过对这些人员的任用，执政党对司法活动的影响得以实现。越共对司法机关的组织人事安排十分重视，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院长、公安部长、司法部长、检察总署署长等重要职务都由越共中央政治局确定后向国会推荐，并在司法机关中设立党组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和监督。

3. 议会或政府部门与司法机关的某种合二为一的结构及一人兼任不同的职务，是执政党影响司法工作的重要方法。英国上议院既是立法机构之一，同时又是英国民、刑事案件的最高上诉机构，是最高审判机关。它在审理上诉案件时，在理论上所有贵族议员均可参加，但实际上只有法律贵族参加。裁决一经作出，不得再提出上诉或要求重新审理。保守党历来在上议院中具有优势，它对司法审理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① 罗伯特·J·郝克肖恩：《美国政党》，布鲁克斯—科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47页。

了。同时,英国大法官具有双重职能:作为内阁成员他是政府高级官员,负责司法行政工作;作为司法公职人员他是司法机关的最高领导,主持和领导审判工作。根据英国的法律,大法官有权依据不同机关和组织的提名任命低级法官和治安法官,对基层司法活动的影响很大。因此,英国执政党总是选派得力的党内高级领导人出任大法官,并通过大法官将国家司法活动和执政党的政策协调起来。美国检察机关与司法行政机构不分,联邦总检察长即司法部长,为总统和政府的法律顾问,监督司法行政管理,在联邦最高法院审理重大案件时,代表政府出庭,参加诉讼。司法部长直接掌管联邦一级法律的实施,负责对联邦司法区检察官活动的监督工作。而他是执政党的要员,受总统即执政党领袖的领导。这为执政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司法和检察活动提供了很多方便。

(二)中国执政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

中国司法制度形成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国家学说和法律学说。主张国家权力的统一性。在议行合一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构建国家机构。如前所述,中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实行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国家权力机关根据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统一行使国家权力。行政、司法机关地位平行,从属于权力机关。由于中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单一制国家,所以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立各级司法机关。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行使检察权,公安机关与国家安全机关行使侦查权,司法行政机关依法管理司法行政事

宜，主管监狱系统和指导律师、公证、仲裁等专门组织的工作，实行“审检分立”、“检侦分立”。法院与检察院是专门的司法机关，两者相对应而设置，从中央到地方分设四级。除普通法院（检察院）外，还另设专门法院（检察院），两系统相平行，自成体系。中国的司法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权力机关管理司法活动的重要工具，也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存在和发展的重要保证。

司法中立与公正是中国司法制度的主要特征。为了保证司法公正，国家赋予司法机关相对独立的地位，防止一切非法的干涉和干预。当然，司法独立绝不是排斥党的领导和执政，而是以适应司法专业特点的方式来维护和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实施党的执政行为。由于宪法和法律是执政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司法机关是依据宪法和法律设置并在执政党的政治领导和人大民主监督下活动的，因此，从本质上看，中国司法机关的工作是在中国执政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执政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组织的领导。执政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不是要干预司法机关的独立业务工作，而是要领导和支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严格执法，依法办事。

执政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通过领导人民代表大会立法，使司法机关有法可依。中国执政党执政以来，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并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有关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法律，为司法机关进行司法活动提供了较完备的法律基础。同时，党对司法工作进行方针指导。执政党中央根据对国内外客观现实进行的分析，就各个阶段司法

工作的情况作出决策，对政法战线当前或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提出方针和要求。较为完备的法律和正确的方针指导，有力地保障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2. 通过对司法机关主要领导人、法官、检察官等人员的任免程序，实现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根据法律，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人选，由执政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建议名单，经审议通过后任命；国家司法部长由国务院根据执政党中央的意见向全国人大提名，经同意后任命。地方各级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部门以及法官、检察官等重要干部，由同级地方党委提出建议名单经其人大审议后予以任命。同时，执政党党员在司法系统的领导干部中具有绝对多数优势，通过他们的努力和团结少数来自非中共的司法领导干部的工作，使执政党的意图和工作方针的贯彻得到保证。这些都体现了执政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作用。

3. 执政党设置政法工作委员会对司法工作进行领导。执政党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置自己的政法工作委员会，作为同级党委的派出工作机构，贯彻和执行中央（地方党委）的指示、决定，负责协调和组织各个司法机关的工作，保证各个司法机关在互相分工、互相配合和互相制约中正常地开展工作，保证依法治国方略的贯彻落实。在各级法院、检察院和其他司法组织机构中，建立由其主要领导干部组成的党组。它在政法委的领导下，具体实施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指示。

中国执政党历来重视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的司法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至党的十六大召开的 24 年中，在立法方面，除宪法和三

个宪法修正案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197个法律，通过了125个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制定了933个行政法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49个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9000多个地方性法规；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依据法定职权制定了3万多个规章。[①] 我国以宪法为核心与基础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执法情况也在不断进步。全社会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不断增强。

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仍然存在着很多弊端。诸如：权力过分集中，党政（法）不分，职责不清；党组织包办司法业务，致使司法职权受到削弱，司法机关权威下降，等等。为此，应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实现党政（法）分开，明确划分执政党和司法的职责，理顺党组织与司法机关的关系，使其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逐步实现制度化、法律化，保证在执政党领导下的司法独立运行机制的健全与完善。

党的十五大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明确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始终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提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②]；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通过全党共同努力，使党始终“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③]。这对于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保证我

① 《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9页。

② 《人民日报》，2004年4月28日。

③ 《人民日报》，2004年9月20日。

们党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就是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事务。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的活动以及公民在各个领域的行为都应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涉、阻碍和破坏。在当代中国，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的实质就是"法治"。依法治国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依法治国的客体，是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依法治国的基础是我国的法律体系，其中最重要的依据是宪法和法律；依法治国充分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与发扬人民民主严格按照法律办事的统一性。实行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要求执政党的各级党组织都要遵循党章关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以及宪法关于"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的规定，抓住制度建设这个重要环节，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不断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法律化、制度化。

同时，中国执政党要加强对军队的领导和建设。中国执

政党要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确保国防安全。要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紧紧围绕打得赢、不变质两个历史性课题，加强军队全面建设。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永葆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坚持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和军事斗争准备，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按照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目标，提高信息化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坚持从严治军、依法治军，加强军事法制建设，提高军队正规化水平。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军的特点和规律，推进军队各项建设创新发展。加强武装警察部队全面建设，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加快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加强国防动员工作，坚持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增强全党全民的国防意识，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

总之，执政党与代议机构、政府和司法机关的关系，是有关执政党有效执政和巩固执政地位的重大问题。西方国家的执政党对代议机构、政府和司法机关控制的本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西方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在本质上是根本不同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不适合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制更与社会主义国家格格不入。我们决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要充分发挥执政党的执政功能，实现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进一步向法制化方向转变，切实“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

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①]，始终做到既要加强对代议机构、政府和司法机关的领导，又要确保代议机构、政府和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自主地行使职权，使其执政机制有效、和谐地运转。同时，中国执政党也要处理好人大与"一府两院"的关系。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特征。人大根据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愿，通过制定法律、作出决议，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政府根据人大制定的法律和通过的决议，依法行政。法院、检察院根据人大制定的法律，公正司法。人大统一行使国家权力，要尽职尽责，但不能越俎代庖，不能代行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当然，人大对"一府两院"要依法进行监督。人大的监督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目的是保障宪法和法律得到全面正确的贯彻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促进各个国家机关严格依法行使职权，确保人民的各项权利得到尊重和维护。真正做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②]。

① 《中国共产党章程》，《光明日报》2002 年 11 月 19 日。

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04 年 9 月 20 日。

第四章　中国执政党的执政方略

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执政合法性问题。如同笔者在第二章所谈到的任何执政党都将面临着执政的合法性危机一样，中国执政党也会或多或少地面临执政的潜在危机。中国执政党克服执政的潜在危机，巩固和增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必须具有科学的执政方略。同时，在新的世纪，"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我们党肩负的重大历史任务"①。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国执政党要紧跟世界进步的潮流，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胜利完成这三大历史任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都需要中国执政党具有明确的执政方略。为此，中国执政党运筹帷幄，高瞻远瞩，既做好了充分的战略准备，也形成了明确的执政方略。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97页。

一、执政党执政方略的科学概括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①]"总结八十年的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展望新世纪的艰巨任务和光明前途,我们党要继续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胜利前进,归结起来,就是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②]胡锦涛也明确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③]这明确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执政党最可宝贵的经验,同时也明确地表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执政党执政的基本方

①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02 年 11 月 9 日。

②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97 页。

③ 胡锦涛:《在邓小平同志诞辰 10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 年 8 月 23 日。

略。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80多年的奋斗历程，所取得的辉煌的骄人的成就，和在新的历史时期带领全国人民继往开来、披荆斩棘、昂扬阔步走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都充分地显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党的领导过程中所起的伟大作用。同时，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是中国执政党永葆政党性质的先进性，是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伟大的执政方略。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突出了执政党的先进性，论证了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抓住了执政党执政问题的实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同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紧密联系起来，从社会发展和无产阶级政党进步本质的高度，揭示党的先进性的实质和内涵，说明中国执政党之所以先进，就是因为它能够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先进性，归根到底就表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三个代表"的要求，是中国执政党保持先进性、始终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强领导核心的基本要求。

执政党如何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如何得到最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如何取得和巩固执政的合法性，是执政党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为此，党就必须永葆先进性。任何政党都要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未来，提出自己的行动纲领。政党的先进性，表现在党的纲领上，体现在政党如何通过自己的成员实施这个纲领。江泽民指出："看一个政党是否

先进，是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主要应看它的理论和纲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不是代表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是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新时期执政党执政的新的伟大纲领，突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指明了党保持先进性的基本要求，抓住了执政党执政问题的实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长久保持执政地位的道义支持和法理依据。党为什么执政呢？那就是执政为公，勤政为民。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私利。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 80 多年的漫长历史过程中通过自己的实践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党又是凭什么执政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和揭示。第一，党执政凭的是道义支持，而这种道义支持的来源就是党自身所具有的先进性。我们党的先进性充分体现在我们党的理论和纲领上。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是她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走上执政地位并已经保持执政地位半个多世纪的重要依据。第二，党执政要获得人民的认可，即具备相应的法理支持。一个政党能够执政，根本上就在于它能够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能够带领一个国家按照时代进步的潮流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走上执政地位，靠的是通过其自身的先进性，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的不懈奋斗和无私奉献，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的最充分的道义支持和法理依据。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的最大忧虑和威胁，就在于其处于执政地

位而走向僵化、衰落和腐败，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进而失去政权而下台。近几年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从极盛到极衰，从长期执政到失去政权的过程，尽管情况各异、十分复杂，但它们落后于时代，严重脱离群众而失去群众的支持和爱戴，乃至被群众所抛弃是其根本原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要巩固其执政地位，只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始终坚持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社会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执政党应对挑战，巩固执政地位的客观需要

在新的历史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中国执政党在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我们肩负的任务光荣而艰巨，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也是多方面的。”①这种挑战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既有党内的，也有党外的。迎接挑战，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是中国执政党必须正视的现实问题。

1. 中国执政党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环境。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我们能否有效地应对挑战，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世界文化互相激荡碰撞，我们能否在吸收先进文化的同时有效地抵制腐朽思想文

① 求是杂志政治编辑部编：《立党之本 执政之基 力量之源》，红旗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化对我国的侵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谷,我们能否有效地抵制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同样,我们面临着一个更加复杂的国内环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过程中,封建思想、落后文化依然存在,社会秩序的某些混乱、道德的失衡等问题时有发生,随着改革深化带来的“四个多样化”,已经并将进一步引起不同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文化选择的多样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带来社会进步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对社会生活产生着各种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这些都是中国执政党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完成中国执政党所肩负的三大历史任务,就必须把中国 12 亿多人的力量凝聚起来。那么,中国执政党靠什么能把那么多人凝聚起来?又用什么思想把自身武装起来以具有凝聚 12 亿多人的力量?这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2. 中国执政党自身建设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江泽民指出:“现在党的建设同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的地方还相当不少,党内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存在的不符合甚至违背党和人民利益的问题也相当不少,需要研究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也不少。”①怎样使中国执政党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下始终保持活力,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执政党所必须正视的现实问题。

---

① 求是杂志政治编辑部编:《立党之本 执政之基 力量之源》,红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5 页。

中国执政党只要坚持“三个代表”，并且在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及其全部实践中体现出“三个代表”，就能在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环境中，从容地应对挑战，带领全国人民进行史无前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国执政党是一个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党。它在考虑自己执政的时候，总是把自己同当今世界生产力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联系起来，把自己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承担的历史任务联系起来，把自己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联系起来。坚持“三个代表”是中国执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执政党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新发展，是其与时俱进，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所在

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先进性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基本原理，抓住了当今时代的显著特征，鲜明地体现了时代性。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国际竞争更加剧烈的局面，执政党必须关注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首要的是做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有了先进的生产力，又有先进的社会制度，就能创造更多更好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就能在不同国家不同力量的竞争中站稳脚跟、走在前面，就能更有力量地提高综合国力。面对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状况，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多方面的需要，执政党就必须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

前进方向。面对我国在改革过程中，人民群众利益多样化的现实，要充分调动亿万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推动改革和现代化建设顺利发展，执政党就必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密切相联、辩证统一，赋予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理论以鲜明的时代精神，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先进性理论。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完善、发展和明确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把党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党的性质问题，也是党的建设目标和形象问题。面向新世纪，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是“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①]。这就为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树立起一面光辉的旗帜，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理论的重大发展。但是，怎样实现这个总目标，如何将它体现到党的建设各个方面中去，需要我们作出更深入的学习和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对此作出的最完美和科学的回答。实现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需要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需要奠定巩固的思想文化基础，需要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参与和监督。而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加强党的建设，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就有了基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97 页。

础，有了方向，有了动力，执政党就能够在复杂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保持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高度一致，战胜各种挑战，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

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的有关重大理论问题作了全面阐述，明确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衡量党的建设成效提供了一个更加全面和具体的标准和尺度。较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阐述得更加深刻、更加辩证。“三个代表”的论断，语言表述非常严谨。“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后面加上“发展要求”，这就明确说明我们不仅要抓生产力发展，抓科技进步，同时还要抓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领域的变革，要加快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各项改革，保证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样，“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后面加上“前进方向”，这是因为理论决定文化的性质和方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既要抓科学教育事业，又要抓思想道德建设，既有体制创新的任务，更重要的还应有理论创新的任务。“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后面加上“根本利益”，这说明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局部和全局、眼前和长远、个人和集体、国家等各种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并且通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制度和机制来保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内涵非常丰富，对党的建设既能起到固本的作用，又紧密地结合了我们当前的中心工作，并同党的建设实际结合在一起。它是衡量党的建设成效，永葆党的先进性的试金石，在党的建设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具有

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8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执政党创新的产物，同时，又处处体现着创新精神。它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发展，为执政党的建设和执政提供了新的活力和时代内容，是执政党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所在。

二、执政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发展是亘古以来人类实践的历史性课题，也是现代社会各国群雄竞争的时代性课题。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敏锐地把握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和要求”，“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①]“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②]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方式。”[③]执政党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方略，对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98页。

② 《江泽民在中央党校重要讲话学习问答》，党建读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③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04年9月20日。

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于加强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将起到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在当代中国，执政党已经把发展当成了时代旋律中最强劲的音符。

发展包括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等方面。执政党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注入强大动力。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执政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内容的。因此，笔者认为把发展作为执政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关键是要把发展先进生产力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本文在此主要论述坚持把发展先进生产力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问题。对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问题，在下文再作论述。

(一)坚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客观必然性

1.坚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由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决定的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唯物史观中的核心思想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人类社会所经历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个发展阶段，都是生产力发生作用的结果。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它们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刻

根源和一般规律；最终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是生产力，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第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从根本上制约着社会形态的性质。一个社会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上，它的生产方式有何特点，它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观念形态以及整个社会形态为何性质，归根到底，都是由生产力的状况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形成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一方面反作用于生产力，另一方面又直接决定着社会形态的性质。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最终就会形成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相应地就会建立起什么样的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从根本上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战胜封建社会，都是因为它们适应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的产生、发展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也同样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它从根本上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其发展结果，势必引起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危机而不能自拔。要彻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第二，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社会全面发展的根本条件和集中体现。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具有多种目标，如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思想文化的不断进步、生活方式的更加合理、国际关系的更加和谐，等等。这些目标的实现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的

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构成了社会全面发展的根本条件。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全面进步的新的社会形态。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丰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追求，这些都要以发展生产力为基础。党在领导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以发展生产力，特别是发展先进生产力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才能完成其所肩负的历史重任。同时，生产力的发展还是社会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是社会发展水平的体现，但生产力的发展是体现其发展水平的关键。

第三，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条件。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生产力的发展不仅表现为物的不断丰富上，而且表现在人的不断发展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①社会主义社会既是一个社会全面进步的社会，又是一个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前提和根本条件，就是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人们的"闲暇时间"、"自由时间"将日益增多，人的全面发展也将由此得到实现。

第四，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社会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2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94 页。

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①我们国家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国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面对这些状况，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逐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使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明显提高，使其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生产力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范畴，它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形态的性质和人类历史的进程，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条件，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内容和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尺度。生产力，特别是先进生产力在人类历史上所起和将要继续起的决定力量决定了党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2.坚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由党的性质所决定的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她由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工人阶级与历史上任何阶级相比，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思想最先进，革命最彻底，纪律最严明，最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她坚持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她不仅与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趋势相一致，而且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同人类自身发展的状况也相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一致。因此，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第一，坚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中国执政党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后如何执政，是其能否取信于民和巩固执政地位的关键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8年就科学地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①] 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精辟地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②]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多次语重心长地谈到：“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③]在新的历史时期，江泽民坚定地表示：“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依然是我们长期的中心任务。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发展先进的生产力。”[④]2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运用改革这一社会主义制度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最有力武器，取得了辉煌的业绩，在实践中充分显示了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伟大力量。

第二，坚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实现党的奋斗目标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④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01页。

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这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人类有史以来最先进的纲领目标。“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①]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共产主义制度赖以建立的物质基础。但是，必须看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领导全国人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每一步，都是向共产主义目标的迈进。因此，党必须制定出符合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三，坚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党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战略抉择。我国已经加入 WTO，加快了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中国执政党是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在这个地球上的产生、发展和所走过的战略道路，是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有着深刻内在联系的。”[②]作为一柄双刃剑，经济全球化既给中国执政党提供了继续加强执政的历史机遇，又对其执政提出了严峻挑战。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政治、文化关系将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形势逼人，不进则退。”中国执政党只有坚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才能笑迎挑战，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才能牢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21 页。

② 郑必坚：《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理论前沿》2000 年第 20 期。

牢掌握主动权。

第四，坚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党自身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宝贵经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50多年以来的风风雨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事实，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经历的曲折和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都客观地昭示着一条真理：执政党什么时候坚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事业就会兴旺发达，党和国家就能经受住任何风浪的冲击；反之，就必然会遭受挫折，乃至失败。

第五，坚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为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成为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虽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最终是由社会存在所决定的。先进的生产力决定着先进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状况，并为文化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同时，只有致力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始终坚持把发展先进生产力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才能真正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满足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总之，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只有坚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才能始终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从而加强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二)坚持把发展先进生产力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发展先进生产力是中国执政党坚定不移的执政方略。江泽民强调："全党同志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要对自己所从事

的工作经常加以检查和总结，看看是否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符合的就毫不动摇地坚持，不符合的就实事求是地纠正。”[1]坚持发展，历来是我们党全力关注和努力实践的核心问题。贯彻好“三个代表”的要求，必须把发展先进生产力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1. 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使我们的思想认识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我们要充分地认识到，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对今天中国生产力造成的变化是前人没有看到并很难准确预测的，因而我们不能只停留在经典作家们的思想认识上。我们应当清楚，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在总体上还客观地存在着，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依然是我们长期的中心任务。发展是硬道理。发达的生产力，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制度胜利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建立在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我们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最根本的就是要通过改革和发展，使我国形成发达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先进生产关系。由于先进生产力具有先导性、科技创新性、高效性和革命性的特点，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发展先进生产力，通过先进生产力的带动和促进，实现国民经济跨越式发展，实现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

2. 要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从根本上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00 页。

第一,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大力培育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各类市场主体。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类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是发展我国先进生产力的生产组织。公有制为主体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一个原则。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它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国有企业必须在发展我国先进生产力中走在前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巩固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果,继续深化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使其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使激励与约束相对称,形成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内在动力。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民营科技企业,由于其灵活有效的经营机制,对我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要加大改革的力度,尽快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清除障碍,赋予其与公有制经济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使其为发展我国先进生产力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二,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通过合理的利益分配,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是合理分配市场主体的经济利益,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有效分配形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使劳动者、投资者特别是科技工作者和经营管理人员获得与其贡献相称的报酬,以调动他们发展先进生产力的积极性、主动性

和创造性,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客观作用,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面对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现实,政府应该转变职能,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真正建立起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相吻合的市场经济,"彻底摆脱传统计划经济的羁绊,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①]完善、健全的市场体系和市场运行机制,是促使各市场主体适应社会消费需求,优化资源配置,不断采用先进技术、先进管理和先进生产方式进行商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客观动力。必须着力于建立、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运行机制,要加快市场化进程,继续大力发展各类市场,特别是要重点发展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健全市场法规体系,完善市场规则,尽快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我们要注意把市场机制的作用和政府的宏观调控有机地结合起来。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对经济运行进行宏观的调控,必要时可以采取行政手段。彻底打破"条块垄断"和"城乡壁垒",推动经济市场化进程。使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真正落到实处,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按照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不断推进政治体制和其他方

① 朱镕基:《政府工作报告》,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2 页。

面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切实实行政企分开，消除对经济活动不必要的各种行政干预，推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3. 把提高人的素质作为发展先进生产力的第一要务

"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①]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我国工人阶级，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我国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同工人阶级紧密团结，是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不断提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以及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始终是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第一要务。要把坚持发展先进生产力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就必须把提高人的素质作为发展先进生产力的第一要务。

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主导性意义的因素，也是最活跃、最富创新能力的力量。发展先进生产力，不仅要着眼于物，更要着眼于人，而且应首先着眼于人。毛泽东曾谆谆告诫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我们要努力感动上帝，"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②]。我们要注意发挥人的能动作用，这将对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适应，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适应，都将起到巨大的作用。提高劳动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充分发挥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00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102 页。

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始终是中国执政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第一要务。

人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发挥作用的大小，不仅同他的体力有关，而且与他的智力和思想上的发展状况也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并直接关系到生产效率和发展进程。人的素质越高，他们在生产中发挥的作用就越大，生产力越发展，对人的素质要求就越高，生产效率的提高与人的素质提高是成正比的。随着经济、科技的高速发展，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会越来越明显，国力的强弱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各类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人才问题已成为一个国家长远发展的中心和根本问题。谁拥有大量高素质人才，谁就会在未来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发展有赖于高素质的人才。人才已经成为社会发展最关键的因素，成为全社会运作的主体和核心，成为全社会的第一资本、第一资源和第一目的。所以，提高人的素质，理所当然地就成为了生产力发展的第一要务。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情况虽然如此，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仍然很大。诸多原因中，人力资源素质的低下、人才缺乏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瓶颈因素。时代在前进，事业在发展，党和国家对各方面人才的需求必然越来越大。要抓紧做好培养、吸引和用好各方面人才的工作。进一步在全党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促进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风气。领导干部要有识人的慧眼、用人的气魄、爱才的感情、聚才的

方法，知人善任，广纳群贤。要用崇高的理想、高尚的精神引导和激励各种人才为国家为人民建功立业，同时要关心和信任他们，尽力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加快建立有利于留住人才和人尽其才的收入分配机制，从制度上保证各类人才得到与他们的劳动和贡献相适应的报酬。通过各项工作，努力开创人才辈出的局面，形成先进生产力第一要务高度发展的良好局面。

4.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首次提出了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问题。这是中国执政党的一个具有前瞻性、立意深远的战略决策。所谓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利用后发的某些有利因素，以实现国民经济的超常规、大跨步的发展。就是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出发点的超常规发展，就是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是实现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选择，是由国内外环境和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所决定的。一是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新的世纪，执政党要完成所肩负的三大历史任务，最根本的措施，就是靠发展，靠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迅猛发展的新形势，势必对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产生极为深刻的

影响，进而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现实机遇和挑战。如何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中国执政党必须正视的现实问题。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来考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尚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工业化的任务依然很重。在全球信息化时代已经到来的大背景下，先完成工业化再发展信息化的路行不通。激烈的国际竞争、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不容许我国走传统的常规发展的道路。我们必须走具有中国特色的信息化道路，把信息化与工业化密切结合起来，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推动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①]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应对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科技革命给我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只有发挥后发优势，通过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来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

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必须坚持速度和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必须坚持经济和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注重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可持续发展。明确跨越式发展是一个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动态型的概念，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考察我们现有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状况，研究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规律和实现的条件，从而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有效地发挥自身的优势，积极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的结合，以信息

①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化带动工业化，把我国工业化提高到广泛采用信息智能工具的水准上来，用信息技术武装工业和国民经济，提高国际竞争力，发挥后发优势，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把我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必须把发展作为中国执政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特别是要把发展先进生产力作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既是对中国执政党执政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她在新时期根本任务的高度概括。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新世纪，我们党要继续实践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完成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始终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抓住发展，特别是发展先进生产力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促进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①。

三、执政党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性的谋划。中国执政党高瞻远瞩，高屋建瓴，在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同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并把握世界大局，提出和依据

① 李长春：《在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年8月25日。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制定了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逐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科学体系,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在理论上便于掌握,在实践中易于操作,为我们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一)"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要经过"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是中国执政党制定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战略。"三步走"战略是邓小平首倡的,经过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逐步明确和完善。

1."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内涵

党的十三大报告对经济建设大体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作了准确表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二OOO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1]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

---

①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在新的世纪，党的十六大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伟大号召。

“三步走”的战略部署是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具体化行动纲领，其内涵十分丰富。依据“三步走”战略形成过程的三个时间阶段，并分别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反映每个时间阶段所应达到的战略目标来理解，“三步走”战略的含义，可以作如下理解：(1)第一步，用 10 年时间，国民生产总值在 1980 年的基础上翻一番，或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 250 美元左右提高到约 500 美元，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是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因为在改革开放以前，虽然国家的经济建设有很大成绩，但是几经挫折，人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基本解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不能得到基本满足，现代化就无从谈起。从此起步，符合当时的基本国情，符合人民的迫切愿望。解决温饱问题，也是为走向第二步战略目标打下基础和做好准备。(2)第二步，到 20 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均达到 800—1000 美元，达到小康水平，这是继续推进现代化的关键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最重要的是走好第二步。实现了第二步任务，我国现代化建设将取得新的巨大进展。这不仅表现在经济总量和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有大幅度增长，还表现在社会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有明显提高，工业主要领域在技术方面大体接近发达国家 70 年代或 80 年代初的水平，农业和其他产业部门的技术水平也将有较大提高，连同科

教文等事业的进步,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达到了新水平,就为实施第三步战略目标打开了新路。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决议》强调:在20世纪“最后十年是非常关键的时期”。(3)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接近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可以说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始进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国才算是根本摆脱了落后面貌,我国人民才能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从建国算起,前后经过100年的努力,实现了其他国家要花200年或更多时间才能达到的水平。到了那个时候,中国现代化的“三部曲”才刚奏完,第三个乐章为其高潮。

“三步走”的战略目标虽然主要以经济指标来衡量,但代表的实际上是社会全面发展和进步的程度,从其内涵来看,充满了科学的辩证精神。第一,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历史来看,经济增长是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也是首要的一环。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经济的高度增长,社会的全面进步是不可能的。这是历史的必然。而且,第三步战略目标规定的基本实现现代化,包含了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的程度,它包含了经济、政治、文化、特别是人的现代化在内。第二,“三步走”战略目标的每一步都有相应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指标,把发展国民经济同改善人民生活统一起来,特别是把每一战略目标都量化为一定指标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温饱到小康再到富裕,具有全面而丰富的内涵。特别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生活层面的东西相对减少,而精神的如文化生活、政治意识等则大大加强。可见,

"三步走"战略目标虽然主要是作为经济发展目标而提出,但其已涵盖现代化建设的全方位、多方面,是全面发展进步的综合性目标。第三,它跳出传统发展模式的窠臼,坚持速度与效益的统一,使现代化的建设过程成为国民经济高速度高效益的发展过程。

"三步走"战略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战略相比,充分体现了以下特点:第一,长期性与阶段性的统一。第二,整体性与重点性的统一。第三,速度与效益的统一。第四,求实性与创新性的统一。第五,经济增长与改善人民生活的统一。

2."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重点

实行"三步走"战略,必须首先确定战略重点问题。邓小平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在 1982 年指出:我国的"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①]。这为我国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指明了方向。

第一个重点是农业。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农业是稳定民心、安定天下的战略产业。农业状况及发展速度,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和基础作用,决定了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

要切实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第一,要高度重视农业。第二,调整工农业发展的政策:一要彻底纠正过分偏斜工业的做法,实行工农业协调发展的政策;二是国家宏观计划中,要调整工农业发展速度,切实解决工农业发展比例严重失调问题;三要增加和落实对农业的投入。第三,由于农业发展面临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9 页。

自然、市场和政策的三重风险，要对此予以保障。第四，要依靠科技兴农。第五，切实保障农民的利益，不断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当前，要“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①。全党要关心、研究、支持农业。坚持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强化市场在农村经济中的调节作用；把科技、教育兴农落到实处；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及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大力发展外向型农业；发展小城镇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同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服务业结合起来，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

第二个重点是能源和交通。能源和交通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能源交通是社会再生产的基础条件，交通运输是联系生产与消费、流通的桥梁及纽带；能源、交通对国民经济发展有全局性影响；能源、交通的紧张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发展能源和交通，要做到：一要大力发展能源工业；二要优先发展交通、运输、通讯；三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即改革投资体制，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深化价格改革等。

第三个重点是教育和科学。教育和科学是我国国民经济

①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3 页。

发展的关键。无论是农业、能源、交通、通讯的发展，还是整个经济的现代化，最后都要靠科技和教育。只有坚定不移地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提高管理水平放在首要位置上来，使之成为我国经济走向新的发展阶段的主要支柱，才能促进经济繁荣和民族的兴旺发达，使我们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不论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是经济的发展，都必须依靠教育。这是因为教育承担着为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培养和输送人才的任务，肩负着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伟大使命。所以，为了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必须把教育和科学作为战略重点。发展科技教育，一要坚持“经济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者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二要全面规划、重点突破；三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四要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

3.“三步走”发展战略的意义

第一，“三步走”发展战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无产阶级政党应采取什么方式来实现现代化？对于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没有现成的答案可循。中国执政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从而找到了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一战略的提出解决了像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战略目标以及怎样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现代化模式的难题，从理论上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涵。

第二,“三步走”发展战略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是指导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行动纲领。中国执政党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已被实践证明是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三步走”的前两步目标已提前实现,我国的综合国力、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外开放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极大提高。

第三,“三步走”发展战略不单纯是经济问题,还有更深刻的政治意义。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分三步走,有一个长过程,但是与发达国家的成长过程相比,和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相比,则是很快的。邓小平在谈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时说:“如果达到这一步,第一,是完成了一项非常艰巨的、很不容易的任务;第二,是真正对人类作出了贡献;第三,就更加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①]当代世界国家的发展,无不以现代化为目标,但是真正成功的寥寥无几。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上现代化之路的时间不算长,倘若到21世纪中叶如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实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影响无疑是无与伦比的。

(二)科教兴国战略

1995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召开全国科技大会,首次正式提出实施科教兴国发展战略。党的十五大把科教兴国作为经济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225页。

发展战略正式确立了下来。党的十六大报告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列为促进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经验之一，并再次号召全党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科教兴国战略是中国跨世纪的战略选择和振兴中华的必由之路。

1. 科教兴国战略的内涵

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①。科教兴国是关系全局、关系整个国家发展、社会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措施。

科教兴国战略的核心内容是坚持教育为本、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担负着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培养专门人才的重要任务。发展教育不仅是经济持续增长、科技发展创新、社会全面进步的必要条件，而且是提高全民族素质、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步伐的一条必由之路。

科教兴国战略的内涵还包括要正确处理经济、科技、教育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的关系，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在当代世界，一个国家的国力强弱，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效益、特别是经济发展的后劲、

---

① 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384—1385 页。

将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素质和专门人才的数量与质量。同时，科技进步与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邓小平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一直坚持和倡导实现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基础在教育。1999年6月，江泽民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振兴，全民有责。"[①]"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大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提高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密切教育与经济、科技的结合，加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的根本改变。"[②]实践证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依靠科技和教育，推动经济发展，是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

2. 科教兴国战略提出的依据

中国执政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基于以下因素。

第一，中国的国情是提出科教兴国战略的现实基础。中国是一个有12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人均资源不丰富。中国的基本国情是"既是大国，又是小国"。大国在于人口多，国土面积大；小国在于人口基数大，增长太快，人均资源少，且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村人口占80%。能否把人口数量庞大，素质

① 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84页。

② 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77页。

偏低的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巨大的人才资源优势，将决定着中国现代化的成败，而实现这种转化的惟一出路是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

第二，科技对生产力的巨大影响是中国执政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因素。当代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趋势和各国间综合国力较量的态势，决定了中国必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世界进入了一个以经济发展为重点，以科技进步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的时代。科技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展示了科技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哪个国家重视科技，重视科技的普及和应用，哪个国家就兴盛、发达、富强，就会国泰民安。日本、韩国先后提出"科技立国"、"技术立国"战略。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一直都在实行以科技为龙头推动国家发展战略。一些发达国家还凭借自己在科技方面的主动权、垄断权，乃至侵占权，谋取超额垄断利润，控制发展中国家。我国由于基础薄弱，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科技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要缩小这个差距，增强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能力，走科教兴国之路，是中国执政党明智的选择。

第三，21 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也是中国执政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因素。知识经济是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种经济形态。它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使用上的一种新类型的经济。与以往的经济形态最大的不同，是知识经济的繁荣不直接取决于资源、资本、硬件技术的数量、规模和增量，而是直接依赖于知识或有效信息的积累和利用。在知识经济中，科学技术起着真正的核心和关

键的作用,不断为生产和经济注入新鲜活力。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朝着知识经济方向转化。知识经济在21世纪将占据国际经济的主导地位,深深影响21世纪的发展进程。知识经济的到来,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既是严峻的挑战,又是良好的机遇。中国执政党紧紧抓住知识经济时代即将到来的契机,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中国必须走科教兴国之路的战略决策。

同时,中华民族近百年落后挨打的历史;科技教育的发展状况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等因素也是中国执政党提出科教兴国战略的原因之所在。

3.科教兴国战略的重大意义

科教兴国战略作为当代中国富有生命力的科学理论和具有影响力的基本国策,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一,科教兴国战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学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强调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突破了把科技和教育仅仅看作属于上层建筑的观点,认为科技和教育本身就是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并且是具有十分重要地位的实践活动。在现代社会,生产者只有通过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等途径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才能从事生产。生产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应用,生产者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实际操作者,生产过程表现为科学技术的运行过程。科技和教育的水平决定生产的效率和发展方

向，科技发展了，生产才能发展。强调科技和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其深层的理论根据是劳动者的素质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一思想赋予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以崭新的时代内容。

第二，科教兴国战略是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顺利实现的正确抉择。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优先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刻不容缓。在经济全球化日趋发展，我国已经加入 WTO，国际竞争愈加激烈的状况下实现"三步走"战略，惟一的出路只能是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走集约式经济发展之路，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途径，也是执政党科教兴国战略的根本要求。

第三，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可以进一步巩固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世界社会主义因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而陷入低潮。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时刻梦想颠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经济基础薄弱，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这一切都取决于科教事业的发展。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能够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提高人民的综合素质，增强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使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迅猛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及合作能力得到全面的提高，在世界风云变幻面前，壮大国威，排除各种风险，充分显示出中华民族不可欺、

不可辱的豪迈气概，进一步捍卫、巩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三)可持续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中国执政党的执政方略之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着眼于人类长远利益和自然资源的关系，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建设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发展的意义，指导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1.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形成

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形成是在环境问题危及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传统的发展模式严重地制约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背景下产生的，是人们对传统发展观的反思和创新。

中国执政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经济社会发展逐渐地转向了"可持续发展战略"。邓小平十分重视可持续发展工作，他虽然没有直接谈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但是在不少场合都有涉及。他很早就指出："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我们要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但是即使若干年后人口不再增加，人口多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也仍然存在。""我们地大物博，这是我们的优越条件。但有很多资源还没有勘探清楚，没有开采和使用，所以还不是现实的生产资料。土地面积广大，但是耕地很少。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我国的经济发展，要"稳步协调地发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

力奋斗”[①]。邓小平的发展战略实质上已包含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中国执政党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邓小平发展思想和发展战略基础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1992年6月，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召开的环境与发展会议上，作出了履行《21世纪议程》的庄严承诺。1992年7月中国组织编制了《中国21世纪议程》。1994年3月，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在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二〇一〇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提出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1995年9月28日，江泽民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中提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党的十五大报告重申：“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②]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必须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坚持计划生育、保护环境和保护资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380页。

② 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

源的基本国策。”[①]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既是当前需要集中力量解决好的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

2.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质，就是要树立新的发展观，改变传统的发展思维和模式，经济发展不能以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而应努力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资源合理利用、环境不断改善和生态良性循环的协调统一，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环境资源的持续协调发展。

第一，坚持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提高人口素质。人口问题是制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我国人口多，人口的过度增长给经济发展、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都带来巨大的压力，也造成许多不易解决的社会问题。必须充分认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坚持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实行优生优育，提高人口素质。做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高度重视劳动就业、人口老龄化、人口流动与迁移、出生人口性别比等问题。改革和创新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和完善依法管理、居民自治、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的工作机制。做好重点地区和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调控体系和相关政策，建立健全计划生育奖励和社会保障制度。

第二，保护和改善自然生态环境。保护自然环境是人类

①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我国自然生态条件复杂,许多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必须加强建设和保护。搞好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增强全民环保意识,发挥公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积极开展生态环境调查和研究,制定生态功能区划和生态保护规划。林业战线要实现从木材生产为主向生态建设为主的重大转变。坚定不移地推进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重点防护林体系建设。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和扩大退耕还林规模,加快宜林荒山荒地改造步伐。治理风沙,减少危害。治理河流,减少水土流失。加强草原建设,保护湿地。加强生物保护,实施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建设工程。增强全民环境保护意识,提高实施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强化城乡污染治理。加强对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的排放控制和综合治理,提高废弃物的综合利用率。重视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各级领导和各地区在制订发展战略时,要正确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

第三,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自然资源相对短缺,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必须合理利用资源,坚持开发和节约并重。依法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水、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湿地和海洋等国土资源,加强综合治理,实现永续利用。加强国土资源管理工作,建立政府管理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资源优化配置机制,全面加强资源调查、规划和管理,不断提高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水平,切实提高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加强对自然资源管理和保护的立法和执法工作,坚决扭转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局面。完善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价格体系,建立资源更新的经济补偿机制。加强

灾害天气和地震预测预报，提高社会防灾减灾能力，减少自然灾害损失。正确处理利用国外资源和维护我国资源安全的关系，积极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更好地发挥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作用。

第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注重持续协调发展。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思想，通过体制改革、科技进步和加强管理，建立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在制定长远规划时要做到：一方面要依据我国基本国情，从我国人口与资源、经济增长与资源供给之间突出的矛盾状况出发；另一方面要依据经济发展的各种制约因素，包括政治因素、人口因素、环境资源因素、教育科技因素等，注重国内外环境条件的变化，不仅要立足于当代人的发展需要，还要为下一代人的发展需要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经济的增长要由依靠生产要素的增加，向依靠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转变。在经济建设中要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要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动力放在改革上面，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运行机制，使经济发展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追求数量，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坚持经济建设、城市建设与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

3.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意义

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对传统发展观的重大突破，是一种全新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

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一个在经济上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社会，又是其他各个方面相互协调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因此，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

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等一系列问题的基本思路，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它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充分阐明了中国未来如何发展的大问题。

(四)西部大开发战略

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中国执政党在世纪之交以非凡气魄所作出的面向新世纪的重大战略决策。实施西部大开发，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它对实现我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1.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积极探索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广泛调查研究和吸取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事关社会主义建设大局的十大关系，其中包括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生产力布局、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等事关东西部发展的重大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现实，面向未来，高瞻远瞩地为我国制定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提出了包括促进东西部地区经济

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的“两个大局”思想：其核心就是先让各方面条件和基础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加快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步伐，以提高参与国际竞争的综合实力，“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的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①。至于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基础上解决沿海和内地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邓小平认为，“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②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按照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思想，在世纪之交郑重地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1999 年 6 月 9 日，江泽民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指出：“现在，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同月 17 日，在西安举行的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江泽民提出了要实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构想。1999 年 9 月 22 日，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提出：“国家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1999 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00 年的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中央西部开发会议等，对西部开发作了具体部署，从而，拉开了西部大开发的帷幕。党的十六大报告高度重视加快西部地区发展对全面实现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77—278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74 页。

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战略意义，指出这关系全国发展的大局，关系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强调要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2.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目标

1999年6月江泽民指出："加快开发西部地区，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也是空前艰难的历史任务。既要有紧迫感，抓紧研究方案、步骤和政策措施；又要做好长期奋斗的充分思想准备。西部各省区的广大干部群众，要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坚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利用自己的优势，创造新的业绩。我们要下决心通过几十年的乃至整个下个世纪的艰苦努力，建设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河秀美的西部地区。"[①]把西部地区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河秀美"的美丽图景，便是西部大开发的战略目标。

3.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意义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是中国执政党在国际形势发生新的重大变化、中国即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历史时刻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一，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现实选择。西部地区国土面积占全国的71%左右，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8.6%，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7.

①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8页。

1%。[1] 可以说，没有西部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都有了巨大的发展。由于东部地区充分利用较好的经济基础和区位优势，加上国家政策上的一些支持，比中西部地区发展得更快一些。地区差距拉大，发展不协调的矛盾日益突出。同时，由于西部地区资源丰富，密集程度高，组合条件好，开发潜力大，是国家长远发展的重要基地。对西部地区开发快慢，直接影响着第三步战略目标实现所需物质资源的保证程度；实施西部大开发，加大西部重要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矿产资源开发投资及提高人们生活消费水平，将会产生一个新的内需市场，加大国民经济的需求拉动；实施西部大开发，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善生态环境，为全国特别是东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屏障。实施西部大开发，使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形成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经济格局，提高我国的生产社会化水平和整体经济效益，有利于加快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

第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利于适应世界范围经济结构调整，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当代世界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经济结构调整正在全球范围内广泛而深刻地进行。我国要紧紧抓住结构调整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加快结构调整的步伐，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利于解决西部地区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形成良好的产业基础，促进全国的结构调整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发挥比较优

① 参见《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9页。

势，提高国际竞争力。

第三，西部大开发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逐步缩小全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全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最终达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关系我国跨世纪发展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1]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重大部署。

第四，实施西部大开发是增进民族团结，实现全国社会稳定和边疆安全的重要保证。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 55 个少数民族，大部分聚居于西部和陆地边境地区，东西部差距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距。加快开发西部地区，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更好地发展起来，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保持边疆安宁和社会政治稳定，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为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加强，奠定坚实的物质和思想基础。

四、执政党的政治发展战略

中国执政党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发展战略。

---

① 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854 页。

这就是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①。十六大对党章也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规定。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上，明确地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出部署，并将它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起，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大基本目标，这是第一次。同时，不仅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一命题，而且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我国政治文明的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政治文明的内涵

文明相对于野蛮而言，通常是指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开化状态。洞察人类文明史，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人类文明的进化发展，总是表现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三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在社会文明的整个体系中，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的总和，它是整个社会文明的基础，社会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以此为前提条件，没有一定程度的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就没有依托和支撑，物质文明的基础作用将决定和制约着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发展。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成果的总和，因而对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起着积极

①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的推动作用。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保证和引导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方向。

政治文明是指人类改造社会的政治成果的总和,是人类政治智慧的结晶和政治发展程度的标志。政治文明是社会文明的关键,它在整个人类文明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政治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整个社会、国家的文明程度,影响和制约着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政治文明通过一定的合理的社会制度,可以更好地组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生产、供给、分配和消费,为人们支配和享用文明成果提供制度保障,也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生产和再生产提供发展动力。"①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更加健康稳定协调地向前发展。具体而言,第一,政治文明既为物质文明建设规定政治方向,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创设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一方面,政治文明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以经济为基础,同时又居于经济基础之上,具有统揽全局的作用。在一定社会的各项工作中,政治总是关乎全局和根本的大事情,居于核心地位,起到统帅的作用,其他工作都要围绕政治工作来进行,离开了政治工作所提供的方针政策和法律规范,其他工作就会陷于无序的混乱状态,经济建设(物质文明)就很难进行。另一方面,政治文明为物质文明建设创设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亘古以来,大凡物质文明蓬勃发展的时代,必定是政治清明、社会安

① 龚廷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政治文明》,《党建导刊》2002年第7期。

定的时代;反之,凡是物质文明衰落的时代,必定是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的时代。政治文明创设的安定团结的国内环境和和平共处的国际环境,是物质文明建设的基本保证。否则物质文明建设就无法进行,即使已经取得的物质文明成果也会毁于一旦。第二,政治文明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基本的政治方向和必要的政治保障。一方面,政治文明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是精神文明发展的前提条件。综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可以发现,凡是精神文明发展程度高的时代,精神文明都是作为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伴生物而出现在人类文明史上的。政治文明创设的前提条件,是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的基本保证。另一方面,政治文明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基本的政治方向和必要的政治保障。

(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意义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1.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20多年的艰苦努力,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第二步目标。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当人类社会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

展阶段。”[①]全党和全国上下要抓住机遇，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地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明确提出要进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并且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实现两种文明协调发展。我们过去一直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并没有将政治文明单独作为一种文明加以阐发和建设。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长足发展，在实践中我们也在不断地进行着政治文明建设。但对于政治文明的重视程度不够。政治文明是社会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是我国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全面建设的过程，只有这三种文明相互协调，共同发展，才能全面推动社会的发展。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政治文明为其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良好的政治环境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向前发展的保障。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背景下，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伴随着我国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思想观念复杂化和利益要求多样化等现象的出现；面对着以科技竞争、经济竞争为主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我们在建设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能否建立起比西方资本主义更发达的新型政治文明，既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现，也关系到社会

①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 页。

主义的前途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

2.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文明迄今为止发展水平最高的社会。社会主义制度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物、继承物和扬弃物，从本质上具有以往剥削制度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具体表现在：可以创造出比旧制度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物质文明）上；表现在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精神文明）的提高上；同时，它更加突出地表现在社会主义的制度文明程度（政治文明）的提高上。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大进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能够使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得以实现和提高，使先进文化得以张扬和发展，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得以实现和维护，使民主政治、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发展与实现得到落实。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主体上否定了政治生活中少数人对于多数人的统治，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倡导和确立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理想，使人类政治文明的主体扩展到了大多数民众；在社会主义文明的客体上，一系列反映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治法律制度和体制安排，使社会主义真正能够建立起高度发达的、充分体现人民群众利益的民主政治模式；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价值取向上，遵守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的政治理念，反映了社会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在当代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根据人民是社会主人的政治理念所设置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社

会主义法制方法的运用，是比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更高的政治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发展水平最高的政治文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体现。

3.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提高党的执政水平的关键因素

建党 80 多年来，无论在土地革命和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都是与长期坚持政治文明所分不开的。党坚持政治文明，形成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三大作风和三大法宝等优良传统和作风，并使其成为了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先进的理论武器、优良的思想作风、严格的组织原则等构成高度政治文明的诸元素，始终是滋养党的生命与肌体的精神营养，是加强统一战线、搞好党内外团结的精神力量，也是党建理论与实践得以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精神动力。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突出特色，是保证人民民主的方向和实践效率的根本。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利于坚持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保持党的先进性，有利于"三个代表"的实现，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提高党的执政水平的关键因素。

（三）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

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①]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与途径：

1.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是我们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它涉及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协调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和各社会集团的利益，保持经济增长、政治平等和社会发展。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既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代表，又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设计者、领导者和组织者。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中国共产党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并能协调全社会的各种利益关系，保证社会主义民主切实而有效地实施。同时，坚持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根本保证。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目标的实现。没有党的领导，社

---

①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1 页。

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就会失去方向。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国执政党和政府的一切权利都是人民给的。“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最本质的内容就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①]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和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民当家作主是通过党对国家的领导来实现的。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的同意和授权,政权运作的功能是表达和实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求主权在民、人民权力至上、民意至上、人民当家作主。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八届和九届全国人大期间,代表团和代表提出的议案达 8108 件,建议、批评和意见 26384 件。[②]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优越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是不仅在理念上、形式上承认人民的民主权利,而且在实质上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真正实现社会绝大多数人的自我统治和管理,确保人民真正成为自己社会的主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主体力量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法制保障。它是使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结合并辩证统一的媒介物,是实现

①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42 页。
② 新华网北京 2003 年 4 月 2 日电。

途径。依法治国,其核心内容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和规范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从而使人民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得到法制的确认和保证。党的十五大作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大决策,标志着中国执政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的重大转变。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依法治国是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

2.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从中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

江泽民指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我们要发展的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①]在这里,江泽民明确指出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坚持的政治方向和基本方针。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必须立足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取得

① 《江泽民"5·31"重要讲话学习读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成功。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政治按其层次来划分,可以分为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具体政治制度和政治运行体制,它们的有机结合与协调运行,共同构成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结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国体上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在政体上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并构建和实施了具体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运行体制。这些民主政治建设的成果,都是从中国实际出发,通过不断实践和探索才取得的。我们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决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决不实行像西方国家那样的“三权分立”、多党制和议会制。但为了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我们必须在具体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机制上坚持改革。借鉴和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特别是西方国家政治文明建设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从而实现社会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之路。

3.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要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①]因此,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建立民主、科学的立法制度,要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

①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1 页。

立独立公正的司法制度，要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建立行之有效的国家行政权力的约束和监督制度，公民权利保障制度，国家权力有效配置的内部制约制度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制度，要维护宪法的尊严，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切政府机关都要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实行执行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的监督作用，确保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立在制度文明的基础之上。

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要加强社会主义规范文明的建设。政治行为规范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又是衡量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社会要处于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状态，就需要有规范的社会调整体系，有一系列规则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政治行为规范能够直接实现对社会政治关系的调整，规定社会文明的行为模式，为社会主体和国家权力机关提供一种政治文明范式。因此，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规范化建设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还要注重程序化建设。合理而规范的程序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尤为重要，它是实现公民权利平等的前提，是政治制度设计的保障，是政治权力制衡的机制。制度只能规定各政治主体在政治过程中的地位和产生方式等，这些制度规定在实际政治过程中得以落实，就需要一系列详尽而具体的程序。政治活动一旦失去合理的程

序，就很有可能破坏公民的自由、平等、权利和利益的实现。因此，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程序化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因素。例如：选举、投票、决策，法律的立、改、废，干部的任免、升迁，公民权利的实现和维护，公民意志的表达，如此等等，都需要经过规范的、合法的程序。因此，我们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程序化建设，确保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有效实施。

五、执政党的文化发展战略

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从广义上讲，文化既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又是一种精神价值体系，有先进与落后之分。通常情况下，不能简单地把文化分成先进的和落后的两种类别，大量的不同类型的文化是可以并存的，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先进与否的问题。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它的存在发展受制于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但它又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社会经济和政治总是不断发展的，文化也必然随之而不断发展。一般地把文化分为思想道德文化、科学理性文化、文化艺术、社会风俗四种类型。

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相互渗透。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同时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中国执政党历来重视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发展战略："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①]党的十六大报告号召全党，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

（一）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先进文化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体现社会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最根本利益，反映时代发展潮流的文化。先进文化是社会发展进步的灵魂，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先进文化包括先进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知识。人类文明越发展，社会越进步，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就越显突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注意做好以下几点：

1. 坚持和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当代最科学、最先进、最革命的理论，它既是人类先进文化发展的产物，又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也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宝

①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8 页。

贵结晶和伟大代表。“没有先进理论武装的党，不可能是先进的党；没有先进理论武装的共产党员，不可能发挥先进战士的作用；拒绝用先进理论武装头脑的人，就不会有真正的党性，就没有资格存身于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行列。”[①]中国执政党要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加强和巩固执政地位，就必须“牢牢把握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趋势和要求，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立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前沿，不断发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从思想上精神上正确武装和不断提高起来”[②]。就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始终坚持和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③]

2.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最根本的就是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牢牢把握“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这一根本要求，用“三个代表”指导

①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11 页。

②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02 页。

③ 李长春：《在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 年 8 月 25 日。

整个文化工作，在文化领域的各项工作中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衡量和检验文化工作的成果，并且发扬与时俱进的精神，积极推动文化创新。

3. 全面贯彻党的文化发展方针

中国执政党关于文化发展的基本方针，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文化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牢牢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重要保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面贯彻党关于文化发展的基本方针。

4. 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当代中国居于主导地位，引领和整合着其他各种文化。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社会上还存在一些带有迷信、愚昧、颓废、庸俗等色彩的落后文化，甚至还存在一些腐蚀人们的精神世界、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腐朽文化。思想文化领域，先进文化不去占领，落后文化、腐朽文化就会去占领。我们要坚持用先进文化占领思想阵地，不断提高文化产品品位和群众的文化鉴赏水平。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决不允许它们自由泛滥。通过完善政策制度，加强教育管理，逐步缩小和剔除它们借以残存和滋生的土壤。

(二)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共同的社会

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为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和接受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是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文化传统、思想情感等的综合反映。”①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它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民族文化的最本质、最深刻的体现。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必然要求，是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客观要求，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内涵之必须。

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国执政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丰富和发展着这个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支撑。

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振奋和弘扬了民族精神。新民主主义时期，我们党创立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红岩精神等，丰富和发展了民族精神。这些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与时俱进的思想风范和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优良作风，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思想境界、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浩然的革命正气的生动体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作为中国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继续高

① 《十六大报告辅导》，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07 页。

举爱国主义旗帜，振奋和弘扬民族精神，创造和展现了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大庆精神、抗洪精神以及“六十四字创业精神”等，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民族精神。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包括继承和发展中国执政党的这些优良传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征途中，中国执政党必将带领全国人民使民族精神更加发扬光大，增添新的时代内涵，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不断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

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深入开展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不断振奋民族精神；坚持文化发展的基本方针，吸取世界各民族的优长，不断丰富和发展民族精神；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一项重大的文化建设系统工程，各级党委要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摆上议事日程，采取有力措施，认真加以实施，从社会舆论、法制建设、政策引导等方面为其提供有力保障。通过各个方面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三）积极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

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然要求。

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保持国家的稳定和繁荣，需要法律提供制度保证，需

要道德规范提供精神保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做到使法律和道德在内容上相互衔接、相互协调，在作用上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根据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尽快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

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要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要深入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宣传教育，引导人们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着力加强党员干部的道德建设。各级领导干部要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切实改造主观世界，做到立党为公、甘于奉献、作风民主、办事公正、勤政廉洁。要健全道德监督机制，发挥社会舆论的道德评价功能，使有德者的行为得到张扬，使缺德者的行为受到谴责。要在全体人民中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众志成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

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要以道德建设为重要内容。认真贯彻党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全社会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特别要加强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建设，引导人们在遵守基本行为准则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标。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突出思想内涵，强化道德要求，使群众在参与中得到提高，得以净化。注重从

法制建设、政策引导和社会舆论等方面为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保障。

此外，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还需要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继续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等工作。

六、执政党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

“一个政党的纲领就是一面旗帜。”[①]“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②]人们对政党的认识往往就是通过其纲领来进行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③]政党的纲领规定当前及长远的奋斗目标，是一个政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样的政策策略的根本标志。政党纲领的内涵包括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从广义上讲，党的纲领包括党的指导思想、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现阶段以及最终奋斗目标等方面的内容，是一个政党全部主张的集中体现。从狭义上说，党的纲领包括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最高纲领是党奋斗的最终目标；最低纲领是党根据所处的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时期所要实现的具体目标，达到的一种具体任务。中国执政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21 页。

②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25—326 页。

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她是“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1]。这是中国执政党为实现其奋斗目标所制定的具有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的执政方略。

(一)为什么要坚持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

中国执政党只有坚持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才能永葆党的先进性,完成其所肩负的历史重任。坚持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是有关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现实问题,是能否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重大问题。

1.坚持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是中国执政党建设的重要经验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就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纲领。党的二大明确把党的纲领区分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使它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深刻论述了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关系,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如果不为这个目标奋斗,……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

---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21页。

的共产主义者。”①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经过艰辛的探索，党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党的十五大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作出了准确的回答，为中国执政党保持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团结统一，奠定了牢固的政治基础。

2.坚持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有利于科学地认识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既是一种科学的理论，又是一种运动，一种制度。第一，共产主义是一种科学的理论。因为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由于基本矛盾的作用，将导致其他矛盾、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从而导致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诞生。社会主义经过不断发展和完善必将走向共产主义。因此，中国执政党“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原理”。第二，共产主义是一种运动。共产主义“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②。它的实现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因此，“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9—1060页。

②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21页。

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①]。第三，共产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社会理想和社会制度，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的。我们对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可以作出科学上的预见，但未来的事情具体如何发展，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以往的经验教训已经充分说明，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很容易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之中。

3. 坚持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有利于正确处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关系

共产主义要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变为现实。为此，就需要共产党人持之以恒地奋斗。进入 21 世纪，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中国执政党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最大和最重要的国情出发，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客观需要。坚持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有利于调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同时，又有利于全党和全国人民正确地理解最高纲领，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79－380 页。

(二)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辩证统一性

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辩证统一性主要体现在,最低纲领是最高纲领的基础和前提;最高纲领是最低纲领的目标和方向。每一个最低纲领的实现,都为实现最高纲领迈出坚实的一步。在制定党的最低纲领时,应十分注重与最高纲领相联系,应以最高纲领为指导,决不能把党的阶段性目标、任务和利益,作为党的最终目标、全部任务和根本利益,要始终保持最低纲领的正确方向。同时,又应十分注重与最高纲领相区别。放弃最高纲领不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不顾最低纲领同样不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在迈向共产主义的征途上,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既有每个阶段的最低纲领,也有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最高纲领由一个个最低纲领次第完成而最终实现。因此,无产阶级政党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在始终坚持最高纲领的同时,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当时的社会形势和基本走向,紧紧抓住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大胆正视各类问题,把最高纲领置于不同社会阶段的现实基础之上,及时变更和制定符合各阶段实际的最低纲领,分阶段有步骤地推进共产主义事业的实现。当一个个最低纲领顺利实现时,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纲领的最终实现便是势在必然的事情了。

“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将来条

件具备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会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①]从这个论断出发,中国社会现今和以后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即整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更高的发展阶段;三是与全世界一道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三个阶段的划分,有利于我们对于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辩证统一关系的认识,有利于我们制定和规范三个不同层次、不同阶段的有关中国发展的战略纲领。中国执政党的纲领,涵盖了这样相互联系的三个层次的奋斗目标。这对于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国执政党的纲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为实现党的纲领而奋斗

中国执政党为完成所肩负的历史重任,号召"全党同志既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定信念,以高尚的思想道德要求和鞭策自己,更要脚踏实地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②]。共产党员要始终成为党的纲领的忠实实践者,要始终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南,坚定信念,脚踏实地地为实现党的各项任务而奋斗。

第一,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就会脱离实际。但如果我们不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党的最高纲领而奋斗,而只顾眼前,就会失去前进方向和精神支柱。共产主义是我们的远大理想和最终目标,也是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22页。

②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22页。

我们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永远是鼓舞我们坚韧不拔、奋勇前进的光辉旗帜。放弃党的最高纲领，不仅贻害未来，而且损害现实，必然会使现实的实践因偏离正确的方向而招致失败。苏东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的领导人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因此，全党同志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在向共产主义远大目标而奋进的征途上，披荆斩棘，排除万难，达到胜利的彼岸。

第二，为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而努力奋斗。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全党同志要为实现党的最低纲领而努力奋斗。放弃党的最低纲领，不仅损害现实，而且贻害未来，必然会因超越阶段而南辕北辙，适得其反。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曾经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已经不太遥远，对共产主义作了许多具体的设想和细致的描绘，甚至急于“跑步进入”，从而陷入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国执政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客观依据，也是确定党的基本纲领的客观依据。党的基本纲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因此，全党同志要按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要求，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站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前列，立足本职工作，坚持与时俱进，埋头苦干，开拓创新，通过自己的先锋模范作用，带领人民群众为实现党的基本纲领而努力奋斗。

第三，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执政党的党风是攸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中国执政党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作

风,其基本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不可能得到贯彻落实。为了实现党的纲领,就必须把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现在,中国执政党的作风总体上是好的。但也确实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执政党要在实现党的纲领的全过程中,始终注意党的作风建设,真正做到执政为民,永葆党的先进性。

中国执政党的执政方略,立足中国的现实,放眼世界的大局,关照未来社会的发展,具有宏观的战略气势,实乃有关中国人民福祉和中华民族振兴的伟大韬略,又是人类社会向着美好未来前进所向披靡的风帆。

第五章　中国执政党的建设

执政党执政与执政党建设是紧密相联的:执政党建设是执政的基础,执政为民、有效执政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的重要目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这个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建设的普遍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特别是苏东国家执政党的根本教训;这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分歧与困惑所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围绕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形成的。建设什么样的党,核心是保持党的先进性问题;怎样建设党,核心是党的建设道路、方式问题。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执政党。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关键在于把党建设好,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党的坚强而有力的领导,是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必须毫不动摇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

点，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①。

一、执政党建设的核心

加强和改进执政党的建设，关键是要抓住建设的核心。执政党的先进性是一个从根本上关系到党的性质的问题，也是关系其能否巩固执政地位的根本问题。保持党的先进性，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永恒主题。抓住先进性，就抓住了党的建设的主题，就抓住了有关执政党生死存亡、国家前途命运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执政党如果丧失了先进性，就会丧失生命力，丧失执政的资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如何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如何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如何永葆党和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始终是中国执政党所关注的重点。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完成党所肩负的历史重任。执政党建设的核心是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高度重视党的先进性问题

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在为他们所创建的世界上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其纲领《共产党宣言》时，深刻地阐明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明确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

① 胡锦涛：《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年8月23日。

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①]"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②]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基础，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的基本原则，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目的和根本任务的学说。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进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具体实践，执政党建设的先进性问题也就无从谈起。

列宁在创建和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建党的整个过程中，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同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等机会主义派别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既坚决反对把工人阶级政党变为"超阶级"、"非阶级"或"人民的民主组织"的各种企图，又坚决反对把党和工人阶级混同起来，等量齐观，主张"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列宁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只是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先进部队和领导者。它由工人阶级中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最高的那部分人组成，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南，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自觉表达者，而且是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有组织性的分子"。大家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对无产阶级政党下过定义，从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页。

克思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来看，党与阶级之间的界限也是不清楚的。[①] 列宁从理论上说明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与工人阶级之间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明确的界限，从而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的理论。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这样一个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一贯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毛泽东建党学说，之所以特别强调从思想上建党，要求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就是要在一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不断克服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努力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从列宁的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有组织性的分子"，到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着重思想上建党"的思想，其中的一条红线，强调的都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贯穿始终的都是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基本思想。

把党建设成什么样的党，同样为邓小平所高度重视。1965 年邓小平就指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这不仅是我们这一代的问题，也是下一代的问题。[②] 1980 年，他重申"党应该是一个战斗的队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应该是统一的、有高度觉悟的、有纪律的队伍"[③]。"领导全体党员和全

---

① 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组编：《列宁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77—182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44--348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68 页。

国人民为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任务而战斗。”[①]1982 年，邓小平鲜明地提出，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核心”。这一目标的确立，既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又通过强调党在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心任务、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领导核心的政治地位、重新确立和体现了党的性质、党的建设的时代特征和围绕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来建设党的要求。根据邓小平的思想主张，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都坚持了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的目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和发展这一条。党的性质决定党的目标，党的目标特别是党的建设目标的时代特征反过来又直接影响到党的性质。党的性质是由指导思想、性质规定、政治路线以及党的建设的时代目标等共同决定的。

在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的历史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始终把先进性问题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合著的第一个科学共产主义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②]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奋斗，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思想。列宁结合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实践，十分重视党的先进性，强调：“党是阶级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71—27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06 页。

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思想基础，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党和发展，历来都把先进性作为党的建设的核心。

（二）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需要时刻关注的一个普遍问题

先进性问题得以解决，才能正确把握“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才能科学指导党的建设实践。列宁创建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党时，首先与孟什维克、经济学派等机会主义派别进行党的性质的论争。中国共产党建党时，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就有党的性质的一些条文，确定了“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基本观念，公开宣示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执政以后，苏联、东欧各国共产党虽然仍然宣称自己是“工人阶级先锋部队组织”，最后却被人民所抛弃，甚至连工人阶级也不再留恋自己阶级的政党和国家。究其根源，或由于腐败，或由于官僚集权反民主，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早就背离了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宗旨，背离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以致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演变成为少数特权阶层的党。他们宣称代表人民利益，但是人民不买账，不认可。

社会主义旗帜不倒的越南、古巴、老挝、朝鲜共产党纷纷从各自角度总结苏东剧变的教训，在执政条件下进一步按“工人阶级先锋队”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基本要求建设党。越共中央认识到，在当前主观、客观条件下党内存在的蜕化变质问题已成为党的建设工作的突出和迫切问题。它在1992

年通过了《关于革新和整顿党的决议》,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党的建设为关键",目的就是把越共建设成为一个"源于人民、属于人民、为了人民"的党,一个纯洁和坚强的党,以适应新时期的需要,从而开创了越共革新时期党建工作的新起点。古巴在苏东剧变后受到严重的冲击,迫使古巴 1990 年宣布进入"和平年代的特殊时期"。为顶住国内外巨大压力和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古巴共产党提出要"建设一个钢铁般坚强的党",在思想建设方面古共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又突出古巴革命的民族性,通过古共四大将马蒂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列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正式写进党章。其"四大"党章规定"古共是马蒂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党"。老挝人民革命党是老挝的执政党,也是老挝惟一的政党。1984 年老挝党"四大"确立了革新路线,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1989 年苏东剧变对老挝造成严重冲击。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处于低潮的形势下,西方对老挝加紧"西化"、"分化"活动,甚至党内也有人提出要搞"多元化"、"多党制"。对此,老挝党提出以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革新路线为主要内容的六项基本原则。为了继续坚持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方向的立场,确保新形势下马列主义政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老挝党的"七大"又提出:加强党对全社会的领导"是使国家稳步迈向既定目标的决定因素",强调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自我整顿和完善,以保证党"真正成为带领全社会完成革新事业的先锋队"。

(三)先进性问题是社会主义执政党最根本的经验教训

先进性是党的一面旗帜,具有巨大的号召力。80 多年

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全国人民推翻旧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制度；之所以能够带领全国人民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之所以能够带领人民战胜各种困难和险阻，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了社会前进的正确方向，永葆了党的先进性。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一个教训，就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发展到顶峰的“文化大革命”，把好好的一个国家搞到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党的建设遭遇严重的挫折，而且直接反映到党的性质上，即“九大”所谓“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对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执政后仍然要建设一个阶级斗争的党，不但是阶级斗争扩大化，而且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基本要求。这种状况，凸显了建国后我们党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这一基本理论问题上的根本教训。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才把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重新确立党的建设目标是把党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苏联共产党是当时另一个最大的社会主义执政党。从 1961 年开始，苏共党纲、党章就一直明确地规定：苏联共产党是苏联工人阶级、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中先进的、最有觉悟的部分联合起来的，苏联人民久经考验的先锋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此时苏共性质的规定，一个缺点是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的“战斗”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和

无产阶级专政，重视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够，更关键的是，苏联上下，言行不一，严重背离了“代表无产阶级、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利益的规定。从苏共干部制度来看，斯大林把列宁在十月革命夺取政权特殊时期形成的干部委任制不加分析地加以强化，作为任命干部的惟一方式，不但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而且由于干部只对个别上级领导负责，不用对人民负责；只怕领导批评，不怕群众反对。结果，委任制变成党的领导干部脱离人民、背离人民利益的催化剂，变成官僚特权阶层的制造机制，最终导致苏共完全丧失了工人阶级政党和列宁主义政党的性质。戈尔巴乔夫看到了苏共特权利益集团背离“工人阶级政党”性质的不少问题，但是，从 1990 年苏共二十八大的提法来看，他在党的性质上又走到直接否定、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邪路上走，错误地规定苏共是一个按照自愿原则联合起来的苏联公民、实行以全人类价值和共产主义理想为基础和纲领的政治组织。其目标是在苏联建设“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1991 年苏共中央 10 月全会又将苏共的性质改变，规定：苏联共产党是一个社会自由党和民主改革的党，一个维护社会的全人类价值的党，一个主张经济政治和精神自由的党。这就使苏共从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变成维护“全人类价值和社会自由”的党，这种“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思想主张最终加速了苏共的破产与灭亡。

（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的

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就是在解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三个代表”命名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的党建思想体系。如前所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后，邓小平就开始集中考虑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当然，当时主要是从拨乱反正的角度做了两件事，一是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分别从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坚持集体领导和反对个人专断，坚持党性和根绝派性，发扬党内民主，接受党和群众监督，不准搞特权等角度，针对“文化大革命”对党的性质的干扰和破坏，进行了拨乱反正，并且正式抛弃了“领导无产阶级对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先锋队组织”的规定。再到十二大报告和十二大党章，为了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我们党对十一大党章作了许多有根本意义的修改，强调要“努力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坚强核心”。十二大党章总纲中，围绕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这一时代课题，对党的性质规定了三句话，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同时对党的指导思想，对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任务和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要求，对党在国家生活中如何正确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都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规定，以后又进一步明确：“正确认识和解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考、新观念、新论断，形成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理论。这一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1989 年 6 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邓小平“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

行了”的意见，着眼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聚精会神、坚持不懈地抓党的建设。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指出，我们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形势和任务不断变化，但是党的性质不能变。同年 12 月，江泽民在党建理论研究班上发表了“为把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斗争”的长篇讲话。讲话开始把工人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与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相联系，并且围绕党的先进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即“没有先进理论武器的党，不可能是先进的党；没有先进理论武器的共产党员，不可能发挥先进战士的作用，拒绝用先进理论武装头脑的人，就不会有真正的党性，就没有资格存身于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行列”①。这段话表明，“先进性”此时已经成为江泽民党建思考的着重点。

1994 年党中央召开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党的建设问题。江泽民代表党中央在会上提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即“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②。2000 年 2 月，江泽民同志对党的建设有了更为深入的历史总结和理论思考，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直接针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即直接从党的性质的角度出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 11 月版，第 11 页。

②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 11 月版，第 154 页。

发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这个党”作出了达到理论成熟程度的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即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党的十六大对党的性质的认识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明确指出：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五）先进性是党迎接挑战的锐利武器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柄双刃剑，既给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继续加强执政的历史机遇，又对其执政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知识经济已经向我们走来，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已经成为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尽管世界多极化已成事实，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在发展，国际敌对势力在政治观点、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方面对我们进行“西化”和“分化”的企图始终没有改变。中国执政党在当今世界格局复杂多变、不可测因素众多的情况下，能否驾驭形势，更好地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要看其能否保持先进性。同时，保持党的先进性，也是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靠其自身的先进性，取得了彪炳青史的辉煌成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组织、成员的结构和执政的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总体上说，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是好的，是有战斗力的。但毋庸讳言，近些年来，一些消极腐败的东西滋生蔓延，从思想上、作风上和组织上严重侵蚀着党

员、干部队伍,影响着党的先进性。因此,为了确保党的先进性,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也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六)保持党的先进性,是中国光明前途的希望所在

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已经告别了苦难的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党肩负着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历史重任。面向未来,中国共产党只有坚持党的先进性,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才能完成这三大历史任务,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保持党的先进性,需要全党同志的高度重视。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新世纪、新阶段、新形势、新任务,为继续保持党的先进性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形势喜人,形势又逼人,不进则退。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使党更加坚强地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迎接挑战、知难而进,党只有坚定地站在时代发展潮流的前头,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为此,要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一步解决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提高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始终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

领导核心。[①]

二、执政党建设的总目标和总要求

执政党的建设目标，是有关党的建设的重大原则问题。只有制定出正确的党的建设目标，整个党的建设工作才能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为确立正确的建党目标进行了长期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为此，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从而明确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党的建设方向。党的十五大指出要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②]。党的十六大在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对党的建设的总目标进行了全面、科学、准确的表述。执政党建设的总目标又加进了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深化和丰富了党的建设目标。党的十六大报告对党的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总要求，为新世纪新阶段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指针和行动纲领。

---

① 胡锦涛:《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年8月23日。

②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63页。

(一)执政党建设的总目标

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必须有明确的目标。党的十六大对党的建设总目标进行了新的界定。这就是要"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保证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①。这对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 永做"两个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一论断,是对党的先进性理论所作的新的科学概括,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要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号召力,提高执政能力,中国共产党就必须永做"两个先锋队"。

第一,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她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一个本质要求。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的伟大事业。在社会主义中国,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也只有这个阶级才是社会主义事业最主要的依靠力量。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必须以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为前提条件。党一旦失去了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就必将丧失作为社会主义事业领

①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0 页。

导核心的政治资格，中国也必将因此改变社会主义方向。因此，“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①。能否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不仅关系党自身的兴衰成败，而且关系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

由于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阶级状况、阶层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此背景下，要正确地理解和衡量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我们党的阶级基础仍然是工人阶级；党仍然是由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党员的人数已达6800多万；党的指导思想仍然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并增加了和其一脉相承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正确理解党的先进性，还必须澄清有关党的先进性的若干认识问题：第一，信息革命的发生，知识分子的增加，没有改变工人阶级的先进性。知识分子用脑力进行劳动，这只是劳动方式的改变，并没有改变工人阶级在生产劳动中的地位和作用。邓小平理论早就明确：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西方所指称的“中产阶级”。第二，党员的阶级出身或工人阶级成分在党内所占的比例不是决定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关键因素。我们强调党要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并不是说党的成员必须是工人或者是出身于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认为，判断一个政党的性质，最主要的是看它的纲领和路线是什么和代表什么人的利益。我们决不能仅仅把党的成员是否来自工人阶级或者工人阶级在党的队伍中占数量的多少视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为衡量党的性质、衡量党是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标准。第三，部分工人群众的工作岗位发生变化，大批职工下岗，没有改变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性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把某些不符合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行业逐步淘汰，进而发展那些符合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行业是大势所趋。这就不可避免地使部分职工下岗转岗。在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中，在先进取代落后的进程中，中国工人阶级的整体素质和整体优势正在进一步提升。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一些工人群众的工作岗位发生变化，"这并没有改变我国工人阶级的地位，而且从长远看有利于提高工人阶级的整体素质，发挥工人阶级的整体优势"[①]。

第二，中国共产党同时也要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在当代中国，强调中国共产党自觉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党执政的实质在于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服务，其执政使命就是要把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集中体现这种根本利益的国家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党如果不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去自觉实现这个要求，执政基础就不牢固。党作为中国全体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忠实代表长期执政，其执政的群众基础是除了敌对势力和犯罪分子以外的属于人民范畴的一切社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12页。

会成员。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并且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向前推进，社会成员就业的跨所有制、跨行业、跨地区流动的周期将越来越短，其社会身份的变化频率将越来越快。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绝大多数人员，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通过诚实劳动、勤奋工作和合法经营，为推进社会进步作出了贡献。他们同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中国共产党理应代表他们的利益。没有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党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党在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同时，必须自觉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与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必要前提。而自觉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必然要求。“两个先锋队”理论，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当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是由党的先进性所决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中国近一百多年的历史表明，许多政党、派别和志士仁人，都没有

找到国家振兴和民族解放的道路。从鸦片战争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80年中，封建统治者丧权辱国，社会战乱不断，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饥寒交迫。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现在的80多年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空前团结和组织起来，冲破重重难关，革命斗争不断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人民当家作主，其社会地位、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显著提高。有了共产党，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长期奋斗历程中得到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结论。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顺利实现党提出的战略目标，始终保证我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顺利前进；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创造长期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才能更有效地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投身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来，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国家，要把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党的纲领和目标，只有始终不懈地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适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由于党的队伍、党所处地位、党的任务和党所处环境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我们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必须改善党的领导。要坚持从新的实际出发，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活力。

3.做好"三个代表"

"三个代表"不仅充分体现了党的先进性,而且坚持和发展了党的十五大所制定的建党总目标。它不仅把执政党建设问题作为认识的出发点,而且也为检验执政党建设是否有成效提供了根本的标准。它进一步明确了党的建设的方向、途径问题,强化了党建的基本任务和要求,使中国执政党在任何风浪面前,有了更加可靠的保证。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衡量和审视党的先进性问题,紧密联系当代中国的实际,把党的先进性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同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联系起来,把保持党的先进性问题放到了影响当代中国社会进步最基本的问题中去思考。"三个代表"既坚持了对党的性质的基本规定,又进一步回答了这一性质所集中体现的内涵,把党的阶级性、先进性、代表性更加紧密地结合了起来,把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内容和要求更加紧密地统一了起来,把对党的组成成分的要求与对党的路线纲领的要求更加紧密地融合了起来,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党的先进性的内涵。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抓住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三个基本要求,很好地体现和把握了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把党的先进性的内在要求和外在形式有机地统一了起来,把深刻地认识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统一了起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高屋建瓴,总揽全局,言简意赅,含义深刻,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

学说，它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科学地集中和概括了党的先进性理论。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更好地坚持"三个代表"、做好"三个代表"。要始终坚持与时俱进、保持党的先进性、坚持执政为民。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不辱使命，不负重托，要认真贯彻"三个代表"，争做"三个代表"的先锋。要扎扎实实做好党的建设的各项工作，保证党的建设按照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展开，朝着党的建设总目标来加强，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只要坚持做好"三个代表"，中国执政党就能更加坚强，更加团结，更加兴旺发达，它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二)执政党建设的总要求

为了实现执政党建设的总目标，必须遵循执政党建设的总要求。

1. 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面反映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时代发展的要求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把什么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历来是执政党建设的根本问题。党的十五大把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进入新世纪，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郑重写入党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

验，集中全党的智慧和创造，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又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以新的思想、观点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中国执政党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才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面反映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时代发展的要求，才能把握党的建设的根本和全局，保证党的建设的正确方向。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揽党的建设的全局，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际成效作为衡量党建工作的根本标准。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保证全党坚定不移地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 一定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

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中国执政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也是它的一贯方针。坚定不移地贯彻好这个方针，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保证。党在80多年的历史征途中，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

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两大历史性变化，既有利于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又增加了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执政党的建设和管理，比没有执政的政党要艰难得多。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一些执政几十年的大党、老党先后失去政权，有的甚至走向衰亡，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党脱离群众、失掉民心。前车之鉴，我们务必引以为戒。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必须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贯穿于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纪律和制度建设的各个方面，切实落实到对各级党的组织、广大党员和干部进行教育、管理和监督等各个环节中去。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必须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新时代、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对党提出了许多新挑战和新考验，集中起来就是两大历史性课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取决于中国执政党。关键取决于党，不仅取决于党的正确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也取决于各级党组织贯彻实施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的能力和水平，也就是说，取决于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处于执政地位，肩负着重要的领导责任，要把我们这样

一个 12 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设好，就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紧密结合生产力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紧密结合人民群众对提高物质文化生活的要求，紧密结合党员、干部队伍的重大变化，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努力掌握科学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同时，要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3. 一定要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前进的脉搏，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使党的工作充满活力

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是否科学、有效，直接反映着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高低，体现着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是否科学和深刻，关系着党的执政地位能否巩固和社会主义国家能否长治久安。自从成为执政党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执政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比较科学的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党的事业的发展。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党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党所肩负的任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这一切都对中国执政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新形势下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执政党必须自觉地适应这些变化，不断改善党的领导，改进党的建设。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执政党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要“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既保证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又充分发挥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和其他方面的职能作用”①。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不断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要改革和完善党的组织设置、活动方式和工作方法，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和凝聚力，从而使党的工作充满生机和活力。

4. 一定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既立足于做好经常性工作，又抓紧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

党的建设主要包括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这三大建设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依存，既各有侧重又彼此联系，三者统一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思想建设是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思想基础；党的组织建设是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的组织保证；党的作风建设是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重要体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求我们必须把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制度建设在党的建设中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要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通过创造性的工作，把党建设好，使党在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坚强，组织上更加巩固，制度上更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15 页。

加完善。

第一，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全党同志要努力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理论学习不断引向深入，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上下功夫，在运用理论研究解决当前实际问题上下功夫，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创造新经验，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第二，加强和改进党的组织建设，从组织上巩固党。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活力和团结统一。建设一支能够担当重任、经得起风浪考验的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形成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层。认真贯彻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把那些德才兼备、实绩突出和群众公认的人及时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改进干部管理办法，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步伐，努力推进干部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使干部能上能下，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开创人才辈出的新局面。要以提高素质、优化结构、改进作风和增强团结为重点，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持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坚强领导集体。切实做好基层党建工作，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坚持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拓宽领域、强化功能，扩大党的工作的覆盖面，不断提高党的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第三，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我们一定要抓住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个核心问题，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根本目的，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按照中央提出的“八个坚持、八个反对”，一靠教育，二靠制度，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着力解决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特别是要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同时，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

第四，加强和改进党的制度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全过程，不断提高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坚持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切实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拓宽党内民主渠道，加强党员对党内事务的了解和参与。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委员会制度，形成和谐有效的党内议事和决策机制。建立健全一整套切实管用的规章制度，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提供可靠的制度保证。

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既要立足于做好经常性工作，常抓不懈，持之以恒，又要抓住重点，抓紧解决群众反映强烈、严重

损害党的形象和威信的突出问题。真正做到在党的建设中，把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同时注重制度建设，各个方面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确保党的建设整体水平的极大提高。

(三)执政党建设要紧紧围绕党的基本路线来进行

中国执政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党的政治路线，它关系全局、指导全局、决定全局，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部实践的指南和依据。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规律，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它就像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为执政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 20 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政治路线。1992 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明确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①]"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②] 1997 年 9 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郑重指出："全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70－371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71 页。

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是近二十年来我们党最可宝贵的经验，是我们事业胜利前进最可靠的保证。”[①]党的十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必须紧密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和改进党的建设。”[②]

执政党的建设，历来都是同党的历史任务，同党为实现这些历史任务而确立的政治路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因为：

第一，政治路线决定着执政党建设的方向。中国执政党的最高纲领和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但是，实现这个最高纲领和目标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要经过若干不同的历史阶段。党的政治路线是党在一定历史时期为实现自己的政治任务即奋斗目标而制定的具体的行动纲领，是全党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基础。在每一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党的政治任务都是不同的，党必须根据自己的政治任务的不同科学地制定在这个阶段的政治路线。党的政治路线决定着党在一定历史时期行动的方向，当然也就决定着党的建设的方向。

第二，政治路线决定执政党建设和事业的成败。执政党的建设历来都是围绕党的基本路线进行的。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巩固和发展，是同其所制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对党的建设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历史经验表明，什么时候党的政治路线正确，执政党

---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59页。

② 《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9日。

的建设就能健康地进行，党的组织和力量就能巩固和发展，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反之，党的政治路线发生失误，执政党的建设就会遭到严重损害，党的组织和力量就要削弱，党的事业就要遭受挫折。

第三，政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有赖于执政党的建设。党的建设并不只是消极地反映和适应政治路线的要求，执政党的建设对党的政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也有着积极的直接的影响。党的建设搞好了，才能保证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

紧紧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建设党，就要做到：

首先，执政党的建设必须符合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①]江泽民认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始终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③]"我们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④]"各项工作"，当然也包括党的建设工作。党的思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②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③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④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58页。

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都必须适应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能违背或偏离。

其次，执政党的建设要在贯彻落实党的基本路线的伟大实践中来加强。要把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都组织和发动起来，让他们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去。这样，既有利于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又有利于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学习现代化建设的本领和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不断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使执政党真正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再次，坚持以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实际效果作为检验执政党建设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一般地说，一个地方和单位的党组织能够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生产力发展，经济发达，就说明党的自身建设也是好的；反之，如果一个地方和单位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得力，不能在实践中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坚持改革开放，生产力发展缓慢，经济落后，也往往是因为党的建设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因此，执政党的各级组织都要紧密结合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实践，来分析和加强执政党的建设。

三、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这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的建设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执政能力建设虽然与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紧密相关,但它对党的各方面建设起牵头管总的作用。加强执政党各方面的建设,最终都应该体现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上来,体现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上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对于从根本上加强执政党建设,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客观要求

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由党的执政地位所决定的。中国政党制度的特殊性更加凸显了加强中国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加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由以下因素所决定的:

1.世界形势发生剧烈变动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尽管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但整个世界处在极其复杂而深刻的变动之中,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不稳定性因素在增多。当代世界,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

的力量组合和利益分配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加紧实施“和平演变”战略，通过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军事、外交等各种手段进行渗透和遏制，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和执政党执政地位的丧失，为中国执政党敲响了防微杜渐的警钟。其他一些国家长期执政的一些大党、老党也相继丢掉了政权，丧失了执政地位。雄辩的事实证明，执政党如何巩固执政地位是当代政党政治面临的大问题。已有80多年的历史，在中国执政已达5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在如此风云变幻的世界环境之中，要在近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继续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执政能力的考验和挑战是极为严峻的。

2.执政党所处的国内环境和任务决定了必须提高执政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执政党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但也应该看到，我们要走的路很长，任务十分艰巨。我国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社会经济生活中一些深层次矛盾正在进一步显露出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收入分配方式等都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国内外条件下，我们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

大历史任务,必须大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这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只有不断解决好这一课题,才能保证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3.执政党自身状况决定必须提高执政能力

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此高度重视,领导全党紧紧围绕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着重从思想和作风、体制和机制、方式和方法、素质和本领等方面加强和改进,有力地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十六大以来,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按照提高科学判断形势、驾驭市场经济、应对复杂局面、依法执政、总揽全局的能力要求,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实践。执政55年来,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各种风险和挑战,把四分五裂、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正在蓬勃发展的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党在实践中锻炼得更加成熟、更加坚强,党的执政能力同党肩负的重任和使命总体上是适应的。但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还不完善;一些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依法执政能力不强、解决复杂矛盾本领不大,素质和能力同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还不适应,据有关部门最近完成的一项问卷调查

显示，在受访的县级以上干部中，66.9%的表示自己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不强，58.1%的表示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比较弱，表示应对复杂局面、依法执政、总揽全局能力不强的，分别占35.7%、43.4%和19.9%[①]；一些党员干部事业心和责任感不强、思想作风不端正、工作作风不扎实、脱离群众等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党的基层组织软弱涣散，一些党员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还比较严重。"这些问题影响党的执政成效，必须引起全党高度重视，切实加以解决。"[②]

形势逼人，不进则退。国情、世情、党情，问题、矛盾、挑战，需要我们进一步提高、增强党员、干部的素质和本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党的执政安全，正非常现实、非常紧迫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进一步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是时代的呼声、人民的要求。

(二)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相关因素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首先要深刻理解和正确处理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相关的一些因素。

1.执政党执政能力的内涵

何谓党的执政能力？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给了明确的定义："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

---

① 《抓好党建的"重中之重"》，《新华日报》，2004年9月17日。

②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日报》，2004年9月27日。

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①]这清晰地界定了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所包括的主要方面：第一，科学分析形势和任务，制定并落实正确的执政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的能力；第二，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能力；第三，动员和组织人民运用国家机器、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进步的能力；第四，整合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的能力；第五，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第六，正确处理国际关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的能力。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涉及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执政环境等诸多方面。

2. 执政党执政的主要经验

善于总结经验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邓小平强调：“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②]我们党在半个多世纪的执政实践中，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两大问题，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成功的执政经验。这是我们党继续长期执政无比宝贵的财富。我们要坚持十六大提出的基本经验，认真总结和汲取党执政的历史经验，以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

①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日报》，2004 年 9 月 27 日。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3 页。

第一，必须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立足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着眼于对重大问题的理论思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不断开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第二，必须坚持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增强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又要通过改革开放不断促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适应，促进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相协调，促进弘扬中华文明和借鉴国外文明相结合，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

第三，必须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不断开拓发展思路、丰富发展内涵，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第四，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党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牢；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好。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宗旨，牢记“两个务必”，坚决惩治腐败，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第五，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要结合中国实际不断探索和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要坚持依法治国，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

第六，必须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坚持党的团结统一，是党和人民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要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适应时代发展和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以提高执政能力为重点，持之以恒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使党的各方面建设成效最终都体现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完成党的执政使命上来。[①]

这些主要经验，突出了把握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完善执政方略、改进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完成执政使命等重大问题，是党执政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日报》，2004年9月27日。

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必须在实践中长期坚持并继续丰富和完善。

3.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以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关键，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重点，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为基础，努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这一指导思想，是我们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实践的理论概括，体现了继承性和时代性的要求。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全党共同努力，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归根到底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这一总体目标是从我们党为谁执政的角度，从我们党怎样执政、靠什么执政的角度，从我们党要始终保持先进性、坚定性、纯洁性的角度所作出的精辟概括，指明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奋斗方向。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

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这五个方面的能力建设，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以及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是对党的总体执政能力提出的要求。全党要紧紧围绕上述任务，立足现实、着眼长远，抓住重点、整体推进，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建新机制、增长新本领，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使党的执政方略更加完善、执政体制更加健全、执政方式更加科学、执政基础更加巩固。[①]

（三）加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既包含执政主体的能力，也包括执政党完成自己所担负的历史责任的能力。

1. 加强执政主体的执政能力

执政党的主体，既包含各级党组织，又涉及党员、干部以及党的整体。

第一，加强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是党的执政活动的具体承担者和体现者，他们的执政能力，是党的执政能力的直接反映。党的十六大报告突出强调了新形势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提出的新要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专门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日报》，2004年9月27日。

进行了研究和部署。

一是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科学正确地判断形势，是一个执政党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础，也是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首要任务。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密切注视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变化，在纷繁复杂中把握世界发展的大局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坚定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观察世界，分析形势，确立科学的政策和策略。

二是不断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执政党只有不断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才能更好地适应新形势，把握客观规律，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加快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与其他经历了数百年市场经济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特点、发展规律及趋势的认识还不成熟，对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还缺乏经验，需要在探索和实践中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为此要认真学习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全面认识市场经济的特点，努力掌握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坚持按客观规律和科学规律办事。及时研究解决改革和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善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三是不断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执政党只有不断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才能经受起来自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以及自然界的挑战和考验，化解前进中的矛盾和

困难。当代世界纷繁复杂,国内利益主体多元化,中国执政党面临越来越复杂的执政环境,这就要求党必须不断提高应对复杂局面和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坚持"冷静观察、沉着应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科学分析各种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特点和发展趋势,提高协调和处理各种矛盾的能力和水平,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努力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和萌芽状态。要善于协调不同利益关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保持党的高度团结和统一,不断提高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四是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

执政党只有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才能更好地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依法治国是中国执政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意,依法治国必然要求依法执政。中国执政党必须尽快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必须增强法制观念,善于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做到三位一体,协调发展,整体推进。

五是不断提高总揽全局的能力。执政党总揽全局的能力,不仅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前进方向,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系统的正常运作。党只有不断提高总揽全局的能力,才能做到抓方向,议大事,管全局,牢牢把握正确的前进方向和工作主动权。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必须立足全党全国工作大局,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善于结合实际创

造性地开展工作；各级党组织应本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规范党同人大、政府、政协和人民团体的关系，支持各方独立负责、步调一致地开展工作。

第二，增强全体党员的能力和素质。广大党员尽管不直接掌管国家权力，但是他们同样是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员是党的细胞，无数个细胞组成党的整体。细胞是肌体成长和发展的基础。人民群众评判党的执政能力的大小，不光要看党的执政者运用权力为人民做事的本领如何，而且要看身边党员的本领如何。广大党员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就代表着党的形象。党员的能力强，所起的示范作用就大，反之则有损党的形象。为此，要努力提高广大党员的各种能力，使他们认真履行党员义务，充分发挥他们的先锋模范作用，提高他们的执政意识，通过他们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各项实际工作中去，团结和带领群众完成党的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充分展示作为执政党党员的丰采。

2.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①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主要任务。“要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②

①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02年11月9日。

②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15页。

这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举措。

第一,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客观必然性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在新的形势下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与完成党的领导任务、实现党的执政意图的需要不相适应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知识经济时代的初见端倪,以及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加紧“西化”、“分化”的现实,必须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以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党的十四大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如果我们不顾经济体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简单沿用过去的方式方法来管理社会经济活动,或不顾本国实际,生硬地照搬外国的模式或方法,都是行不通的。从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现实情况来看,随着党的执政环境的根本性变化,我党以往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弊端越来越彻底地暴露出来。如果不顾客观环境的变化,继续沿用老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不但不能加强党的领导,而且会削弱、损害党的领导,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党和国家机关中大量存在的政治腐败、力量内耗、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无不与之紧密相

关。这就要求党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改革和完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调整和改革自身组织体系和活动内容，改变过去对国家事务包揽过多、直接管理的执政方法，注重政府作用和职能的发挥，加快政企分开的步伐，建立和完善党与政府、企业、社会中介组织之间的新型关系，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作用的发挥。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特别是我国加入 WTO 后提出的要求。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势不可挡，我国已经加入 WTO 的状况下，我们必须执行 WTO 中那些浸透着市场经济的带有强制性的协议和条款，以及符合全球范围内的公平竞争原则的法令和制度。这些将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中国的各行各业带来重大而深刻的影响，但最大的冲击则是对政府运作方式和党的执政方式的冲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调整党对政府、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方式，准确定位党的执政地位与政府机关行政职能的关系，改进和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方式方法，不断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有效地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同时，在经贸活动中要履行我国加入 WTO 后的各种承诺，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知识经济的崛起，创新浪潮的汹涌，必然对世界和我国现代化进程产生影响，对我国科技和经济发展产生影响。1998 年，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知识经济已见端倪。"2000 年 6 月，他又在为美国《科学》杂志撰写的社论中进一步指出："知识经济的发展

正在给人们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知识和技术创新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大时空、多样化、快速度、高效率的特点，必然要求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与之相适应。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客观要求。江泽民同志指出，要"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我们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必须把坚持党的领导同发扬人民民主、严格依法办事、尊重客观规律有机地统一起来，善于把党和人民的意志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要求党执政的各种行为都要依法守据，符合程序，处理好党内党外、遵守法律与执行党章的关系，使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为此，我们必须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防范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图谋的客观要求。尽管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威胁依然存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紧实施'西化'、'分化'我国的战略图谋，千方百计地企图用它们的那一套政治观点、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影响我们"[2]的图谋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保持高度的警惕。

---

①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0 页。

②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63 页。

我们党要在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中、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注意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持党的先进性，挫败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

总之，面对国内外的复杂形势和严峻挑战，我们“采取正确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带领人民紧跟时代潮流、不断开拓前进的执政党，必须具备的能力”①。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使党更好地发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国家生活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必须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第二，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江泽民指出：“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党的领导要通过执政来体现。我们必须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②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决不能削弱党的领导，更不能放弃党的领导；同时又必须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从而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一是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是新形势下党委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新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形成工作合力的体制保证。党委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要求去做，既能保证党委在同级各种组织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也有利于各个方面积极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84—485 页。
②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 页。

履行各自的职能，形成相互协调、相互支持的工作格局。同时，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党委集中精力抓方向、方针和大事、大局，既有利于促进班子成员增强集体领导意识和全局意识，又能为发挥领导班子每个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条件，保证党委集体领导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

总揽全局就是要立足于全党工作的大局，集中主要精力抓住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坚持党对国家大政方针和全局工作的政治领导，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对重大问题作出决策；坚持依法治国方略，将党的主张经过国家权力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坚持党对军队和其他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的绝对领导，依照宪法和法律，在人民民主的基础上，由国家机构来行使专政的职能，开展对敌斗争；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并对他们进行监督；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开展党的宣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通过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机制，加强对人大、政府、政协、人民团体的领导，保证和监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中得到贯彻执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协调各方就是从整体推进全局工作的要求出发，统筹协调好人大、政府、政协几套班子之间的关系，统筹安排好组织、宣传、纪检、统战、政法等方面的工作，使各方都能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党委对人大、政府、政协的领导通过党组来实现，人大、政府、政协党组对党委负责，凡应提请党委讨论的事项，分别以党组的名义上报党委；在人大、政府、政协工作的党员干部是党委派去工作的，他们首先是党

员，然后才是人大、政府、政协的领导。在依法进行职责范围的工作中，必须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委的决定，必须增强受党委派行使执政权力的意识，把尽党员之责与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府官员和政协委员之责有机地结合起来，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坚决贯彻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工作部署。

二是增强探求"执政规律"意识，正确处理党政之间的关系，改进和完善执政机制。改进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必须增强"执政规律"意识。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条件下，改进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要求我们必须增强探求"执政规律"意识。我们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的规律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需要全党同志在实践中继续探索。面对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一些领导同志感到"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这正是对新时期执政规律知之不多、不深、陷入盲目性的反映。我们只有不断深化对执政规律的认识，才能自觉地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理顺党政之间的关系，形成党委全面领导、党政职能分开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执政机制。党执政是通过党选派自己的党员按照法定程序进入国家权力系统、掌握政权来实施的。党同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党是由先进分子组成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人民代表大会是由全体选民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组成的最高权力机关。人民政府是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行政执行机关。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组织。因此，不能把党委同人大、政府、政协这些组织之间的关

系简单地理解为组织上的隶属关系。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的统一，是通过发挥政治影响、推荐重要干部、管好权力机构中的党组和党员，提出有关国家重大事务的主张并使之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来实现的。因此，在执政过程中，党政各自有自己的职能，不能随意混淆或合一。为了理顺关系，规范职能，需要进一步制定出比较具体的，操作性较强的制度。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继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

三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1]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全局性作用。""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是新形势新任务对我们党领导人民更好地治国理政提出的基本要求，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3]要始终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提高全社会法制化管

①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

②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02年11月9日。

③ 《始终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 提高全社会法制化管理水平》，《人民日报》，2004年4月28日。

理水平。

实行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是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要环节。进入新时期，党中央反复强调要通过加强和完善法制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实行"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①]。"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成为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②]

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要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抓住制度建设这个重要环节，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不断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法律化、制度化。要大力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特别是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市场主体和中介组织法律制度、产权法律制度、市场交易法律制度、信用法律制度，以及有关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法律制度，加快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在立法工作中体现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要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强化司法监督，维护司法公正，提高执

---

①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0—31 页。

②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02 年 11 月 9 日。

法水平,确保法律的严格实施,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要进一步加强各项监督制度建设,把党内监督、专门机关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紧密结合起来,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切实增强法制观念,带头学法守法,在全党全社会营造依法执政、依法治国、依法办事的良好氛围。要进一步加大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制宣传教育的力度,提高全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宪法意识和法制观念。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能力,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越是工作重要,越是事情紧急,越是矛盾突出,越要坚持依法办事。要善于运用法律手段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权益。要加强学习和研究,不断解决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努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回答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提出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更好地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

四是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团结,善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新形势下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根本的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充分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①]。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也是我们党根本的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建设有中国

①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8 页。

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领导就是服务。领导干部必须牢固坚持领导就是服务的观点，同时必须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没有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不可能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也难以为人民谋利益。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结合的。立场观点的问题要解决好，工作水平和能力的问题也要解决好。”①胡锦涛明确指出：“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②过去形成的行之有效的办法、手段要坚持，并结合新的实际加以发展、丰富。像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等，既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是我们党的重要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坚持，同时要在实践中不断探求新的办法和手段。努力提高驾驭市场的能力，提高运用民主法制办法开展工作的能力，提高按照科学规律办事的能力，努力掌握科学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扩大党内民主，切实扩大党员对于党内事务的参与，健全党内党外相联系的监督机制。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进一步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和工作机制。要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切实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拓宽党内民主渠道，加强党员对党内事务的了解和参与。要按照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86 页。

② 胡锦涛：《在邓小平同志诞辰 10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 年 8 月 23 日。

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发挥好党的全委会的作用，健全党委常委会的决策程序，使党委的重大决策都依照党内民主的程序作出，能代表全体党员的意愿，都真正是党组织的共同意志。坚持党要管党的原则和从严治党的方针，各级党组织必须对党员干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解决克服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彻底查处、严惩不贷。”[①]建立健全监督体系，包括党内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等，加强对国家政权机关中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特别是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

重视和加强学习，提高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我们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只有大力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中驾驭全局，掌握主动权；才能更好地坚持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避免犯“左”的或右的错误，才能不断地总结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把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胜利地推向前进。为此，需要党员领导干部加强学习，提高理论素养。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学习经济知识和经济工作实践经验；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以及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

①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02 年 11 月 9 日。

特别是近代史和现代史。

加强团结，创造性地做好工作。“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①]加强团结，善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这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必然要求。“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一个重要原因是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进取，善于开拓，敢于创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使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和富强起来，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这是我们党必须勇敢担负起来的历史任务。完成这个任务，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紧紧依靠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与时俱进，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同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过程，既是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实践过程，也是不断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深入把握执政规律的过程。”[③]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等主要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与我们党执政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总结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的基础上，开展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不断完善我们党的执政理论

①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02年11月9日。

②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02年11月9日。

③ 《认真总结执政能力建设经验 大力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人民日报》,2004年7月1日。

体系。要组织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进行系统研究，不断取得新认识、新成果，不断认识和把握执政规律，努力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立在对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和自觉运用的基础之上。

加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执政党加强和巩固执政地位义不容辞的职责。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坚持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切实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决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坚强领导集体；建立健全科学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机制，不断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提高党的执政效率，增强党的执政基础，加强党的现代化建设。

四、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执政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党不仅不能削弱，而是应该更加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中国执政党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和目标，就是要努力在全党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一）执政党民主集中制建设的重要性

1.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制度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执政党先进性的重要体现，是党的根本制度。回眸峥嵘岁月，中国执政党建设的实践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民主集中制是维系党的生命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什么时候坚持了这个原则，什么时候党就坚强团结，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坚持民主集中制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保证。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①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就是党员和党组织的意愿、主张的充分表达和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集中，就是全党意志、智慧的凝聚和行动的一致。党内民主是党内集中的前提和基础，党内集中是党内民主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二者相辅相成、内在统一。没有民主，就没有正确的集中；没有集中，就不能形成全党意志的统一。正如邓小平所说："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②中国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上所展现的勃勃生机是与其模范地执行民主集中制所分不开的。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苏东执政党执政地位丧失，江山易帜，是与其践踏民主集中制原则，没有认真地执行民主集中制所紧密相联的。因此，"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党内生活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是实现决

①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1—52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03 页。

策科学化、民主化必不可少的制度保证。”①这种高度民主和高度集中辩证统一的制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党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上的体现，也是党的群众路线在组织建设上的创造性运用。

民主集中制根据党的性质和历史使命的要求，对党内生活的基本准则予以规范，是党赖以建立和发展的最基本的制度保证。因此，它是中国执政党的根本制度。试想中国执政党作为一个有着 80 多年历史和 50 多年执政实践的政党，靠什么始终保持蓬勃生机？作为一个拥有 6800 多万党员的大党，靠什么组织和凝聚起来并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靠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坚持民主集中制，就能使党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就能充分调动全党的积极性；就能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制度，制约和规定着党的其他一系列制度。诸如：它规范了党内权力的形成机制和权力结构原则；它规范了党员的行为；它规范了党内生活；它规范了党的领导工作，等等。民主集中制实现了党内民主和集中的有机统一，从根本上奠定了党自身建设和党的领导工作不断兴旺发达的制度基础，使党不断地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并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核心。

2.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中国执政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组织者，能否坚持民主集中制，决定着党的事业的成败。这是因为：

---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2 页。

第一,民主集中制是科学合理有效率的制度。它"有利于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有利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执行,发生失误也能得到有效的纠正"[1]。其科学合理主要体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群众路线在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中的创造性运用和体现,明确规范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具有科学性。它有利于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有利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执行,即使发生失误也能得到及时有效的纠正;它摒弃了过去一切集中的弊端,成为最能发挥全党积极性、提高党的战斗力、避免各种错误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的有效性,是指用它来决策、办事,有比较高的工作效率。民主集中制要求在重大问题上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根据多数人的利益、意志决定问题,有机地兼顾了民主和集中两个方面,发挥民主和集中两方面的优势,既合理,又便捷。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既可克服个人或少数人决定重大问题的独裁现象,又可避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极端民主化现象。只要真正坚持民主集中制,就能正确处理党内各种关系和矛盾,保持党内生活正常化,充分调动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就能保证党的决策正确和执行有效,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第二,民主集中制是党确立和贯彻正确路线的根本保证。"什么时候正确地贯彻了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党的路

---

①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中),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959—960 页。

线和政策就较少出现偏差，即使出现了也易于纠正。”[1]党的历史上历次重要会议的成功召开，都是正确地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结果。从1935年的遵义会议、1942年前后的延安整风、1945年党的七大、1956年党的八大、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此后的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是成功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典范。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持和贯彻，也是与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密切相关的。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才能形成和依靠集体的力量，众志成城，排除各种干扰，从而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正确贯彻执行。

第三，民主集中制是增强党的生机和活力的有力武器。执政党的生机和活力是保持党的战斗力的关键，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因素。保持党的生机和活力，就必须坚持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做到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既可以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又可以形成党的团结统一，从而保证党的生机和活力。“党是一个战斗的组织，没有集中统一的指挥，是不可能取得任何战斗胜利的，一切发展党内民主的措施都不是为了削弱党的必需的集中，而是为了给它以强大的生气勃勃的基础。”[2]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增强党的团结和战斗力，是每个党员和党组织在任何历史条件下所必须坚持的原则。

3. 民主集中制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

---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3—234页。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中国执政党必须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重要方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了利益机制和利益格局的深刻变革，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在根本利益一致的情况下，产生了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之间的利益差异。有的人从狭隘的利己原则出发，不能正确地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不能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统一结合起来。更有甚者，有的人、有的地方只顾自己的利益，对中央的方针、政策、措施，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法，不惜损害整体利益。针对这种情况，正确处理和协调中央、地方、部门、单位、个人的矛盾和利益，就必须既要有体现全局利益统一性的集中，也要有统一指挥下兼顾局部利益的灵活性。各级党委、政府和部门只要坚决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就能更好地协调、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既能保证整体和全局利益，又能保护各个方面和个人的合法利益，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充分发挥。

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求有完备的法律制度与其相配套，予以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加强宏观调控，保障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公民的合法权益。就是说，必须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来保驾护航。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民主集中制建设。通过加强民主集中制来保证决策的

民主化和科学化，通过加强民主集中制建立并完善各项法律法规，通过加强民主集中制来加强搞好党风和廉政建设，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快速、健康有序的发展。

那种认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可以不要民主集中制，或者认为坚持民主集中制就是回到计划经济老路上去的思想都是不对的。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组织原则和制度，并非计划经济体制的专利，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每一个市场主体在平等、自主的前提下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这与民主集中制的民主的要求是一致的。同时，市场经济又是法制经济，每一个市场主体都必须遵守规范，按法制确定的轨道运行，不允许各行其是。这与民主集中制的集中的精神是一致的。因此，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大力加强民主集中制的建设。正如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所指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全党全国人民的主动性和创造力；需要统筹规划、协调配套、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认识和运用客观规律；需要以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这一切都离不开党和国家按照民主集中制实行的正确领导。"

(二)发展党内民主，增强党的活力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①]这一铿锵有力的论断，充分地展示了中国执政党对党内民主的重视。党内民主是党的活力

①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2 页。

的源泉。发展党内民主不仅是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基础环节，而且有利于充分发挥全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党充满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推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更好地向前发展。

党内民主相对于集中而言，是全体党员依照党章在党内共同行使权力。没有充分的民主，就不可能形成正确的集中。缺乏党内民主不仅损害党内关系，而且压抑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对党的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的加强影响是巨大的。因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①。中国执政党担负着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它客观上要求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而广大党员及各级党组织党的活动的正常开展，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雄心壮志，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开拓进取精神和创造性工作，敢于承担责任的科学态度，对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的批评监督等都有赖于党内民主的充分发展。同时，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还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因此，只有充分发展党内民主，才能充分调动党内各方面的积极性，才能实行有效的正确集中，才能实现党坚强而统一的领导。

党内民主，历来是党的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819 页。

性，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保证。”[①]从一大到十六大，在党成长壮大的历史足迹中，每一步都与党内民主状况息息相关。正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有了一整套发扬党内民主的方法、形式、制度，才使其焕发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实践证明，党内民主建设的状况与党组织的发展、党的事业的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什么时候党内民主生活好，民主集中制执行得好，党组织就充满生机和活力，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什么时候党内民主发扬不够，个人专断严重，党组织就缺乏生气，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和损失。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线，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全局，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

健全党内民主制度，“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②]。疏通和拓宽党内民主渠道，充分发挥全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逐步实现党内生活的民主化，搞好党的建设。

第一，遵守党章，保障党员的各项民主权利。党章明确规定了党员的八项权利，包括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监督权等，涉及民主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方面。在党员的民主权利面前，所有的党员无论职务高低一律平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侵犯。特别是随着改革的

①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7－18 页。

②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2 页。

深化、开放的扩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党内思想更加活跃，党员的民主意识进一步增强，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的愿望也日益迫切。这是推动党内民主建设，增强党的战斗力的积极因素，应当得到尊重和保护。要不断强化党员的民主意识，疏通和拓宽党内民主渠道，使党员的意见、建议、批评能够及时准确地反映上来。在党内生活中发扬讲真话不讲假话、言行一致的优良作风，支持和保护党员依据党章规定的权利发表意见。对侵犯党员权利，压制党员批评，进行打击报复或诬告陷害的人和事，要认真查处。

第二，疏通和拓宽党内民主渠道，使党员对党内事务有更多的了解和参与。这是发展党内民主，保证党员民主权利的重要内容，也是调动和发挥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保证党的活力的必要条件。党组织如果不向党员通报有关情况，不同他们商量有关问题，党员就不可能有效地参与管理党内事务，也不可能对各级领导进行有效的监督，更不利于党员自觉执行党的决定。因此，在党内民主建设中，要“使党员对党内事务有更多的了解和参与，加强对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党组织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都应力求组织广大党员讨论，充分听取意见”[①]。要“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和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②]。做到重要事情、重要文件党内先传达，需要做出决策的重大问题党员

①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8 页。

②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2 页。

先讨论,重大决策的实施党内先发动。同时,要创造有利于党员发挥积极性、创造性的环境和条件,使上级党组织同党员和下级党组织形成融洽的关系。基层党组织要积极全面地了解和反映党员的意见和要求,保护好党员的民主权利。建立切实有效的党内反馈机制,保证基层党员和下级党组织的意见、建议及时、正确地反映到上级党组织中,上级党组织的答复和处理情况能及时告知党员和下级党组织,真正做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精诚团结,集思广益,搞好工作。

第三,各级领导干部带头推进党内民主。在党内民主建设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健全党内民主的领路人,在工作中,要善于听取、尊重同级党委成员的意见,善于听取下级组织、基层党员的意见,特别是要容忍、理解和自己意见不同的意见,养成对多数人不赞成的东西主动放弃、不固执己见的习惯,养成重大问题以表决方式进行决策的习惯,做到兼听则明。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决策机制,发挥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用。同时,领导决策要以基层群众的实践经验为基础,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正确的集中,做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真正在党内民主建设中起模范带头作用。

(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

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各级党组织、每个党员都要按照党章的规定,顾大局,讲原则,一切行动服从上级组织的决定,特别是要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必须立足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从事关人民和国家根本利益、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工作全局出发,坚定不移地

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维护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要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原则。‘四个服从’最重要的是全党服从中央”①。为此，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必须用党性和铁的纪律保证中央的政令畅通无阻，保证中央的决议和决定层层落实，决不能擅自行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和搞地方、部门保护主义。

维护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关键在于维护中央权威。只有维护中央权威，保持政令畅通，才能保证党的团结统一和执政地位；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才能在改革中妥善处理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以及地方与中央间的利益关系；才能有效地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才能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才能顺利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维护中央权威，必须做到在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上，全党必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顾全大局，正确处理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

维护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要严肃党的纪律，搞好党内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

①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0 页。

在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尤其需要全党同志在基本路线的基础上加强团结。”[①]增强党内团结必须讲原则。要分清是非，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搞好团结。增强党内团结必须加强党内民主监督，严肃党的纪律。这既是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内容，又是保证民主集中制贯彻执行的重要措施。为了“保证党的各级干部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必须加强党内监督”[②]，严肃党的纪律。加强党内监督要做到：一要监督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是否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二要监督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是否正确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三要监督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是否严格地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重点要做好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工作。切实做到“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各行其是”[③]。确保民主集中制得到正确的贯彻执行。

搞好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还要注意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实现决策民主化，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健全和完善党委工作制度，“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健全党的领导体制。加强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制度建设。

---

①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4 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4 页。

③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2 页。

五、执政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方面。“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应该成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① 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切实做好基层党建工作，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②。大力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对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将起到重要的基础作用。

(一)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1.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直接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纽带，是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基层的桥梁。基层组织建设如何，直接关系到党的形象，关系到党的声誉，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是否牢固这样的重大问题。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基层组织建设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党的建设，必须高度重视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党的基层组织，是我们党领导和执政的重要基础，是党的全部工作的重要基础，也是

①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3 页。

②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3 页。

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基础。如果基层组织软弱涣散，没有战斗力和凝聚力，那是十分危险的。”[①]“没有广大基层党组织战斗力的发挥，最后，我看我们全党的战斗力就是空的。力量的源泉来自哪里？来自基层。”[②]

第一，党的基层组织是我们党领导和执政的重要基础。党的领导作用和执政地位，是通过党中央、党的地方组织和党的基层组织自上而下、充分行使各自的职责实现的。党的领导是思想、政治、组织的领导。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党的意志和主张的具体体现，是全党的行动纲领和准则。要实现党的领导，就要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且要使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制定出来以后，能够得到切实有效的落实。为此，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党的基层组织去宣传、动员、教育、组织和团结党员和群众共同奋斗，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转化为广大党员和群众的自觉行动。

第二，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完成各项任务的可靠保证。党的基层组织是党设立在生产和工作第一线，诸如工厂、农村、商店、学校、街道、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社会基层单位的组织，分布于全国各个地方和各个行业，同人民群众有着最直接、最广泛的联系。尽管这些社会基层单位的工作性质、任务和领导体制，党的基层组织的具体职能、工作方法也不完全一样，但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主动地做好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织、推动和实践工作，促进本单位生产

①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40页。
②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83页。

或工作任务的完成，协调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化解矛盾，增进团结，维护群众的利益等，则是党的基层组织共同的任务。

第三，党的基层组织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中国执政党同人民群众结成了亲密无间的鱼水关系。与人民群众同心同德，保持血肉联系，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党的基层组织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是人民群众认识、了解党的窗口，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了解人民群众愿望和要求的主要渠道。人民群众往往从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和周围党员的表现来评价党，党的基层组织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威信，关系着党能否赢得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只有把基层组织建设好，党才能确保战胜任何艰难险阻。

2. 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要围绕党的基本路线，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用改革的精神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改进工作方法、工作作风和活动方式；认真做好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增强解决自身矛盾的能力”[1]。“特别要把‘三个代表’的要求贯彻落实到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各项工作中去。”[2]“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拓宽领域、强化功能，扩大党的工作的覆盖面，不断提高党的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65 页。

②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02 页。

斗力。"①

第一，围绕党的基本路线，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党的政治路线是党的行动纲领，是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是全党团结统一的政治基础。党的建设必须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一个基本原理，也是我们党的建设的一条成功经验。新时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要坚持围绕党的基本路线来进行，自觉地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从和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这个大局。新时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必须紧密围绕党的基本路线，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经济建设服务。

第二，用改革的精神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改进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和活动方式。不断加强和巩固基层党组织建设，这并不是固守旧有的模式和内容，而是适应形势和任务的要求，加以改革，就是要用改革的精神加强和巩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党长期形成的建设基层组织的行之有效的好传统、好经验、好做法必须坚持，同时又必须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新问题，坚持在实践中加强，在加强中不断探索新形式、新途径、新方法，以保证党更好地带领广大人民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党的基层组织面临新的环境、新的任务、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广大党

①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员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他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但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也在日益广泛地侵蚀着一些党员的思想；有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甚至处于瘫痪状态。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一刻也不能放松。党的基层组织不能总是固守旧的模式、旧的观念、旧的工作方法，不能以不变应万变。而要审时度势，把继承优良传统和改革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实际出发调整基层党组织的设置，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逐步形成适应新形势要求的工作机制。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要根据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新经验，探求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工作方法和活动方式，使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在改进中加强，在转变中适应，在发展中提高。

第三，加强基层领导班子建设，提高党员干部素质。坚强而有力的领导班子，是贯彻落实党的各项工作的落脚点，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关键。要全面贯彻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原则，高标准、严要求，选准配强党的基层组织领导班子。加强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的思想作风建设。建立班子成员学习制度，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坚持党的民主生活会制度，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消除隔阂，纠正错误，增进团结。加强班子成员之间的监督，拓宽群众监督的渠道，使领导班子的每个成员都能自觉接受党内外群众的监督。把基层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团结坚强的领导集体。

党员干部是党的基层组织的细胞，党员干部的素质直接决定了党的基层组织战斗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党的基层组织的状况，关系到党的领导作用的发挥，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根本保证。在新的历史时期，提高党员干部素质，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素质。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自觉性，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二是增强宗旨意识。认真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学会在各项工作中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三是提高业务水平。加强理论学习，努力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法律知识、文化科技知识，开阔视野，提高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领。此外，还要认真做好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工作，贯彻从严治党的原则，增强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

第四，分类指导，拓宽领域，强化功能，扩大党的工作的覆盖面。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进行分类指导，是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在党的建设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和实际运用。"要深入基层，摸清情况，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关键要建立和健全保证基层组织健康发展的制度和机制。"[1]要拓宽领域，强化功能，扩大党的工作的覆盖面，不断提高党的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76 页。

加强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配套建设，积极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建立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增强农村基层组织解决自身矛盾的能力，积极探索让干部经常受教育、使农民长期得实惠的有效途径，大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搞好扶贫开发，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力，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密切干群关系，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和谐发展。国有企业党的建设，要从组织结构改革入手，用组织手段保证党委政治核心的作用，结合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推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办法，进一步完善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国有企业领导体制，从组织上和制度上规范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的途径和方法，保证企业党组织在改革和发展中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搞好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特别是在企业实施改造重组、关闭破产和分流富余人员过程中，企业党组织要做好职工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引导职工群众促进改革和维护稳定中发挥积极作用。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加大组建党组织的力度，已有的企业党组织要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引导和监督企业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领导工会和共青团等群众组织，团结凝聚职工群众，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健康发展。高度重视社区党的建设，以服务群众为重点，为群众排忧解难，创造使群众安居乐业的良好环境，不断探索、完善社区党建工作的协调机制，充分发挥社区内其他基层党组织和在职党员的作用，构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新格局。

加大在社会团体和社会中介组织中建立党组织的工作力度。全面做好机关党建工作和学校、科研院所、文化团体等事业单位的党建工作。

(二)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执政党执政的前提是有巩固的执政基础,取得执政的合法性。党的执政基础是实现党的领导、党的执政地位、党的目标和任务等的重要基础。中国执政党要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有坚实的阶级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为此,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1. 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是党的建设的重要问题

执政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是执政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依托。党的阶级基础和党的群众基础相辅相成,二者缺一不可。不坚持阶级基础,无以立党;没有牢固的群众基础,党就不会形成强大的凝聚力。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其联系表现为:一方面,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是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前提,没有先进的、强大的阶级基础,扩大群众基础就会落空;另一方面,党的群众基础扩大了,就会更加巩固党的阶级基础,突出党的先进性,还会进一步充实党的阶级基础。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党的阶级基础和党的群众基础还具有明显的区别:党的阶级基础表明党和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系,它是判断党的先进性的主要标志之一。中国执政党的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就要使工人阶级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发展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提高工人阶级的整体素质。党的群众基础

表明党与广大群众之间的联系，它是判断党的群众性的主要标志之一。党的先进性离不开党的群众性。群众基础是党发挥作用的前提，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党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纲领路线方针政策。

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从根本上说，是中国执政党为了适应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不断巩固执政地位的需要。具体而言，它是确保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战斗力和增强党的吸引力、凝聚力以及扩大党的社会影响力的客观需要。

第一，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是新时期中国执政党面临的重大政治课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①]面对这种情况，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就成为客观现实给中国执政党提出的势在必行而又势在可行的重大政治课题。一方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构成的新变化，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由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发生的，是人民这个历史范畴的具体拓展和延伸，不是一种阶级分化，它没有也不可能引起根本的利害冲突。另一方面，社会阶层构成的新变化给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带来了多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13 页。

样性，各种利益需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对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全局上整合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把全民族全社会的力量都凝聚在党的旗帜下，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第二，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是中国执政党长期执政并不断巩固其执政地位的客观要求。新时期党的阶级基础和党的群众基础发生了变化，正确处理好这些变化，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这些变化，对中国执政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执政党不仅要从人心向背上解决好如何"得人心"的问题，而且要根据社会阶层构成的变化不断解决好"多得人心"的问题。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包括某些执政的共产党丧失政权的社会历史原因，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没有正确把握自己与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关系，致使最后失去了原有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或是在社会阶层发生重大变化时没有及时调整政策来增强阶级基础和扩大群众基础。吸收、借鉴这些经验教训，中国执政党要注意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保证党长期处于并不断巩固其执政地位。

第三，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是中国执政党确保先进性和提高战斗力的需要。中国执政党的阶级基础是中国工人阶级。党的阶级基础就其整体而言，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上，始终都是中国最先进的阶级，因此从成立之日起，它就把自己确定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工人阶级都是社会各个阶层中最先进的阶级。中国执政党始终把自己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集中地表

现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勇敢地担负起了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重任。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队伍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产生了一些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分布更加广泛。据统计，建国初期，全国有职工约809万人，2001年在岗职工人数达10972万人。[①] 同时，我国工人阶级不仅分布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集体经济中，而且分布在乡镇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中，分布的范围更加广泛。二是工人阶级队伍的素质明显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人阶级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技文化素质已经有了明显的提高。广大职工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工人阶级受教育的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知识技术构成不断优化，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明显增强，科学文化素质大大提高，改革发展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公平竞争意识、自主自立自强意识日益增强，整体文化水平有了大的提高。三是工人阶级队伍成员社会独立性日益增强。随着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普遍推行劳动聘用合同制，工人就业方式发生变化，自主择业、双向选择的就业方式逐步取代国家分配、计划就业的模式，职工和企业的关系逐步契约化，越来越多的职工开始进行自主择业，由“单位人”转为“社会人”。四是工人阶级在其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上发生变化。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前进，现在，工人阶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

级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也逐渐变得多样化了，除了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工人以外，还包括各种企、事业单位的劳动群众、国家公务员、广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一些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的劳动者，等等。不同的工作岗位其收入和待遇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还存在着下岗工人等特殊的困难群体等不同的利益群体。工人阶级出现的这些变化，有利于工人阶级整体素质的提高，体现了工人阶级时代的先进性，它没有改变我国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中国工人阶级依然是推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新变化对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提高党的战斗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执政党只有尽快适应工人阶级队伍出现的新变化，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才能确保党的先进性和提高党的战斗力。

第四，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是增强党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扩大中国执政党的社会影响力的客观需要。“伟大而艰巨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全社会各个方面忠诚于祖国和社会主义的优秀分子，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带领群众共同加以推进。”[①]党的事业是人民的事业。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之源，是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根本力量。党的群众基础是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和新的社会阶层的人员。作为中国特定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中国工人阶级始终占中国人口的少数，决定了党必须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13页。

下，尽管党的阶级基础在增加，但是这种占人口少数的状况在较长时期内是很难改变的。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解放全人类，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现阶段的目标是完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光靠少数人是不能完成的。社会主义事业既是多数人的事业，又是为多数人的事业，因此，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和参与，需要他们和工人阶级一起去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战场。中国执政党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把社会上不同的阶级、阶层、集团、群体团结凝聚在一起，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国执政党必须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群策群力地团结奋斗。这就要求不断增强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时刻注意增强党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

2. 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 56 个民族、12 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要把人民的力量凝聚起来，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迈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有中国执政党的坚强领导。要保证党的领导坚强有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使其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就必须增

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

(1)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先进性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本质体现，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核心问题。中国执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其先进性始终以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为基础。这是其最基本的规定性，必须始终坚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中国执政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自己定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始终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中国工人阶级尽管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但仍然具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的坚定性彻底性，仍然是最先进的阶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是中国工人阶级先进性的不断发展，使党的先进性得到了更大发扬；正是由于党的阶级基础的不断增强，使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中国工人阶级是最进步、最有活力的阶级，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始终是推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中国执政党必须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

第一，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纲领是工人阶级政党的本质体现。它是一个政党先进与否的根本标准。中国执政党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纲领，始终站在历史的前列，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科学地制定反映社会发展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在党的理论、路

线、纲领、方针、政策的指引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安居乐业，综合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日趋提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中国执政党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从根本上增强党的工人阶级的阶级基础。

第二，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培养教育和管理，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中国执政党是由 6800 多万党员所组成的大党。由党的阶级基础所决定的先进性，要从党员的思想、作风和行为上表现出来。因此，6800 多万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和行为的表现如何，就直接关系到了党的先进性及其工人阶级的阶级基础。只有按照“三个代表”所要求的思想、作风和行为，才能反映党的先进性及其工人阶级的阶级基础。为此，必须对党员干部加强培养教育和管理，不断提高他们的素质。中国执政党“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武装全体党员，不仅要求党员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求党员首先在思想上入党，指导他们为实现党的纲领和任务而奋斗，因此保持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①。“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要全面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建设。”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培养教育和管理，提高他们的素质，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的重要工作。

---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13 页。

②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19 页。

第三，贯彻从严治党的方针，严格遵守和执行党的纪律。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从严治党。要把从严治党贯彻到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的各个方面，加强对各级党的组织、广大党员和党的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严格遵守和执行党的纪律。“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党员都要严格按照党的章程和党内法规行事，严格遵守和执行党的纪律。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始终注意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①]通过严格遵守和执行党的纪律，树立正气，打击邪气，自觉地与各种腐败现象作坚决斗争。

第四，提高工人阶级的素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中国执政党的一贯方针，是巩固党的阶级基础的必然要求，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关键所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要高度自觉地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保持同工人阶级的血肉联系，注意提高工人阶级的素质，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集中一切智慧和力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首先，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广大职工的头脑。教育和引导广大职工“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②]。要坚持与时俱进，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其次，加强职工队伍的思想道德建设。对广大职工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艰苦奋斗、艰苦创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19页。
②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03页。

业精神的教育，使其增强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再次，提高职工队伍的科技文化素质。加强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宣传教育，提高职工队伍的科学技术水平。要教育、引导工人阶级学习和继承全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坚决抵制各种迷信、愚昧颓废、庸俗，乃至腐蚀人的精神世界、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腐朽文化。注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种思想、文化的冲突对工人阶级的影响，使其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始终高扬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始终成为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

(2)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坚实而广泛的群众基础，是执政党履行历史使命和发挥领导作用的基本保证。离开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党就会寸步难行，党的一切奋斗和理想不但不能实现，而且将会变得毫无意义。中国执政党和执政前相比有了更好的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条件，但如果不能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甚至任凭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贪污腐败等行为在党内滋长蔓延，就会增加脱离群众的危险。“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一切工作就无从谈起。”因此，中国执政党要时刻注意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第一，正确认识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首先，要正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正确分析形势、任务和国情，做出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经济中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成分。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带来了经济利益的多样化。多种所有制结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组织形式、多种分配方式的发展，形成了多种利益群体和不同的社会阶层。"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①

其次，要正确认识社会阶层所发生的新变化。社会阶层发生新变化，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逐步打破计划经济的陈旧模式，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形成了繁荣昌盛的大好局面。正是有了在经济上实行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辛勤劳动先富起来的政策，才逐渐有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逐步产生了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正是由于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13 页。

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积极引进外资，兴办三资企业，才出现了受聘于三资企业的中方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正是由于党的十五大提出要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才有了大量的社会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正是由于改革所有制结构和生产经营方式，才有了大量的民营科技企业，由此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管理人员。同时，社会阶层发生新变化，表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勃勃生机。

再次，正确认识新的社会阶层中广大人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①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践者和受益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原来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党政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复员和转业军人，以及一些留学归国人员等。从这一群体的思想政治状况看，他们大都出生在新中国，成长在红旗下，从小就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和熏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拥护党的领导，拥护党在现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支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新的社会阶层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员，其原始积累是合法的、正当的。他们以自己的诚实劳动和工作，促进了生产力的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13 页。

发展，增强了综合国力，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在帮助人们就业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他们中的有些人，既拥有生产资料，又掌握先进科学技术，有些还从事高新技术的生产和经营，非常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注重自己的社会形象。从总体上说，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较高的爱国热情，愿意为振兴中华作出自己的贡献。

总之，我们要充分肯定新的社会阶层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它是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水平的需要，是增强党的凝聚力、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的需要。

第二，正确认识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

实现人民的富裕幸福，是中国执政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根本目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个人财产也逐渐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①。这个论断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具有基本的、决定性的意义。思想政治状况，包括政治立场、理想信念、理论素养、道德情操、价值取向等。人们获取财产的方式符合我国的法律法规，财产是合法经营所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14 页。

得，劳动和工作所得，财产的支配和使用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用于回报社会，服务人民，这就是思想上进步的表现。政治上的先进分子必然以自己的努力工作和辛勤劳动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作出贡献。

第三，认真做好在新的社会阶层中发展党员工作。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按照十六大提出的要求，遵循“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方针，“加大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的工作力度，探索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作用的方法和途径。”[①]“重点做好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和干部中发展党员的工作，壮大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注意在生产、工作第一线和高知识群体、青年中发展党员。要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②]。“为完成党的历史任务提供坚强组织保证。”[③]吸收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入党，对于加强党员队伍建设，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增强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在新的社会阶层中发展党员，有利于保持和发扬党的先

①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日报》，2004年9月27日。

②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4页。

③ 《研究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发展党员工作》，《人民日报》，2004年6月30日。

进性。党的建设历来是同党的历史任务，同党为实现这些任务而确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联系在一起的。吸收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入党，有利于保持和发扬党的先进性。党员的先进性是党的先进性的具体体现。不同历史时期对党员的先进性有不同的要求，党员的先进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应当体现在认真学习实践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体现在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上，体现在自觉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上。工人阶级中每时每刻都会涌现出大量的先进分子，新的社会阶层中也会不断涌现出大量的先进分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需要全社会各个方面忠诚于祖国和社会主义的优秀分子，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带领群众共同加以推进。为此，应该把新的社会阶层中符合党员条件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吸收他们入党，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把他们中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优秀分子吸收入党，有利于保持和发扬党的先进性；有利于在新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中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利于改变党在新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工作中薄弱的状况，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有利于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利于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更好地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在新的社会阶层中发展党员，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认真稳妥地进行，不能一哄而起，降格以求。一是对新的社会阶层中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

的人员，应当欢迎、支持和鼓励。要加强对他们进行教育和引导，通过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积极宣传党的主张，不断扩大党的影响，使他们了解党的纲领、宗旨和任务，为他们在政治上积极进取创造必要的条件。对提出入党申请的人员，党组织要热情欢迎，并采取多种措施进行培养教育，组织他们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帮助他们端正入党动机。二是吸收新的社会阶层的优秀分子入党，必须坚持标准，严格程序，确保质量。党允许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入党，不是毫无原则地敞开大门，不能把那些不具备党员条件的人发展为党员，不能损害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要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这四个基本要求作为一个系统标准来把握，把考察入党动机同考察现实表现结合起来，切忌片面性。要认真贯彻"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方针，严格履行入党手续，成熟一个，发展一个。严防那些入党动机不纯的人混进党内。三是要始终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和管理，通过党这个大熔炉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教育党员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仰，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心，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党员进一步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努力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切实解决从思想上入党的问题。特别要教育私营企业主党员，要坚持党的理想和宗旨，增强党的意识和组织观念，严格履行党员义务，自觉接受党组织的监督；要模范地遵守国家政策法规、守法经营、照章纳税；要致富不忘回报社会，把税后利润主要用

于扩大再生产，热心公益事业；要平等对待工人，尊重工人的合法权益，真心诚意为职工谋利益；决不允许特殊党员的存在，以自己经济实力和社会关系干预党的工作和行政工作。四是要正确处理在新的社会阶层中发展党员与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中发展党员的关系。党发展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为自己的成员，决不意味着把这些人作为发展党员工作的重点。而是要一以贯之地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和干部中的先进分子作为发展党员的重点，切实做好在他们中发展党员的工作。

第四，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巩固和发展党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

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中国执政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性"的群众路线，是其根本工作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贡献，是党取得胜利的法宝。只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党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要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根本的是必须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切实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改善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充分调动和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①]。只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才能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性，也才能经受住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党的性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时期党的建设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58 页。

质和宗旨要求必须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党的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就要求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就必须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提高党员干部做群众利益忠实代表的自觉性；就必须相信群众，尊重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作用，就是要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坚持好党的群众路线，就会形成牢不可破的血肉相连的党群关系，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因而也就会巩固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统一战线历来是为党的总路线、总任务服务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争取人心、凝聚力量，为实现党和国家的宏伟目标而团结奋斗。"①统一战线是实现广泛团结、凝聚人心、完成新时期总任务的基本保证，是多党合作、参政议政、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效形式，是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力量，是体察民情、反映民意、密切党同群众联系的重要渠道，是安排人事、合作共事、加强国家政权建设的必要途径，是联络友谊、沟通感情、促进"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桥梁纽带，也是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方面。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执政党对统一战线的基本要求是："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54页。

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服务，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服务，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服务。”①发展统一战线，必须着眼于扩大和加强团结。只要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统一祖国和振兴中华，只要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只要有利于挫败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与和平演变，不论哪一个阶级、阶层，哪一个党派、集团，哪一个人，我们都要团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振兴中华的伟大使命而奋斗。“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一个重要法宝，决不能丢掉；作为党的一个政治优势，决不能削弱；作为党的一项长期方针，决不能动摇。”②只有做好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才能形成一种强大的群众基础。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执政党要巩固和开展好统一战线工作，确保强大的群众基础的形成，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一）做好党员的教育和管理工作

党员是组成基层党组织的基本要素。发挥党的基层组织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作用，主要是通过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来实现的。党员的素质如何，先锋模范作用发挥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力，关系到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江泽民十分重视对党员的教育和管理工作，为基层党组织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54 页。

②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54 页。

1. 明确新时期衡量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标准问题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党的活力和动力所在。明确衡量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标准，才能有针对性地做好党员的教育和管理工作。时代的发展和党的任务的变化，对党员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江泽民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应该有新的认识。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这些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基本条件是其先锋模范的基础。共产党员不仅是一个光荣称号，更重要的是要按照党员标准履行党员义务。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是一个共产党员。"[①]具备这样的素质和要求，才达到了共产党员的基本标准和基本条件。共产党员只有首先达到了这样的素质和要求才谈得上真正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在各个历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1页。

史时期的中心任务不同，对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的要求和侧重点也会有所不同。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认为“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在长期战争和艰难环境中，共产党员只有“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①。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衡量标准都比较明确，广大党员也好掌握。“现在情况不同了，处于和平建设时期，广大党员分布在各个不同的战线上，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是达到了先锋模范作用，而且这样的标准要规定得简单明确，让广大党员好掌握，这个问题虽然也有了一些提法，但还需要继续探讨。”②在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党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构想。对于长期生活、工作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广大党员来说，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党性修养，保持先进性，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是一个有待探索和实践的新课题。江泽民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问题非常重视。1992 年 10 月，他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应该有新的要求。切实加强和改进对党员的教育和管理，提高素质，增强党性，使党员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22—523 页。

②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71 页。

的基本路线，献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带领群众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实绩的先进分子。”1997 年 9 月，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对新时期合格党员的标准及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体现作出了明确的回答：“我们现在的努力是朝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前进的，忘记远大目标，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为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纲领努力奋斗，同样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要体现时代的要求，做到：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带头执行党和国家现阶段的各项政策，勇于开拓，积极进取，不怕困难，不怕挫折；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掌握做好本职工作的知识和本领，努力创造一流的成绩；在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坚决同危害人民、危害社会、危害国家的行为作斗争。”①在 2002 年 11 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上，江泽民号召“共产党员必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脚踏实地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奋斗”②。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标准问题的解决，对于进一步增强党员的党性观念、提高党的战斗力和搞好党员的教育工作，对于进一步培养党的接班人、正确有效地选拔和使用干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

①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9—50 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2 页。

2.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①]。这是根据党在新世纪新阶段所肩负的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历史使命，对党的建设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党的先进性问题，是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是广大人民群众最为关注的问题。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核心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党员队伍先进性的保持，是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保持的基础。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是党在新世纪新阶段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战略需要，也是加强党员队伍建设的紧迫任务。经过党组织多年来的教育管理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广大党员的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在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但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以及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情况下，一些党组织党不管党、治党不严，党员队伍在思想政治建设上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有些党员理想信念不坚定，甚至发生动摇，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心存疑虑；有些党员个人主义严重，忘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些党员组织纪律观念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2 页。

淡薄,不起党员作用;少数党员甚至想要退党。党员队伍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尽管原因不尽相同,但不重视学习,不与时俱进,在思想上、行动上放弃了共产党员先进性的要求是共同的原因。这些情况表明,提高党员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要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增强党性锻炼

江泽民强调:"共产党员增强党性,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新的时期,新的任务,新的环境,要求共产党员更加自觉地加强党性锻炼。"[①]有的同志认为,现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改革开放,讲党性还有什么实际意义?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党的十四大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总结十四年改革开放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决策,共产党员必须自觉地贯彻执行。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伟大创造。共产党员要用党性来保证和促进这个新体制的建立,同时要用党性来抵制市场活动中的消极因素,使这一新的经济体制服务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要坚决防止权力商品化,坚决防止把等价交换原则引入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

"党对党员的党性要求,从来是和党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7 页。

所肩负的任务紧密相连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增强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要强调自觉地刻苦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模范，做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模范，做遵守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模范，做脚踏实地、勤奋工作、忠于职守的模范，做反对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的模范。”[①]各级领导干部应该比普通党员做得更好一些，要求更严格一些，要务必带头加强党性锻炼，严于律己，防微杜渐。

加强党性修养，要崇尚高尚的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充满艰辛、充满创造的壮丽事业。伟大的事业需要并将产生崇高的精神，崇高的精神支撑和推动着伟大的事业。没有坚强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面对新世纪、新形势、新任务，特别需要在全党和全社会大力宣传和弘扬江泽民在 2001 年 1 月 10 日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所倡导的“五种精神”，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的精神，知难而进、一往无前的精神，艰苦奋斗、务求实效的精神，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不断用这些精神武装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使之成为大家的自觉追求，成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精神动力。

“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说到底是树立和坚持正确的立

---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8 页。

场、世界观的问题。”[①]我们的同志要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成为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需要经过长期的磨炼，要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在严格党内生活中，一生自觉地经受考验。全党同志都这样做，积以时日，我们党的队伍的整体素质就会有很大提高，我们的党就能更加朝气蓬勃、坚强有力，我们的各项工作就能做得更好，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就会更加兴旺发达。

第二，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2000年2月，江泽民明确提出“三个代表”要求。在全党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我国最广大人民的共同意愿，体现了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的时代精神，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强大力量，是全党全国人民在新世纪新阶段继续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把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引向深入。”[②]通过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切实使广大党员和干部在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的认识上达到新的高度，在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始终做到“三个代表”上取得新的成效，认真解决党员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使广大党员始终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② 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同心同德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全党同志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态度学习贯彻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新的实践，并努力在实践中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相结合，坚持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坚持运用理论和发展理论相结合。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组织党员认真学习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论述，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的十六大报告、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胡锦涛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以及其他相关文件和文献，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组织党员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检查自己在理想信念、宗旨意识、组织纪律、思想和工作作风等方面的现实表现，找出存在的突出问题，努力加以解决。通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贯彻，全面提高党员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锤炼高尚人生，使之能在各条战线各个行业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和带领群众为实现党的纲领而奋斗。

3. 加强党员管理

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除了需要注重党员教育工作外，还要注重加强对党员的管理。思想教育不可能解决一切问

题，必须在加强教育的同时，加强管理工作。加强党员管理，是增强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保证。江泽民指出："越是执政时间长了，越要抓紧党的自身建设，越要加强对党员和干部的管理，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放松。"①"现在我们党已经有六千多万党员，这么大的一支队伍，要管理好不容易。如果放松管理，肯定会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②

加强党员的管理，关键是要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建立和健全能够使广大党员提高素质、发挥作用的制度和机制。"从严治党，决不能成为只说在嘴上的口号，必须落实到党组织对党员和干部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的实践中去。……每个党员干部都要切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时刻想到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经常按照党章和党内的各项规定对照检查，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规范行为，严于律己。"③

对于党内存在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的原因，江泽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治党不严，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一些地方和单位的领导班子软弱涣散，思想上、政治上不强，不能正确处理发展经济与加强党的建设的关系，一手硬、一手软，党不管党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有的领导干部对出现的问题，不仅不能见微知著，而且在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还麻木不仁，甚至包

---

① 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5年3月2日。

②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75页。

③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12页。

着、护着，该教育的不教育，该批评的不批评，该查处的不查处。”[①]对于从严治党的要求，各级党组织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这就是要按照党章办事，按党的制度的规定办事；要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要在党内生活中讲党性，讲原则，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弘扬正气，反对歪风；要严格按照党章规定的标准发展党员；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坚持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②]

加强和改进对党员的管理，要改进和完善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内容和活动方式，使党员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都能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接受党组织的教育和管理。要根据客观现实，有针对性地做好党员的管理工作。当前，要特别重视和加强对离退休老党员、流动党员和下岗职工党员的管理。对于党员管理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要加强规范，分类指导，做到教育管理不留死角。搞好党内监督工作。通过监督，对党的组织和党员实施影响，规范组织的运转和党员的言行。监督，包括党员之间的互相监督；党员群众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党的组织对党员的监督；党组织之间的互相监督；党报、党刊、广播、电视等舆论监督以及全党对党的领袖的监督等。

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和管理工作，要树立各级组织齐抓共管和长期作战的思想，切实抓紧抓好。“落实从严治党的方

①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18 页。

②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18—619 页。

针，不是一时一事的要求，必须全面贯穿于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纪律和制度建设的各个方面，切实体现到对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和干部进行教育、管理、监督等各个环节中去。"①"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首先要把好入口关，严格按照'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要求做好发展党员工作。同时要抓好教育管理，对于确实不符合党员标准的，不能留在党内，这样才能形成党员队伍'吐故纳新'、保持活力的机制。切实管好六千多万党员，这是当前党的建设面临的一个突出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必须从对基层组织和每个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和组织性、纪律性的管理与教育抓起，而且要锲而不舍地抓下去。"②

六、执政党的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

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搞好廉政建设，是中国执政党建设的重大问题。"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③"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④"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65 页。

②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76 页。

③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61 页。

④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02 年 11 月 9 日。

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①]在新的历史时期，执政党的反腐倡廉工作日益成为艰巨的任务。中国执政党一向重视反腐倡廉工作，纪律检查工作有着自己优良的传统，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在坚持和发扬光大的同时，"要坚持不懈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地把反腐败斗争深入进行下去"[②]。

(一)反腐倡廉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

腐败是附着在党和国家健康肌体上的毒瘤。"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贪污腐败现象是社会稳定、发展与进步的阻碍因素。它们破坏社会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转和国家政策的实施，扰乱社会秩序和资源的合理分配，破坏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原则，侵蚀社会道德和人们的精神世界。"[③]反腐倡廉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败的问题，是关系党的执政地位及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1. 反腐倡廉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中国执政党和政府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决定了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清正廉洁，始终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息息相通。不解决好反腐倡廉的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就

---

①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日报》，2004 年 9 月 27 日。

② 胡锦涛：《在邓小平同志诞辰 10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 年 8 月 23 日。

③ 江泽民：《在第七届国际反贪污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5 年 10 月 7 日。

没有坚强的政治保证，党和政府就会严重脱离群众，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腐败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①“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②全党同志一定要从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充分认识腐败现象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充分认识反腐倡廉工作的重大意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从和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锲而不舍地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2. 反腐倡廉是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的重要保证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党全国各项工作都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开展，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能干扰这个中心。“反对腐败是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必然要求，是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的重要保证。”③开展反腐败斗争，是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腐败现象对经济建设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也是严重的。它侵蚀公有制经济的基础，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它扰乱经济秩序，造成经济混乱；它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妨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如果不坚决克服腐败现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①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02 页。
②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9 页。
③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02 页。

事业就不可能取得成功。把反腐败同经济建设对立起来、同改革开放对立起来，认为反腐败会影响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是不对的；在反腐败过程中，不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注意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也是不对的。

3. 反腐倡廉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反腐倡廉“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文明的重要方面，如果不坚决克服腐败现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不能得到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要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指导下，用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就是要在全社会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和健康的社会风气。腐败现象与此格格不入。腐败现象的表现是“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权钱交易、挥霍人民财富、腐化堕落等现象”②。这些情况毒化社会风气，危及社会主义肌体的健康，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大敌，是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要倡导的、所要弘扬和鼓励的社会风尚背道而驰的。中国执政党只有下大力气铲除这些毒瘤，才能在新的历史时期，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和健康的社会风气。因此，搞好

①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03 页。
②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05 页。

反腐倡廉工作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任务。

4.反腐倡廉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政治问题

"我们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获得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甚至腐败变质的危险。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条件下，这种危险会更大，如果放松警惕，带来的后果也会更严重。"①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党的事业向前发展的强大基础和力量源泉。革命的胜利、建设的成就、改革的成功，与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和积极参与息息相关，密切相联。党是以其清正廉洁，无私奉献，团结群众，赢得支持，从而发展壮大起来的。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些党员特别是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忘记了党的宗旨，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腐化堕落，严重破坏了党同人民群众长期保持的血肉联系，极易造成恶劣的影响。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如果不注意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不注意克服脱离群众的现象，听任腐败现象蔓延，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也会蜕变，丧失人心。经济搞不好会垮台。经济搞上去了，如果腐败现象泛滥，贪污贿赂横行，严重脱离群众，也会垮台。"②

（二）深刻认识腐败现象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

"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从本质上说，它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③腐败现象的存在具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

①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54页。

② 江泽民:《在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4年3月6日。

③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34页。

原因。

1. 封建社会残余思想的影响

“我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历史很长的国家,封建主义和其他剥削阶级影响将长期存在,总要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①]“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过励精图治的皇帝、清正廉洁的官吏,但历代统治者根本不可能解决腐败问题。”[②]剥削阶级从本质上是同人民根本对立的。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政权是剥削阶级的政权,是剥削阶级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机器。在这种政权体制下,政权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广大人民没有政权监督的权利,只能任其摆布、奴役,对于统治者如何行使权力、用权力干什么等等,没有监督权。这种状况是腐败现象得以出现的制度原因,也是剥削制度不可能克服腐败现象的根源所在。腐败是人类从进入阶级社会后就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历代王朝覆灭都是同政权腐败相联系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思想、观念,不可能随着封建专制政体的覆灭而寿终正寝,封建主义的余毒对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是潜在的,也将是长期的。诸如官僚主义、裙带关系、滥用权力、特权思想、贪污腐化等等,都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毒瘤。腐败现象在我国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之所以存在,封建社会残余思想仍在起作用是其重要因素。

2. 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在中国对外开放中乘隙而入

---

①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07 页。

②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34 页。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是中国的强国之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是对外开放的根本目的。但是，我们在实行对外开放，借鉴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现代文明成果的时候，“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也会趁机钻进来”[①]。“国外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乘隙而入，而西方敌对势力又一直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千方百计拉拢腐蚀我们内部一些意志薄弱的干部。”[②]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我们的思想道德文化建设；市场经济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如见利忘义、惟利是图、尔虞我诈、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等等，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党和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在这种影响下，一些意志薄弱者就很可能经不住这些诱惑，产生拜金主义、一切向钱看的观念，就会产生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

3. 制度和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

“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经历一个艰难的新旧体制转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制度和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工作中存在一些漏洞和薄弱环节，也会给腐败现象滋生以可乘之机。”[③]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是中国执政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作出的重大战略转移，在这个转轨的过程中，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层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02 页。
②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62 页。
③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02 页。

出不穷的新课题需要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些漏洞和薄弱环节，在客观上给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留下了可乘之机。法制建设不健全、不完善，有些执法人员素质低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客观存在；缺乏对执法活动的监督，不能保证对法律的严格实施。这些因素的客观存在，是腐败现象得不到遏制的重要因素。

4.党的执政地位及其带来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80多年的历史，为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前28年是为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后50多年是掌握全国政权、履行执政职能，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取得了各项事业的巨大成就。“在这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党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一个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掌握着全国政权的执政党，成为一个连续执政五十多年的党。党的地位的这种历史性变化，不能不对党员和干部队伍带来深刻的影响。”①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的行为不是凭空产生的。社会政治地位和社会生活环境必然要对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发生作用。对一个政党也是如此。在革命战争时期，参加党、参加革命队伍，就要准备奉献个人的一切乃至牺牲生命，大家都为崇高的革命理想和人民利益而奋斗。在反动派残酷统治的政治环境和极其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党领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65页。

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与人民群众形成了血肉联系。新中国成立之后，党成为执政党，掌握了政权，有了调动全国人、财、物等资源的权力。大批党员、干部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手中掌握了这样那样的权力。党的地位的变化，党员和干部地位的变化，对各级党组织和每一个党员、干部都是一个新的极大的考验，也给党的自身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执政党的建设和管理，比没有执政的政党要艰难得多。"[①]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党内一些人逐渐不思进取、好逸恶劳，不愿意艰苦奋斗、贪图享乐的思想滋长起来了，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牟取私利的现象不断发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不良作风也泛滥起来了。党内一些人所以能搞各种各样的腐败活动，就是利用了执政党的条件，利用了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同时，由于党处在执政地位并长期执政，党内有一些人逐渐产生了一种错误的思想倾向，他们把党和人民赋予的职权，把自己的地位、影响和工作条件，看成是自己的所谓既得利益，不是用这些职权和条件来为党、为人民更好地工作，而是用来为自己捞取不合理的非法的利益。他们甚至把这些东西看成是谁也碰不得、动不得的私有财产，想方设法去维护和扩大这种所谓的既得利益。这是十分危险的。因此，"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来说，党内一些干部是容易产生所谓既得利益的思想倾向的，希望全党同志都始终保持高度的警觉，自觉地同这种错误的思想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66 页。

倾向进行斗争。"①

（三）建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权力运行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政治任务。中国执政党在反对腐败的斗争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腐败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比较严峻。在新的历史时期，"各级党委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紧迫性，又要充分认识其长期性，坚定信心，扎实工作，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地把反腐败斗争深入进行下去"②。在斗争中要注意建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权力运行机制，标本兼治，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1. 从思想上筑牢反腐倡廉、拒腐防变的堤防

加强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是党的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的必然要求。"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必须贯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③在长期和平建设年代，要保持广大党员、干部的革命意志、革命精神和革命气节，必须加强教育、加强引导、加强管理。要使所有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做到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72 页。

②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5—56 页。

③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79 页。

着力于在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上下功夫，坚定理想信念，增强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加大反腐倡廉工作的宣传教育力度，加强对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和遵纪守法教育。教育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地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进行党性锻炼，加强思想政治修养，锤炼意志品质，提高精神境界，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追求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真正养成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表彰勤政廉政典型，督促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同时，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阐明中国现阶段出现的腐败绝不是根本制度性的腐败，腐败现象同中国执政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不相容的；应当理直气壮地宣传党反腐败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和工作思路是符合中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的；应当理直气壮地肯定党和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中国执政党完全有能力解决腐败问题。要把反腐败工作的关口前移，立足于教育，着眼于防范，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增强广大干部拒腐防变的能力。

2. 将预防腐败现象寓于各项重要政策和措施之中

反腐倡廉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协调配合和共同努力，需要与经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工作紧密结合。制定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政策，出台重大的改革措施，制定法律、法规规章，都要把反腐倡廉作为有机组成部分考虑进去，都要对是否有利于反腐倡廉进行论证，做到存利去弊，完善决策，未雨绸缪，预防在先。要坚持服从

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则，把反腐倡廉同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重大措施的实施紧密结合起来，针对妨碍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及时研究制定有效对策。

3. 依靠发展民主、健全法制来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

中国执政党"要依靠发展民主、健全法制来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这是我们的一贯要求，也是最可靠的措施"①。反腐倡廉工作要逐步实现制度化、法制化。要继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继续完善村务公开、厂务公开、政务公开、民主评议、质询听证等民主形式，使人民群众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保证权力的正确行使。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必须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加强领导班子的内部监督，保证领导班子成员依法办事，防止发生各种违纪违法行为，防止任何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党内生活一定要有民主空气，要欢迎讲意见。不能搞"一言堂"，在讨论工作时大家要敢于发表意见。对于什么应该民主讨论决定，以及通过什么程序决定，各级党政领导班子都应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并认真加以执行。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党员领导干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廉洁从政的行为规范。近年来，中央先后颁布了《干部任用条例》、《党内监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办法(试行)》等文件，中央组织部下发了《关于加强组织部门干部监督工作若干意见(试行)》。2004 年 4 月，经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76 页。

中央批准，中央办公厅集中印发了《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暂行规定》等五个法规性文件，之前，中央组织部与中央纪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进行清理的通知》。这些党内法规性文件，既是规范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加强对领导干部管理的制度，也是加强干部监督工作的制度。实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制度，领导干部谈话制度和回复组织函询制度等。加强反腐败方面的立法，完善预防和惩治腐败现象的法律法规，并保证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各级党政部门都必须坚决落实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的要求，根据自己工作的特点，针对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部位和环节，制定和落实预防和治理的规章制度与措施。

4. 通过体制创新逐步铲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土壤和条件

中国执政党"依靠体制创新抑制腐败现象，是我们在实践中取得的一条重要经验"①。好的体制可以有效地预防和制止腐败现象的发生，反之，不好的体制，则会导致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要着重抓住那些容易产生腐败现象的环节来推进体制创新工作，特别是要搞好人事、财政、分配等方面的制度改革。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对那些应该用市场机制运作代替行政审批的项目，就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处理。需要进行行政审批的项目，要建立科学的机制，杜绝领导干部直接插手微观经济行为，以堵塞漏洞，减少权钱交易的机会。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凡是能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经济方法解决的问题，应尽量避免或减少用行政手段来解决；需要采用行政手段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77 页。

来解决的问题，也必须有公开公正的程序。要按照民主、公开、竞争的原则，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以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从制度上杜绝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现象的发生。加快财政制度改革，强化管理和监督。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福利待遇要逐步实现规范化、制度化。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制度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总之，要针对容易产生腐败现象的具体体制、制度和薄弱环节，通过深化改革和体制创新，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相互制约的权力运行机制。同时，改革也要实事求是。有些环节权力过于集中，有些环节权力过于分散，都容易导致腐败现象。要根据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的需要，该分散的要分散，该集中的要集中，一切措施都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最终以社会效果来检验。

5.促进反腐倡廉各项工作的协调发展

“在反腐败斗争中，各级党委和政府，各地区和各部门必须协调行动，形成反腐倡廉的强大合力。”[①]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从各自的职责范围、工作特点出发，针对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部位和环节，充分运用各种手段和方式，提高教育和惩治、管理和监督的效能，努力形成各部门一起动手，各领域协调行动，各种手段配合运用，全方位、多方面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的局面。各级党委、政府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加强统一领导，坚定不移地贯彻党中央关于反腐倡廉的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部署。各地区各部门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80页。

要切实摸清存在的腐败问题，抓住重点，协调各方面力量，坚决加以解决，把中央的要求落到实处。要抓紧对反腐败工作落实情况的检查监督，及时发现和处理存在的问题。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班子主要领导负总责，实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保证“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逐级负责，层层落实。严格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对出现的重大腐败问题，不仅要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还要追究不尽职尽责或领导不力的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要深入研究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腐败现象产生的特点与规律，以利于提出有效的新办法、新措施，推动反腐倡廉工作深入开展。同时，在反腐败斗争中，我们既要建设一支政治坚强、公正廉洁、纪律严明、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的高素质执纪执法干部队伍，又要明确反腐败是全党的一件大事，需要发挥全党反腐败的积极性，实现中央确定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总之，中国执政党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态度坚决，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和搞好廉政建设。随着斗争的深入，要逐步加大治本力度，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建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权力运行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同时，又必须继续重视和加强治标工作，始终保持遏制腐败的强劲势头，“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彻底查处、严惩

不贷。”[1]经过持之以恒地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形成中国执政党的清正廉洁之风和昂扬奋斗之势。

笔者坚信，只要中国执政党借鉴世界上一些执政党成功执政的经验，吸取一些执政党失败的教训，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增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健全党的执政机制，搞好党的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坚持做到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永远与人民群众心连心，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就坚如磐石”[3]。这个结论是时代的呼声，是人民的心愿，是中国执政党执政的客观规律，也是中国执政党永葆执政地位的历史结论。

①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6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38—1439 页。

③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6 页。

第六章 执政党的党际关系

执政党的党际关系包括广义的党际关系和狭义的党际关系。广义的党际关系是指执政党与一切政党之间的关系，既包括一国执政党与外国党之间的关系，又包括一国之内执政党与其他政党之间的关系；狭义的党际关系是指一国执政党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政党的关系。本文论述的是广义的党际关系。党际关系是执政党必须面对和正确处理的重大问题之一。一方面，由于政党政治国际化，政党已经成为重要的国际行为主体，政党外交成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执政党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为了创设有利的国际环境，必须重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政党的交往。另一方面，在除执政党之外还有其他政党存在的国家里，执政党如何处理与其他政党的关系，创设有利的国内环境，也是执政党必须重视的。

一、执政党党际关系的相关因素

执政党在与其他国家政党的交往过程中，必须考虑以下相关因素。

(一) 党际关系与国际环境

执政党作为一个国家的政治行为主体,本身也是政治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国际关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党际关系必然受到系统内外部环境的影响。也就是说,执政党的党际关系直接与国际环境有关。当然,执政党的党际关系与国际环境之间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国际环境对执政党的党际关系有影响,执政党的党际关系对国际环境也有影响。

1. 国际环境对党际关系的影响

国际环境对党际关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既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也包括文化的或意识形态的因素。作用的方式可能是单一因素作用或多个因素交叉作用,也可能是国际环境以整体的力量起作用。在此分析国际环境对党际关系的影响时,笔者仅立足于整体的宏观背景,以分析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特别是中国执政党的状况为主,以利于问题的论述。

资产阶级性质的执政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从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之日起就群起而攻之。苏联十月革命后,美国社会随即产生了反共主义思潮。美国两党(民主党、共和党)都对苏联持敌视态度。威尔逊政府参与协约国对苏俄的武装干涉,继其后的共和党政府也一直不承认苏俄政权。由于战后经济和军事的优势,促使美国称霸全球的野心急剧膨胀,但苏联的影响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在全世界范围的日益扩大,致使美国不敢贸然越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双方划定的势力范围界限;同时,美苏双方都不愿、也不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不久再重燃战火,使自己再次卷入一场新

的全球战争，所以，美国采取了以"遏制"苏联为中心的"冷战"政策。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由于战略利益、意识形态等差异，不可能开展正常的党际交往，倒是反共主义始终贯穿、渗透与美国两党的外交政策中。

国际环境对党际关系的影响较明显的表现便是政党合作组织的出现。例如社会党国际的建立与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多数社会民主党人在大战中积极参加了反法西斯的斗争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再加上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高潮的推动，因此，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到 1945 年底，社会民主党党员总数已由战前的 500 多万人增加到 800 多万人。[①] 许多政党如英国工党、奥地利社会党、比利时社会党、丹麦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挪威工党等先后取得了单独执政或联合执政地位，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形成了一个高潮。为了加强社会党的国际团结和合作，许多社会民主党人提出了重建社会民主党工人国际组织的建议和要求。1951 年 6 月 30 日至 7 月 3 日，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等的 106 名代表在法兰克福召开会议，重建了社会党国际。该组织自称其历史始于 1864 年，即第一国际成立之时。但由于它是沿着第二国际伯恩施坦的思想路线演变来的，一般都认为其历史始于 1889 年，即第二国际成立之时。

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建立与活动。第二次世界

① 赵明义主编:《当代社会主义》，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78 页。

大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世界形成了两个阵营:一个是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它的基本目的是建立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和摧毁民主;另一个是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它的基本目的是摧毁帝国主义、巩固民主和根除法西斯残余势力。美国是帝国主义的主导力量,推行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正在奴役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南美洲各国。德国和日本的大资本家正在充当帝国主义的工具。右翼社会党人的叛变政策正为帝国主义所利用。在此形势下,欧洲有九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掌握了国家政权,相互间联系较为密切。1945年,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铁托向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斯大林建议,成立一个各国共产党的国际协商机构,斯大林表示赞同。1946年6月,铁托率南共代表团、季米特洛夫率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团访问苏联。在酒会上,铁托再次向斯大林建议,成立共产国际联合组织。但为了联系方便,可以建立一个情报机构。1947年9月22日至27日,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法国、南斯拉夫等九国共产党(工人党)领导人,在波兰西南部西里西来什克拉尔斯卡一波伦巴的小温泉举行了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成立会议。会议通过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指出: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必须团结自己的队伍,制订一个一致同意的行动纲领,订出自己的策略,来反对帝国主义阵营的主要力量及其同盟和右翼社会党。同时,它们必须举起保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旗帜。情报局共举行过三次会议。1956年4月,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情报局宣布停止活动。

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的应运而生。20世纪是亚洲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世纪。在20世纪的100年里，亚洲各国人民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进行了可歌可泣的奋斗，相继赢得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进而取得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成就，展现了蓬勃发展的生机。进入新世纪，和平、发展、合作已成为亚洲地区局势的主流，亚洲经济发展的活力愈益勃发，抗御风险的能力不断增强，和平发展的前途充满希望。[①] 伴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亚洲各国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各国政党求同存异、寻求合作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亚洲政党国际会议于2000年9月应运而生。亚洲政党国际会议是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潮流在亚太地区的必然产物，体现了亚洲各国政党作用日益上升的政治现实，也反映了各国政党顺应时代潮流，拓展区域合作，谋求和平、合作与共同发展的普遍愿望。

国际环境对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也产生十分明显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时，正值东西方冷战风起云涌之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对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实行野蛮的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政策，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而社会主义阵营中各国共产党则欢呼新中国的诞生，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和进步组织，也希望了解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纷纷要求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发展关系。为了冲破

① 《胡锦涛会见出席第三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来宾和代表并举行欢迎宴会》，《人民日报》，2004年9月4日。

封锁，巩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争取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决定新中国的外交实行“一边倒”的政策，与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合作。1949 年 6 月 30 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28 周年，毛泽东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毛泽东指出对外关系方面，我们将“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①]。“一边倒”是中国共产党面对当时的国际环境，从维护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考虑等出发而提出的一个外交战略指导思想和外交方针。1951 年 1 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对外联络部，专门负责同各国共产党的联络工作。之后，中国共产党与各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他国家共产党和进步力量广泛建立了友好关系，迅速开创了对外关系的局面。

2. 执政党党际关系对国际环境的影响

执政党的党际关系对国际环境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当执政党的党际关系融洽时，对国际环境的影响是正面的，具有建设性；当执政党的党际关系不融洽乃至恶劣时，则对国际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72－1473 页。

环境的影响是负面的，具有破坏性。

社会党国际自成立以来便对世界政治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先后制定的纲领性文件有《法兰克福宣言》(1951年)、《奥斯陆声明》(1962年)、《斯德哥尔摩宣言》(1989年)等。它主张实行社会民主主义，即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层次实行民主，认为多元化与人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反对剥削与压迫，也反对权力集中和阶级专政。从十九大开始用"社会民主主义"取代"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自己意识形态的正式称谓，但内涵并未改变，仍坚持以普选权为基础的政治多元主义，强调人权与民主的关系，提出建立人权新秩序。社会党国际支持地区一体化和建立地区合作与安全体制，重视欧洲安全问题，支持北约东扩和发展与俄罗斯的合作关系；近年来重视对经济全球化的对策研究，主张建立全球共同责任新体系，加强对经济全球化的调控。它认为南北关系是经济民主的一部分，主张南北对话与合作。支持各国调整福利制度。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时虽然宣称已不再是共产国际那样的高度集权的各国共产党的上级组织，而只是旨在交流经验，交换情报和配合行动。但是因为苏共的大党主义影响仍然严重存在，它依然把情报局作为贯彻苏共旨意、干涉别国党内部事务的工具。1948年6月20—28日，情报局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召开第三次会议。通过《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对南共横加指责，认为南共已脱离和背叛了社会主义道路，将变成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并号召南共的"健全分子"起来推翻铁托政权，实际上把南共开除出情报局。第二天，即1948年6月29日，南共发表了《南斯拉夫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关于情报局对南共情况的决议的声明》，完全拒绝了情报局6月28日对南共的指责，驳斥了其中的内容。1949年11月，情报局在匈牙利举行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杀人犯和间谍掌握中》的决议，对铁托等南共领导人再次进行攻击。从此，南斯拉夫同苏联及其他东欧国家的关系恶化，断绝了外交关系。苏南冲突以至苏南关系的彻底破裂，实质上是苏共大党大国主义的突出表现，是苏共粗暴干涉、侵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主权所造成的恶果。苏南关系的破裂，造成了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分裂，给南斯拉夫的政治经济建设带来了巨大损失，同时也促使南共决心从本国实际出发，探索一条既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又适合本国特点的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共产党党际关系的发展对国内外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党际关系的发展对于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一登上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的历史舞台，就受到共产国际及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帮助。党际关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既有正向的积极影响，也有逆向的消极影响。中国共产党党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党际关系中的失误，也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不利影响。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共产党把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同志加兄弟”关系，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解为无偿地支援兄弟党的一切革命活动，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国家利益。由于苏共的大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等问题，中共

与苏共进行了公开论战,结果不但影响了党际关系的发展,而且致使国家关系出现了裂痕乃至武装冲突。新时期党际关系坚持四项原则,突出了国家利益,注重对经济发展道路和战略,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经济管理体制的运行及其改革,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环境保护、城市规划等问题的考察和交流,相互借鉴。此外,为国内的经贸部门和地区牵线搭桥,引进外资、技术和人才,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

(二)党际关系与执政党

党际关系状况与执政党本身有着密切联系。执政党重视党际关系,党际关系的发展就会有长足的发展;执政党淡化党际关系,党际关系的发展就会受到挫折,产生不良的影响。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亲切关怀和指导党的对外工作,他们为推进和深化党的对外交往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在历史转折时期和遇到重大问题时,都是亲自决策,身体力行。20 世纪 50 年代,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的对外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诸如在冷战环境的开国外交中,毛泽东提出了“另起炉灶”:同旧中国历届政府的屈辱外交划清界限;“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对旧中国外交的控制与影响;“一边倒”:公开宣布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等一系列对外政策和对外方针,从而奠定了新中国开国外交的基础,指引党的对外工作为配合国家整体外交,打破西方孤立和封锁,改善国际处境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在与外国政党的交往中,毛泽东始终强调独立自主原则,强调不要“强加于人”。1971 年 11 月 8 日晚上,毛泽东在

中南海的书房里，亲自接见了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后的第一个中国代表团，也是自联合国成立以来真正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并叮咛代表团成员，要充分估计形势，提高警惕，遵守纪律，团结一致，做好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曾深夜亲临中联部，制止林彪、康生一伙煽动的极“左”行为。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提出建立和发展新型党际关系思想，开创了党的对外工作的崭新局面。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和支持党的对外工作，提出了党的对外工作跨世纪发展的指导方针，亲自参与和推动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的发展，经受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政治风波的重大考验，谱写了跨世纪党的对外工作的新篇章。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也十分关心和支持党的对外工作，正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在世界政党外交的大舞台上，充分展示着世界上第一大执政党的外交风采。

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是全党同志的共同事业。几十年来，中央有关部门及地方许多领导同志以不同形式参与了党的对外工作。他们或负责接待中国共产党邀请来访的党宾，或承担率领党的代表团组出访的任务，或为开展党的对外工作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和帮助。全党以各种方式参与党的对外工作，对增强党的队伍的世界眼光、开放意识、战略思维，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起到了积极、有益的重要作用。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国共产党的党际

交往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是与党自身正确的领导、领导干部的重视、全党同志共同的努力相关的，他们是党的对外工作蓬勃发展的基础和保证。

(三)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

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具有不同的性质和不同的内容。如前所述，执政党的党际关系是指执政党与各国政党之间的关系；而国家关系是指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内容上比党际关系宽泛得多，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和方面，是一种综合性的国际关系。政党作为一种非政府组织，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法主体，不承担国际法意义上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相比，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第一，不处理国家间的具体事务，不受外交关系的制约，比较超脱；第二，交往中可以减少外交礼节，双方可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直接交流和探讨；第三，便于广泛接触各国政界要员，从而影响国家决策。因此，党际关系对国家关系的影响是巨大的。外交是内政的直接延续，而内政是由执政党来主持的，执政党通过其领导的政府、控制的议会直接参与外交决策。处理好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对于执政党执好政，增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国际共运中曾长期存在的不平等党际关系严重影响了国家关系的良性发展。20世纪50—60年代，由于苏共“老子党”、“领导党”的霸道行为及“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1]，中苏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两党从思想分歧到公开论战，直至影响了两国关系的发展，进而引起一些国家政党的分化和阵营对垒，不仅损害了国际共运的发展，也对正常的国家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

中国共产党在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时，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20 世纪 50—60 年代中共把党际关系看成是同志关系，置于对外关系中的最高层次。基于履行支援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义务，把支援兄弟党的革命活动放在首位，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国家利益，国家关系服从于党际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做法影响了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惨痛的历史教训告诫我们，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相互共存并且力量偏弱的状况下，在社会主义尚处于初级阶段时，把党际关系凌驾于国家关系之上，既不符合实际情况，又于实事求是的精神背道而驰，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拨乱反正以后，中国共产党对新时期的外交方针进行调整，明确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有别，党际关系是国家关系的一部分，它不能凌驾于国家关系之上，更不应该干扰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而应该为国家利益服务。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历来认为，把党同党的关系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区别开来，使这样的问题不影响我们发展国家之间的关系。"[①]当然，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之间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党际关系服务于国家关系，可以推动国家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国家关系的良好局面又会影响和促进党际关系的发展。为此，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既不能为了国家利益的发展而放弃共产党人的原则、立场，更不能为了党

① 《越苏条约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人民日报》,1978 年 11 月 9 日。

际关系而损害国家关系。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启动和进程加快，在国家的整体外交中，执政党的对外工作充分发挥了自身的特点和优点，为开拓、巩固和发展国家关系做出了贡献，理顺了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之间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完全服从于国家的中心工作、党的中心工作，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彻底改变了“外交服从于革命”的情况。在与外国政党的交往中，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地、坦诚地向国际社会介绍和解释党的路线、方针和内外政策，展示了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和平、发展、进步的新形象。通过政党交往，很多国家党的领导人增加了对中共和中国的了解，为执政参政后积极发展对华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例如，1981 年初，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密特朗应中共邀请访华，他回国后不久在当年的大选中当选为法国总统；另据不完全统计，拉美国家先后有 14 位当选总统在当选前曾以政党领导人的身份来中国访问过。与此同时，那些与中国有所交流的政党领导人在执政之后，往往会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成为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南非总统姆贝基曾经说过，中国共产党与非国大之间的关系是两国关系的核心，正是这种在种族隔离时期就建立起来的关系促使南非在非国大上台执政后下决心与中国建交，放弃与台湾当局的所谓“外交关系”。在国家关系遇到困难时，政党交流与国家关系互为补充，有时甚至能起到独特的作用。例如，1998 年，印度借口“受到中国威胁”进行核试验，中印两国关系出现紧张，但是党与党之间交流的渠道仍然是畅通的。2001 年，时任印度外长兼国防部长的辛格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长春前往访问，印度借

此向媒体大力宣传中印关系的改善，两国关系开始回暖。①

(四)党际关系与意识形态

每个执政党都有自己的纲领和主张。这些纲领和主张无疑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这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标志。在执政党对外交往中，意识形态差异不应成为党际关系的障碍，执政党应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开展党际交流与合作。

西方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以意识形态划线，这在美国执政党的对外政策中可见一斑。正如王缉思先生在给刘建飞博士的著作《美国与反共主义——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所作的序中指出的："美国自由派历史学家小阿瑟·施来辛格说：'对外政策的一个国家向世界展示的面孔。所有国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即保护国家的完整和利益。但是一个国家设计和执行本国外交政策的方式，受到国家特性的巨大影响。'他所谓的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国家特性，就是美国人用一种狭隘而顽固的意识形态作为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又用一种灵活的、多重标准的实用主义方式去从事外交实践。"②自从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后，在美国就产生了反共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并被运用到美国外交中去，并自始至终将其贯穿于美国对华政策之中。

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党际交往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中国共产党极其重视意识形态在外交中的作用。毛泽东在处理新中国外交时，一开始就将意识形态引进

① 参见《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日益活跃》，《半月谈》，2003年第21期。

② 刘建飞：《美国与反共主义——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到外交工作中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明确指出："我们永远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我们始终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巩固地团结起来。"综观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反对帝国主义。苏共二十大以后，针对波匈事件和西方掀起的反共高潮，毛泽东从大局出发，大力支持苏联，帮助苏联回击西方的进攻，维护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巩固了东欧的局势。二是坚持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为了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不惜与苏共发生意识形态方面的激烈论战。三是坚持各被压迫被剥削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中共在党际交往中区别政党好坏的标准更多的是以意识形态异同为尺度，过去几十年直到改革开放前，一直只同与自己意识形态相同的政党进行交流，比如各国的共产党。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实行"支左反修"、输出革命，把西方国家中主张议会斗争和群众斗争的共产党划入修正主义行列，不与其往来；视一些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从本国实际出发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加以批判。甚至为支持一些国家的"左派"政党，不惜损害国家利益。当时全世界 89 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中有 78 个与中国共产党断绝了关系，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类政党发展关系也就更谈不上了。历史证明，意识形态异同与否，不是制约执政党党际关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意识形态相同的执政党之间未必不发生矛盾和冲突，意识形态相左的政党之间未必不能和

平共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强调各国的"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型的关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不应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也不应成为发展党际关系的障碍。中共对于意识形态的差异甚至分歧,主张本着求同存异、互不强加于人的原则,搁置分歧,互相尊重对方的选择,"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①]邓小平认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共正视曾和一些共产党、工人党关系紧张和恶化的现实,对历史问题采取非常务实的态度,"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实现了同一些政党中断多年的交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开始出现了和中国不同的情况,对此,邓小平指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②]通过对"不搞意识形态争论"等方针策略的贯彻,中国共产党不仅保持了同东欧国家原有的外交关系和党际关系,而且先后同苏联解体后出现的15个独联体国家建立了外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

交关系和党际关系；2001 年 6 月 15 日在上海，中华人民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六国经过协商，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这些都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需要指出的是，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是不分是非曲直，而是尊重执政党党际交往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也不是不讲原则，而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注重执政党党际交往的灵活性，增强实效性。

二、执政党党际关系的目的、作用、原则

执政党发展党际关系，具有特定的目的、作用和必须坚持的原则。

(一)执政党党际关系的目的

目的是人们想要得到的结果。实现一定的目的是党际关系建立和发展的可靠性基础。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对外交往，目的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促进中国同世界各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国家关系健康、稳定的发展，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经济发展、推动人类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历程中曾经走过一些弯路，有些是国内外环境所致，有些是决策所为。1961 年 1 月在毛泽东主持下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认为，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建立和发展关系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反对帝国主义，

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在1963年6月中共中央就苏共中央三月来信的回信中，提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内容，建议共计25条，后来就简称“二十五条”。其中第二条提出了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问题：“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在我们看来，这就是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

1965年9月，林彪发表了《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这是中国外交走向世界革命外交的标志之一。这篇文章反映的不是林彪个人的思想，在此后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对这篇文章的内容给予了完全的肯定。在全会的公报(1966年8月12日)中说，这篇文章及其他一些文章“对当代世界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是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林彪的这篇文章以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民主革命理论(即“井冈山道路”)为依据对当时的世界局势进行了所谓分析。

1966年10月，毛泽东在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中说：“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一定要建立起来。”从此，“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成为“文化大革命”初期最时髦的口号。“文化大革命”时期，中

国共产党的党际关系和国家的外交工作受到了严重冲击。在政党外交的目的为"支左反修"、"支援世界革命"的驱使下，中国共产党的党际关系日趋紧张，以至造成了外交上的"光荣孤立"。

由于时代的变化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发展党际关系的目的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①]因此，全党工作的重心包括党的对外工作必须围绕这三大任务来进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非常重视党际关系的发展。在坚持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基础上，江泽民首次声明政党交往的目的是"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在党的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明确写明："中国共产党主张积极发展对外关系，努力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在国际事务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②]胡锦涛在《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要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

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国防安全。”①这反映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所形成的与时俱进的党际交往和外交工作的新理念和战略。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工作，紧紧围绕党际关系的目的，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形势发展变化，本着为国家总体外交服务、为国内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党的自身建设服务、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宗旨，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际交往的原则，不计较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努力同一切愿意与自己交往的各国政党建立和发展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增强彼此的理解与友谊，寻求利益的交汇点，扩大互利合作，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了一个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政党外交格局。

(二)执政党党际关系的作用

执政党外交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政府外交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执政党党际关系的独特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促进国家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党际关系特别是高层党际关系，对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具体地说，执政党党际关系的独

① 《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年8月23日。

特作用主要表现为：

第一，作为国家关系的重要基石，具有基础作用。执政党党际关系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之间的高层交往和政治对话，对从全局高度和战略上把握和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通过执政党之间的高层接触，双方领导人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广泛问题坦诚交换意见，深入解惑释疑，高瞻远瞩处理和把握国家关系，为国家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排除障碍，奠定基础。

第二，作为国家关系的助推器，具有促进作用。执政党外交既做执政党也做在野党的工作，既做政治元老也做政治新秀的工作。与执政党交往，有利于巩固国家关系的基础，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同在野党往来，着眼于政局变化时保持国家关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政治元老交往，可以巩固现有合作基础；同年轻政治家交往，可以为面向未来的合作关系打下良好的基础。这种既立足现在，又着眼未来的对外交往和联系，对加深执政党与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友谊，促进国家关系的巩固和发展，具有重大作用。

第三，作为国家关系的开拓者，具有桥梁作用。通过执政党党际关系渠道做未建交国工作，增进执政党与有关国家的相互了解，通过扎扎实实的铺垫和积累工作，为逐步实现执政党所在国家与这些国家的正常化架起友谊与合作的桥梁。

2.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执政党党际关系的发展，对于执政党借鉴吸收人类创造的有利于自己发展的优秀文明成果，交流探讨治国理政的经验，具有很大帮助。中共领导人在对外交往中，非常注重通过

政党交往借鉴外国党积累的于己有益的经验教训，借助他山之石，丰富发展思路。越来越多的外国政党不再满足于一般性的交流，越来越注重交往的实质性内容。越、老、古等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与中国共产党的交往中，注重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问题的探讨。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党，对学习借鉴中共治党治国经验具有强烈的愿望，多次派团访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也越来越重视了解和研究中共的治党治国方略。这些交流与探讨，充实了党际关系的内涵，也为执政党外交的新发展增添了活力。

执政党党际关系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经贸合作。通过在党际交往中注入经济因素，中国共产党逐渐开辟出一些“政党外交搭台、经贸活动唱戏”的新途径、新形式。譬如，在同外国政党交往中，有针对性地安排考察经济建设项目，深入探讨不同国家的发展战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面临的挑战等。一些省区市党委负责同志率党的代表团出访时，贯彻中央“走出去”的方针，偕经贸团组随访，把一批有实力的企业和项目推向国外。同时，党的职能部门还通过政党渠道，为经济部门推荐伙伴，提供信息，为经贸项目的合作服务。

3.有利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执政党执政的关键是自己的执政能力问题。如何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是摆在每个执政党面前的重大问题。执政党党际关系的发展是执政党借鉴外国党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研究党的执政规律和党建理论的一条重要战线。

中国共产党作为在中国拥有6800多万党员和领导着12亿多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如何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

国内外形势变化，如何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一步解决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提高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始终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这就不仅要立足于国内，而且要具有国际眼光。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党际关系这一了解世界、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渠道和窗口，不断加深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中共领导人以及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负责人通过积极参与党的对外工作，可以直接了解到外国执政党（政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和执政环境等方面的内容，也可以直接了解到一些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还可以切身感受到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并在与外国的比较中更深刻地认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对于中国共产党正确把握世界发展脉搏，准确判断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紧跟世界进步潮流，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优秀文明成果，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三）执政党党际关系的原则

执政党在发展党际关系的过程中，要遵循执政党党际关系的原则。下面以中国共产党为例阐述执政党党际关系的原则。

1.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独立自主的党际关系原则

新中国建立正值东西方冷战形势十分严峻的时候。西方国家对新生的人民政权采取一种敌视和封锁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为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为核心的党际关系原则，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同外国政党独立自主交往的历史。

第一，党要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独立自主原则是正确处理党际关系的核心和出发点。中国革命实践证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由己及人，中国共产党主张在发展党际关系时，各国党有权根据本国实际探索符合自己国家的具体道路，而不应该将自己的主张和发展道路强加于其他政党。毛泽东明确指出："各国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中国的经验，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即使是好的经验，也不一定同别的国家的具体情况相适应。照抄是很危险的，成功的经验，在这个国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个国家如果不同本国的情况相结合而一模一样地照搬就会导致失败。"[①]遵循这一原则，到 50 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共产党和组织建立了友好关系，到 1956 年召开党的"八大"时，有 56 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前来参加了会议。

第二，维护和加强同各国共产党的团结。由于意识形态相同以及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受到共产国际及

①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4 页。

苏联等共产党的帮助，加之建国之初，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中国为敌的政策，把中国同遏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联系在一起，因此，中国共产党维护和加强同各国共产党的团结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1962 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永远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我们始终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巩固地团结起来。"[①]1965 年他又强调："在国际上，我们要团结全世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首先是团结苏联，团结兄弟党、兄弟国家和人民，还要团结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借重一切有用的力量。"[②]"我们的原则，就是不管你什么人，外国的党，外国的非党人士，只要是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有一点用处的，我们就应该团结。首先是要团结几十个共产党，团结苏联。"[③]

第三，坚持平等协商，反对父子党关系。执政党党际关系的发展应该建立在相互平等和协商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与外国政党的交往中，不论是大党还是小党，历史长的党还是历史短的党，执政的党还是没有执政的党，都要在独立自主原则下，平等地发展党际关系。毛泽东在承认苏联共产党对世界革命贡献的同时，对其"老子党作风"也进行了坚决的抵制。毛泽东说："我们支持苏联，但错误的东西不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0 册，第 38 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8 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91 页。

支持。”[1]1964 年 7 月毛泽东在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的批语和修改中指出：“为什么一个党的决定，硬要一切党都服从呢？为什么不服从就犯了大罪呢？请问这是什么逻辑，什么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呢？”[2]

第四，党际关系的发展要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中国共产党在党际关系的发展中，不仅对共产党之间的党际交往非常重视，而且对于其他政党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如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便与亚非拉地区的一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建立和发展了关系；同时，谋求与自己意识形态相左的西欧社会党的相互了解与合作。1954 年毛泽东对来华访问的英国工党代表团说：“你们问，我们和你们所代表的社会主义能不能和平共处？我认为可以和平共处。”[3]20 世纪 70 年代，为了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毛泽东十分重视同美、日两个国家执政党的党际关系，取得了重要成果。

2.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强调各国的“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型的关系”，并对正确处理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问题，提出了许多很重要的指导思想。根据邓小平的思想，中国共产党集中全党的智慧，提出了建立和发展新型党际关

①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24 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1 册，第 106 页。

③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60 页。

系的“四项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1997年党的十五大在总结新时期党际关系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完整的党的对外工作指导思想,即在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基础上,“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的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所通过的党章重申,中国共产党要按照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①,是中国共产党处理同外国政党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方针。

独立自主原则是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基础。独立自主的内涵,就是各国政党根据本国实际和自身条件,独立决定和管理党内的一切事务,包括选择革命的道路和方式,判断和评价党际关系的成败得失和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战略和策略;作为执政党,执掌政权的方式和战略等。邓小平指出:“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②他倡导独立自主的原则,强调要吸取国际共运历史的根本经验教训,各国政党要根据自己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实际情况,自行决定自己的政策,革命也好,建设也好,才能取得成功。因为本国的政党最了解本国的现实情况,同本国人民的联系最直接、最密切。所以,各国政党建设的方针、政策,完全应该由本国党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制定、贯彻和执行。邓小平在总结20世纪60年代国际共运大论战的经验教训时深刻地指出:“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应当由本国共产党独立处理,任何外国党的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1页。

同志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是肯定要犯错误的。""一个国家的革命要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各国共产党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①]各国的问题要由各国的政党和人民去探索，去解决，而不能由外国党或某个国际中心来指挥，不应存在谁指挥谁、谁服从谁的问题。国际共运"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②]。一个政党在制定本国的方针政策时，难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就是犯了错误，也要由自己去总结，自己去解决问题"[③]。

完全平等原则是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关键。各党不分大小，不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不论建党的历史的长短，都应该平等相待，任何党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做法强加于其他党，各国党与党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完全平等的关系。任何国家的政党都没有权利凌驾于其他国家的政党之上，也没有权利自封为领导，更不能到处指手画脚。邓小平指出："党与党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同志式的关系，不应该是'父子'关系。""任何大党或老党都不能以最高发言人自居。"[④]各国党与党之间，不是父子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不能以大欺小，以老压新。国际共产主义的实践证明，各国党只有一律平等，才有可能发展正常的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坚持独立自主。

互相尊重是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前提。党与党之间既然是完全平等的，那么就应该互相尊重。没有互相尊重，就表明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

党与党之间还存在平等障碍。尊重对方的利益和尊严，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才能建立和发展起来，各党应该尊重别国党和人民的经验及根据自己的国情、党情所选择的内外政策。“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①]党与党之间不要搞争论，更不要搞对抗。对相互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应该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通过正常的交流、对话和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对于一时难以达成一致的意见，可以各自保留，留待历史去检验和解决。不能随便批评指责，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是发展新型党际关系的保证。该项原则与前三项原则相辅相成，只有不折不扣地坚持上述三项原则，才能实现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目的；只有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才有可能达到上述三项原则的要求。各国党的内部事务应由各国党自己去处理，不允许任何外国政党干预，也不允许利用党际关系干涉别国内政。过去，党际关系中的许多矛盾、冲突，争论的焦点大多是:“谁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这种争论的根本出发点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成不变的教条，用自己的经验来衡量、评判其他政党的是非，而不去考虑每个国家或政党的情况。实践证明，党际关系的发展必须遵循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否则，只能造成党际关系恶化，进而危害国家关系的恶果。

3.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主张用党际关系的发展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6页。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党的对外工作，广交朋友，与具有相同或不同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的各国政党领袖频频举行高层会晤，就重大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交换意见，阐述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方针和政策，促进党际交流和发展，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党际关系的发展和国家外交工作中的经济成分越来越成为关键因素。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主张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并在多样性中寻求共同利益，主张各国政党之间在四项原则基础之上进行交流和发展党际关系。1995 年，江泽民在联合国成立 50 周年特别纪念大会上，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主张形成各国自主选择、求同存异的国际和谐的局面。这一战略主张，同强求一律，强加于人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径根本对立，是中国共产党为世界多极化、民主化和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建立所提供的理论依据。[①] 2002 年 4 月 10 日，江泽民同志在德国外交政策协会发表题为《共同创造一个和平繁荣的新世纪》的演讲中指出："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保证各国和睦相处、相互尊重。各国人民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明。各种文明相互交流和借鉴，是人类进步的动力。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该而且可以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有一种模式。一个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世界，

① 陈先奎、韩洪涛：《简明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99 页。

只能是一个各种文明相互交汇、相互借鉴，所有国家平等相待、彼此尊重，充满活力而又绚丽多彩的世界。"[①]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②]。胡锦涛在《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重申："我们将同各国人民一道，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致力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③]这些，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依据国内外形势变化，致力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谋求世界持久和平与经济发展的宏大战略构想和主张。

三、执政党国际党际关系

执政党党际关系中，执政党与其他国家政党的关系占有重要位置，研究执政党党际关系，吸收借鉴执政党党际关系中的经验教训，对于促进中国共产党党际关系的发展，提高执政

① 江泽民：《共同创造一个和平繁荣的新世纪》，《人民日报》，2002年4月11日。

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

③ 胡锦涛：《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年8月23日。

能力,意义重大。

(一)国外执政党党际关系

资产阶级性质的执政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从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之日起就群起而攻之。苏联十月革命后,美国社会随即产生了反共主义思潮。美国两党(民主党、共和党)都对苏联持敌视态度。威尔逊政府参与协约国对苏俄的武装干涉,继其后的共和党政府也一直不承认苏俄政权。由于战后经济和军事的优势,促使美国称霸全球的野心急剧膨胀,但苏联的影响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在全世界范围的日益扩大,致使美国不敢贸然越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双方划定的势力范围界限;同时,美苏双方都不愿、也不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不久再重燃战火,使自己再次卷入一场新的全球战争,所以,美国采取了以“遏制”苏联为中心的“冷战”政策。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由于战略利益、意识形态等差异,不可能开展正常的党际交往,倒是反共主义始终贯穿、渗透于美国两党的外交政策中。

社会党国际目前拥有各类成员党和组织168个,其中有50多个成员党在约50个国家执政或参政,成为当今世界上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国际性政党联盟。现在欧洲各国基本上都是社会民主党在执政。其中德国社会党有50多年的执政史;而瑞典社会党创造了在多党制的体制下,一党单独或联合组阁从1932年直到1976年连续执政44年的记录,1982年大选获胜后,重新登台执政至1991年,1994年又卷土重来,执政到现在。社会党国际成员党按其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分为三

类:一为正式成员党,有发言权、表决权和缴纳会费的义务;二是咨询成员党,有发言权和缴纳会费义务;三是观察成员党,有出席、观察正式会议的权利和缴纳会费的义务。另有兄弟组织,有发言权和表决权;联系组织,有发言权。社会党国际的组织机构为:一是代表大会:最高权力机构。每三年召开一次,它宣布社会党国际的原则,决定其章程,并由占 2/3 多数通过的决定来吸收或开除成员党以及确定它们的成员地位。二是理事会:最高执行机构,由正式成员党和兄弟组织组成,每年开会两次。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代表社会党国际决定政策和原则,召集各种会议,通过决议或发表声明。三是财务和行政委员会:由理事会选出的 9 个成员党和兄弟组织组成,每年至少开会两次。它负责向理事会提出下一年度预算。四是秘书处:常设工作机构,在理事会指导下筹备社会党国际的各种会议,并同各成员党保持经常性联系,在它们之间组织交换它们感兴趣的各种问题的信息,负责编辑、出版社会党国际的机关刊物—《社会党事务》(Socialist Affairs)。五是其他委员会:亚洲太平洋地区委员会,非洲委员会,中东欧委员会,经济政策、发展和环境委员会,人权委员会,拉美与加勒比委员会,地中海委员会,中东委员会,和平与裁军咨询委员会,地区权力委员会。

社会党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始于 1982 年。1986 年中共观察员应邀出席其代表大会。同年社会党国际秘书长应邀访华。1998 年 9 月,应中国共产党邀请,由莫鲁瓦主席率领的社会党国际代表团来华访问。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会见了代表团。莫鲁瓦表示,社会党国际重视与

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希望继续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对话与多种形式的交流，共同探讨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以发展面向21世纪的对话和合作。2004年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见了由社会党国际主席古特雷斯率领的社会党国际代表团。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友好交谈。胡锦涛说，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发展与包括社会党国际在内的世界各类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和合作，愿意本着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与合作的精神，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基础上，同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开展形式多样的友好交往，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加强合作，促进双边关系以及中国同社会党国际成员党所在国国家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古特雷斯首先对中国共产党邀请社会党国际代表团访华表示衷心感谢，并高度评价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他说，中国的统一和发展是建立均衡、稳定、多极化世界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实现全球治理的重要条件。社会党国际将一如既往地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反对任何旨在分裂中国的言行，继续在各个领域中积极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友好交流与合作。

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已经举办了三次会议。首届亚洲国家政党国际会议于2000年9月18—19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由菲律宾基督教穆斯林民主力量党（当时称为“力量—全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发起并主办。来自亚洲26个国家的46个政党（其中包括16个国家的执政党）的代表以及来自欧洲、拉美、非洲的政党、基金会的观察员和特邀嘉宾共约180

人出席。亚洲国家一些政要、政党领导人，包括泰国总理、民主党领袖川·立派，印度尼西亚总统、民族觉醒党创始人瓦希德，柬埔寨国民议会议长、奉辛比克党主席拉那烈亲王，韩国前总统、大国家党领导人金泳三，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巴基斯坦前总理、人民党主席贝·布托等出席了本次会议。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马文普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应邀出席了会议。在此次会议上，亚洲各国政党代表本着“求同存异”、“平等协商”的原则，以“在亚洲政党间架起桥梁并培养相互间的伙伴关系文化”为主题，就“亚洲发展道路”、“和平与稳定”、“民主与良政”三个专题进行了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会议发表了《亚洲宣言》。《宣言》强调，和平与稳定关系到亚洲各国人民福祉，呼吁和平解决争端，加强在地区安全对话、裁军和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合作；呼吁各国加强经济合作，防范未来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探讨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共同货币乃至亚洲共同市场的可能性；要求各国政府加大扶贫力度，发挥政党作为人民参与政治的桥梁作用，建立高效透明的行政机制。会议确定亚洲政党国际会议两年举行一次，使之逐渐成为亚洲各政党交流合作的固定机制。在第一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上成立了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常委会，推选德贝尼西亚担任主席。第二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于 2002 年 11 月 22—24 日在曼谷召开，由泰国执政党泰爱泰党主办。来自亚太地区 35 个国家的 77 个不同政党或组织的代表、政府特邀代表及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机构特邀嘉宾共 230 多人参加了会议，其中包括多位政府总理、国会议长及 24 位党的主席、总书记（秘书长），他们中有菲律宾众议院议长、

“力量—全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德贝尼西亚，泰国总理、泰爱泰党主席他信，柬埔寨首相、人民党领导人洪森，印度尼西亚专业集团党主席丹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委、政府内政部长黄根成，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等。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蔡武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应邀出席了会议。大会的主题是“促进共识、深化合作”。各国政党代表主要围绕“经济合作”、“地区安全”、“良政和政治参与”等三个专题进行讨论，形成了一系列共识。会议发表了《2002 曼谷宣言》。《宣言》强调，亚洲政党要致力于推动亚洲国家建立经济伙伴关系，合作参与建立公平的世界贸易体系；贫困是当前亚洲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各国应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广有关国家在扶贫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亚洲应深化经济改革，完善金融和财政管理，继续建立和健全经济危机的预防机制；加强地区和国际反恐合作并健全有关机制，支持制定国际反恐公约，支持联合国在全球反恐斗争中的作用，树立国际社会对亚洲经济活动安全保障的信心；支持有关创建调解和预防地区冲突机制的倡议和努力，呼吁建立打击贩卖人口和贩毒等跨国犯罪的地区机制；尊重人权和人的尊严，保证公民充分参政，推动政府改革。《宣言》为促进亚洲各政治组织之间亲密、真诚关系的发展，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为维护该地区的和平、稳定、和谐、繁荣构筑了重要框架。第三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于 2004 年 9 月 3—5 日在中国首都北京召开，由中国共产党主办。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次主办国际性政党会议。来自 35 个国家的 81 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 350 余位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第三届亚洲

政党国际会议组织委员会名誉主任曾庆红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扩大亚洲政党交流促进地区共同发展》的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三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组织委员会主任刘云山主持开幕式。参加会议的外国贵宾有，菲律宾基督教穆斯林民主力量党主席、菲律宾总统阿罗约，泰国泰爱泰党主席、泰国总理他信，柬埔寨人民党副主席、柬埔寨首相洪森，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主席、东帝汶国民议会议长卢奥洛，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副总书记艾哈迈尔，柬埔寨奉辛比克党主席、柬埔寨国会主席拉那烈，菲律宾基督教穆斯林民主力量党总裁、菲律宾众议长德贝内西亚，越南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副总理武宽，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老挝副总理宋萨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检阅委员会委员长朴用硕。会议的主题是"交流、合作、发展"，三个议题分别是"地区安全与多边合作、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会议发表了《2004 北京宣言》。宣言强调，本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为亚洲各国政党的国际交往注入了新的活力。"交流、合作、发展"既是本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的鲜明主题，也是亚洲各国政党和政治家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我们赞赏亚洲国家和政党为和平解决地区冲突与危机所做的努力，我们主张把争议地区变为合作地区。亚洲各国政党应通过积极的交往与合作促进国家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应不断丰富和挖掘合作的内涵与潜力，充分发挥各自在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和维护地区安全方面的独特作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见了出席会议的部分来宾并同全体代表合影留念。会见结束后，胡锦涛为各国来宾和代表举行了欢迎

宴会并在宴会上致辞。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的显著特点是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也不搞政党间的结盟。它是一个交流和对话的平台，是一个开放式的论坛。与会各方超越意识形态差异，相互尊重，不搞争论，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和交流，开展多边对话与合作，在亚洲各国政党之间架起一座沟通与合作的桥梁。

社会主义阵营执政党的交往。1949 年，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苏联、欧亚各人民民主国家先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在各方面开展广泛的合作。至此，苏联和东欧的民主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以及亚洲的中国、朝鲜、越南、蒙古等 12 个国家形成了地跨欧亚的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为共产党，其共同的奋斗目标、共同的思想理论基础、共同的组织原则等，决定了社会主义阵营执政党之间的联系是密切的。

情报局解散后，从 1957 年莫斯科会议开始，各国共产党又进入了一个通过"国际会议"来协调行动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从组织上讲，各党名义上是独立平等的，但由于共产国际的影响没有肃清，苏共利用其大党大国地位，事实上仍然起着领导和支配作用。于是在国际共运中形成了"老子党"、"指挥棒"与反对老子党、指挥棒的斗争。同时，由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各党对这种变化存在不同看法和认识，统一思想、协调行动变得越来越困难。认识上的差异和路线上的分歧，后

来造成理论上、意识形态上的“大论战”。在论战中,中国共产党认为苏共是“现代修正主义”,而苏共与其站在同一立场的共产党则骂中国共产党是“教条主义”,导致国际共运的最后分裂。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在有关斯大林的评价、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问题上产生分歧。在中国国家主权问题上,中苏双方还在所谓“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问题上,产生了不愉快。1960 年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搞突然袭击,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围攻。随后,双方的矛盾扩展到了国家关系上。1960 年 11 月,81 个兄弟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前夕,苏共领导向兄弟党代表散发了一封长达六万字的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信件,并在会议前和会议中,组织一些兄弟党代表对中共进行围攻,企图依靠多数来压服中共代表团。1961 年 11 月,在苏共举行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苏共领导发动了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大规模的攻击,开创了利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公开攻击兄弟党的恶劣先例。从 1962 年 11 月起,苏共领导在国际范围内更加猛烈地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1963—1964 年,中苏两党围绕国际共运总路线,展开公开大论战,还就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问题交换了一系列信件。中共中央在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和《关于中苏两党会谈的声明》后,又先后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驳斥苏共中央公开信,充分阐述自己的观点。面对中苏两党关系恶化的局面,中共中央认为,全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要作充分的准备,在目前情

况下，迟开比早开好，甚至不开比开好。但1964年7月3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擅自规定国际会议要在1965年年中举行，而其筹备会议将于1964年12月15日举行。8月30日，中共中央答复苏共中央来信，再次重申，决不参加苏共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并指出：苏共召开筹备会议的那一天，就将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分裂的日子记载在历史上。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以后，中共曾希望苏共新领导改变召开国际会议的决定，但被拒绝。1965年3月，苏共新领导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党的坚决反对，在莫斯科举行了“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参加会晤的有19个党，另有一些党拒绝参加。莫斯科三月会议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思想上的分歧发展到组织上的分裂，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以及欧洲一些党之间的关系中断了，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因而莫斯科三月会议成了中苏两党关系完全决裂的标志。1966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表示中共不能派代表团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从此，中苏两党便断绝了往来。中苏两党决裂，引起中苏两国国家关系的恶化。1969年，双方在珍宝岛和新疆边界问题上发生严重的武装冲突，几乎导致全面战争。70年代后，苏联大肆扩张，中苏关系一直处于不正常的局面。直至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两党关系才实现正常化。

（二）中国共产党的党际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党际关系经过了一个曲折发展、与时俱进的发展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时，正值东西方冷战风起云涌之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对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实

行野蛮的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政策，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则欢呼新中国的诞生，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和进步组织，也希望了解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纷纷要求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发展关系。为了冲破封锁，巩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争取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决定新中国的外交实行“一边倒”的政策，与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合作。1949 年 6 月 30 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28 周年，毛泽东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毛泽东指出对外关系方面，我们将“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①]“一边倒”是中国共产党面对当时的国际环境，从维护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考虑等出发而提出的一个外交战略指导思想和外交方针。1951 年 1 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对外联络部，专门负责同各国共产党的联络工作。之后，中国共产党与各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他国家共产党和进步力量广泛建立了友好关系，迅速开创了对外关系的局面。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72－1473 页。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各国共产党围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发生了大论战。60—70年代国内发生了达十年之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党际之间交往的范围大大缩小了。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的基础上，总结国际共运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思想，明确了新时期党的对外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特别是良好的周边环境，确立“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交往四项原则。在邓小平新型党际关系思想的指引下，党的对外工作进入了拨乱反正、开拓进取的新时期。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按照不纠缠历史旧账、一切向前看、谋求合作的原则，中国共产党逐步与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恢复了中断已久的党际关系；着眼于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逐步与非洲、拉美和亚洲国家执政的民族民主政党建立起多种形式的交流和合作关系；从80年代初起，本着超越意识形态差异、谋求谅解与合作的精神同欧洲国家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及其国际组织建立了联系；从80年代中期起，同西欧国家的一些传统中右翼政党进行了接触和交往。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发生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挫折，陷入低潮的严峻形势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提出了应对大局的战略和方针政策；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按照党际交往四项原则，积极稳妥地开展对各类新老政党的工作，中国

共产党的对外关系很快度过了短暂的困难局面，稳住了阵脚并迅速获得了更加蓬勃的发展。

与亚洲各国政党的交往，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重点。近年来，围绕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中国共产党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奉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遵循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交往原则，本着超越意识形态差异，谋求友谊与合作的精神，积极同亚洲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开展交流与合作。目前，中国共产党已同亚洲地区的 34 个国家的 100 多个政党建立和保持着不同形式的联系，以周边国家主要政党为重点，以推动国家关系全面发展为目标，以交流治党治国经验，共谋和平、发展与合作为主要内容的周边政党工作新局面已基本形成。

在总结党的对外工作历史经验的基础上，1997 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跨世纪党的对外工作的指导方针，即在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的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这是对邓小平党际关系思想的坚持和发展，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在十五大后，进一步掀开了全面发展和不断深化的新的历史篇章。党的对外交往在深度、广度、形式、内容等诸多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在建党 80 周年时，中国共产党已同世界上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 多个不同类型的政党保持着不同形式的联系和交往，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党际交往局面初步形成，中国共产党在各国政党中的朋友越

来越多，在各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愈益丰满，国际影响空前扩大。十六大前后，有 140 多个国家的 300 多个政党、组织和政要向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导人贺电贺函近 800 件，其数量之多、层次之高、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都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执政党的党代会，有如此众多的政党、政要如此热情友好地致电致函祝贺，这在世界政党政治史上是少有的。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同各国各地区政党和政治组织发展交流与合作”①。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掀开了全面发展和不断深化的新的历史篇章。通过政党外交搭建了历史独特舞台，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向世界传达了对和平与发展问题的看法和改革开放的决心，更好地展示了愿与世界各类政党发展友好合作的诚意和坚持改革、开放、创新的良好形象。中国共产党在各国政党中的朋友越来越多，在各国人民心中的形象愈益丰满，国际影响空前扩大。

中国共产党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外交工作十分重视。在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胡锦涛明确指出：“做好外交工作，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②他郑重声明：“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7 页。

② 《人民日报》，2004 年 8 月 30 日。

业。”[①]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党要领导人民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作出贡献,必须正确应对国际局势,妥善处理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②]为此,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对外交工作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和高素质外交干部队伍的建设,努力建设一支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组织纪律严、经得起风浪考验的外交干部队伍,特别是要加强优秀青年干部的培养锻炼,为我国社会主义外交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可靠人才。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围绕一些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课题,大力加强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的调查研究,注意把握新趋势、新特点、新动向,增强把握外交全局和战略思维的能力,掌握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同时,要始终把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安全。

四、执政党国内党际关系

执政党与本国其他政党的关系,同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发展和执政的现实环境相联系。不同类型的政党制度和执政党的特点与执政党国内党际关系息息相关。

① 胡锦涛:《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年8月23日。

②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日报》,2004年9月27日。

(一)外国执政党国内党际关系

由于不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同,政党制度的差异,外国执政党国内党际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外国政党制度主要有三种类型: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

实行一党制国家的执政党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掌握着绝对的权力。一党制具体可以分为一党独裁制、一党权威制和一党多元制三种类型。一党独裁制不允许其他政党的存在,实行军事独裁统治,无所谓党际关系之说。一党权威制也不允许其他政党存在,只是一党专制的控制有所放松。一党多元制中,允许多个政党存在,但事实上能够执政的政党只有一个,其他政党都处在弱小的反对党地位。各反对党尽管弱小,但有完全的自由,有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参政的权利。像 1993 年前的日本的 1955 年体制就是这种一党制的典型。

在实行两党制的国家中,英国和美国是实行两党制最典型的国家。西方国家的不同政党主要是在同一的资产阶级内部产生的不同的政治派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它们要最大限度地维护本集团利益,只能通过竞争获取执政地位来实现。这就决定了多党制中的不同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具有不确定性,要么是执政党、要么是在野党。西方国家两党制的党际关系本质上是竞争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党际关系。尽管资产阶级口头上也讲政党平等,但实际上并不平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党和小党之间的关系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英美等国家长期维持两党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执政党在法律和制度上作了许多歧视性的规定,如选举制度中多数代表制等,限制了第三党和小党的发展。小党只是资产阶

级民主的装饰品而已。

多党制的特点是一个国家中存在的多个政党很难取得议会多数而单独执政。因此,各主要政党往往在大选前就组成竞选联盟,联合成多数,以此取得选举胜利并进而组阁。参与执政的各政党由于代表的社会阶层、利益不尽一致,在执政过程中易于出现各种不同意见。任何政党都不可能把自己的意志完全地贯彻到政府工作中去,政府所贯彻的政策通常是执政的各政党力量调和、妥协的结果。在政府运作过程中执政党联盟中的各政党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矛盾,因而常常出现政局不稳的情况。

(二)中国执政党国内党际关系

当代中国的政党,除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外,还有八个民主党派。中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中国共产党与八个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是政治领导关系,是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关系。实行这种制度,有利于坚持和完善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有利于广泛联系和团结各阶层群众,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有利于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人民政协是多党合作的主要形式。"十六字方针"是处理党际关系的政治准则。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根本利益和奋斗目标的共同性,政党制度的优越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互动关系。

1. 党际关系的主体

中国执政党党际关系的主体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参政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成立。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 年 10 月至 1956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她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有党员 6800 多万。

八个民主党派大多是在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民主党派在政治上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它们在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共同奋斗过程中作出的历史选择。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1948 年 1 月 1 日在香港正式成立,是由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所创建,具有政治联盟特点、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祖国统一事业的政党。民革的成员主要是原国民党及与国民党有历史联系的人士,其中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科技、文教和卫生战线上的知识分子。

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民盟于 1941 年 3 月在重庆成

立,当时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 年 9 月改组,并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它是以从事文化教育方面工作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

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民建于 1945 年 12 月在重庆成立,成员主要是爱国的民族工商企业家和与他们有联系的知识分子等。主张爱国反帝、反对独裁、实现民主政治。

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民进于 1945 年 12 月在上海成立,成员主要是从事教育、文化、出版、科学和其他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为宗旨。

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农工党于 1930 年 8 月在上海创建,是以医药卫生、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界的中、高级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员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

中国致公党,简称致公党。致公党于 1925 年 10 月在美国旧金山成立,是以归侨、侨眷为主的民主党派。

九三学社。九三学社于 1946 年 5 月在重庆成立,以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医药卫生界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员。主张继承“五四”运动的民主与科学传统,反对内战,实现民主。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台盟于 1947 年 11 月在香港成立,是由居住在中国大陆的台湾省人士组成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其宗旨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一

切阴谋活动，实行人民民主制度。

2.党际关系的发展历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包含着共产党人和各民主党派艰辛的理论探索和不懈的实践活动，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政治发展相结合的一大创造。

共产党关于多党合作制度的理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中共成立之时，就遇到了如何对待其他党派的问题。1922 年 6 月 15 日，中共中央发表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就明确提出“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系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①]。中国共产党认为，在整个新民主主义过程中，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它积极提倡和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治上团结各民主党派，在政权建设上同民主进步人士合作。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做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对多党合作制度理论作了系统完整的阐述：“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9 页。

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①这可以说是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多党合作制度理论的一个总结，构筑了中国多党合作政权和党际关系的基本框架。中国共产党对于多党合作政党制度不仅在理论上进行探索，而且付诸实践。如在抗战时期在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的“三三制”政权。所谓“三三制”就是指中共中央在政权建设中人员构成上规定的一个分配原则，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②。“三三制”政权是对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彻底否定，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权中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开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以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标志形成的。会议确定中国共产党采取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方针，同时各民主党派承认并接受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和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地位。

各民主党派从成立之日起，就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统战政策的影响和指导下，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并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使这种关系得以逐步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共同进行推翻三座大山的伟大斗争。抗战时期，各民主党派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分裂、倒退而斗争；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他们同共产党一起，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页。

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为和平民主而奋斗，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刻，各民主党派公开支持人民革命，同共产党一道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而奋斗。随后，各民主党派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民主政府的号召，其领导人陆续进入解放区，宣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中共一道筹备新政协，参与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于 1949 年 9 月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后，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以《共同纲领》为共同政治基础，进行了向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当前，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共同纲领和目标，就是要全面贯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半个多世纪中，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参与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积极发挥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作用，从而使我国既保持了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又创造了活泼和谐的民主氛围。

3. 党际关系的基本方针

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简称十六字方针。其基本精神

是: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长期合作,进一步扩大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作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这个方针的形成有一个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内,有一部分人对民主党派继续存在的意义和作用缺乏清醒的认识,认为民主党派已经完成了所担负的历史责任,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明确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①随后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定了这一方针,形成了多党合作政党制度的基本格局。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国内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民主党派的性质也发生历史性变化,各民主党派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198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这个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发展和完善。所谓"长期共存",是指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长期合作中共存。周恩来认为:"共产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直到社会发展到了不需要政党的时候为止。"②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②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0页。

所谓"互相监督",是指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在合作中互相提意见,作批评。毛泽东认为:"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①]"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思想。"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则生动地表述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之间彼此信任、真诚合作的关系,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是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下的兄弟党和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它与资本主义条件下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党派之间的竞争和斗争关系具有本质差别,体现了中国政党制度的优越性。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丰富和发展了多党合作理论。1998 年底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标志着中国多党合作政党制度开始迈入制度化和规范化轨道。1992 年中共十四大把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并写入党章。1993 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了宪法,把这项政党制度作为国家意志纳入了法制轨道。1997 年中共十五大把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纲领

①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35 页。

的主要内容。2002年中共十六大重申要“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①。同年12月，胡锦涛走访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时强调：“必须始终不渝地发挥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优势”②，表明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和完善这项基本政治制度的决心。

4. 党际关系的历史方位

方位，就是方向和位置。古人认为，“辨方位而正则”。方位清，则方向明；方位不清，则方向不明。因此，明确自身所处方位，对于人们决定何去何从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历史方位，是一种事物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客观状况。重视党际关系的历史方位，就是为了明晰党际关系主体所处位置，促进党际关系的和谐发展。把握中国执政党党际关系所处的历史方位，是保证党际关系的发展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的一大关键，是决定中国政党制度根本走向的一大关键。

在2000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第十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我国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在于：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这20个字，是对我国政党制度基本特征的科学概括，也是区别于一党制、多党制的本质属性和显

---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② 《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和凝聚起来万众一心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宏伟目标》，《人民日报》2002年12月29日。

著特点。这个概括，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性质，弄清我国政党制度与西方多党制和其他政党制度的区别，加深对我国政党制度的先进性、优越性的理解。这个论断，是对中国执政党党际关系的科学界定，也是中国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

党际关系的前提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在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中，共产党领导是基本前提，也是各民主党派的自觉选择。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持多党合作的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使各民主党派在与共产党的团结合作中不断取得历史性的进步，才能同心协力地把共同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至于如何领导，《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明确指出："中共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

各民主党派是与共产党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而不是反对党或在野党。这是由我国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在政治目标和根本利益上具有一致性所决定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权中是参政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它们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中共通力合作、

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祖国和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实质是团结合作。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挚友、诤友关系，是参政党与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亲密团结、合作共事的关系，而不是多党竞争、轮流执政、互为对手、彼此倾轧的势不两立关系。这种团结合作关系，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共同政治基础上加强团结合作，通过平等协商形成科学决策，集中力量办大事；也有利于避免多党竞争、互相倾轧造成的政治动荡和一党专制、缺少监督造成的种种弊端。这种党际关系与以竞争为特征的西方多党制党际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5.党际关系的运作机制

党际关系的维系和发展要靠一定的运作机制来保障。中国执政党党际关系的运作机制主要有政治协商、合作共事和互相监督三种形式。

(1)政治协商

政治协商是对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进行协商，并就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其主要内容包括国家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制度民主法制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重要方针和重要部署，“政府工作报告，国家财政预算，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重大事项，国家的重要法律草案，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家领导人人选，国家省区行政区划的变动，外交方面的重

要方针政策，关于统一祖国的重要方针政策，群众生活的重大问题，各党派之间的共同性事务，政协内部的重要事务以及有关爱国统一战线的其他重要问题”[①]。政治协商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实现多党合作的重要组织形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之前，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职权，在1954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之后，人民政协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代表进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机关。政治协商的形式主要有：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主席会议、常务委员专题座谈会和各专门委员会会议。二是中国共产党召集的协商座谈会。它由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邀请，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及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参加。举行的形式主要有民主协商会、谈心活动、座谈会。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也可以就国家大政方针及其他重大问题，约请中共中央负责人进行交谈。这些协商形式，已经逐步发展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种惯例和制度。

(2)合作共事

合作共事是执政党党际关系所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吸收各民主党派的部分成员到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中担任领导职务。《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

① 《人民日报》，1995年1月15日。

意见》规定：要保证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在全国人大代表，地方人大代表中占有适当的比例。应采取切实措施，选派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国务院及其有关部委和县以上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领导职务。推荐符合条件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检察、审判机关的领导职务。除了选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政府领导职务外，在处理党际关系时还可采取以下措施：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召开全体会议和有关会议讨论工作时，视需要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列席；政府及有关部门可聘请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兼职、任顾问，或参加咨询机构，也可就某些专题，请民主党派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可就专业性问题同民主党派对口协商，在决定某些重大政策措施前，组织有关民主党派座谈，征求意见；聘请一些符合条件和有专门知识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特约监察员、检察员、审计员和教育督导员等。

同时，在人民政协中要注意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在政协的各种会议上切实保障政协委员有提出批评的自由和发表不同意见的自由。保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政协常委和政协领导人中占有一定比例；在政协会议上，民主党派可以本党名义发言，提出提案；政协各专门委员会要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政协机关中应有一定数量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专职领导干部。

（3）互相监督

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互相监督是执政党党际关系的重要形式。“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

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①]。

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监督，包括政治、思想和组织诸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决定，各民主党派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尽管在组织上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之间是独立的，不存在上级与下级的从属组织关系，但在组织上各民主党派也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监督；在思想上的监督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要求各民主党派应自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执政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学习时事政治，真正使各民主党派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起来。

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监督，是党际关系互相监督的另一个方面。中国共产党除了需要进行党内监督和接受群众监督之外，还要接受民主党派的监督。毛泽东指出：“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②]邓小平则认为：“共产党总是从一个角度看问题，民主党派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出主意。这样，反映的问题更多，处理问题会更全面，对下决心会更有利，制定的方针政策会比较恰当，即使发生了问题也比较容易纠正。”[③]《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对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提出了总原则：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扬民主，广开

①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35 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35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73 页。

言路，鼓励和支持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各项工作提出意见、批评、建议，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且勇于坚持正确的意见。监督的形式可以通过政协的各种会议提出建议、向政协会议提出议案的形式，也可以通过政协委员视察、举报以及其他形式提出批评和建议。

6.党际关系的建设

执政党的党际关系重在建设。中国执政党党际关系的建设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①]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全党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胡锦涛强调：“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指引我们胜利前进的伟大旗帜。”[②]无论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无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都要完整准确地把握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

①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 页。

② 胡锦涛：《在邓小平同志诞辰 10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 年 8 月 23 日。

的科学体系、精神实质，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上继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2）坚持和改善执政党的领导

中国执政党对参政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要把这种领导落到实处。首先，要正确认识政治领导的内涵。政治领导是前提，就是执政党和参政党坚持共同的基本政治原则。政治方向是保证，就是执政党和参政党由共同奋斗目标所决定的前进方向。重大方针政策基础，就是执政党和参政党在坚持基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过程中，经过充分协商所制定的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基本政策。其次，脚踏实地，精诚团结，把政治领导的原则落到实处。第一，执政党要依靠党的正确纲领、方针路线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影响提高各民主党派及其成员，把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实现共同目标和任务而奋斗。第二，执政党要与参政党平等协商，认真听取意见，集思广益，接受监督，寓党的领导于协商过程之中，使党的政治主张和路线方针政策成为各参政党的共识，变为共同奋斗的自觉行动。第三，执政党要充分尊重和照顾参政党及其成员的利益，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和具体要求，坚持真诚服务，切实帮助他们排忧解难，解决实际问题，这是新形势下党际关系增强凝聚力和感召力的重要途径，是实现党对参政党领导的不可缺少的条件。第四，执政党要对参政党的有关人士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既要讲团结、合作、友谊、人情，又要有善意的帮助和教育，在政治思想上给予民主

党派积极、真诚的帮助。

(3)支持参政党加强自身建设

支持参政党加强自身建设,是执政党党际关系发展的必然要求。党际关系是以参政党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的,参政党自身建设水平影响和决定着多党合作的水平。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党际关系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给参政党自身建设提出许多新的课题,参政党的自身建设显得日趋重要而迫切。2000年12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决定》强调,要协助参政党加强自身建设。这对于参政党在开放性、多样性的社会环境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更好地履行参政党的职能,加强自身建设,搞好党际关系,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支持参政党加强自身建设,首要的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要推动领导班子成员学理论,讲政治,不断增进对中国执政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的共识,增进对党际关系的共识,增进对全党工作大局的共识,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他们能够从政治上观察问题、判断形势,在事关大局、事关政治方向以及根本原则问题上,是非分明,保持清醒头脑。采取有效措施,加强他们的实践锻炼和政治训练,扩大他们的政治影响,丰富他们的政治经验,提高他们的领导水平和参政水平。

加强思想建设,是支持参政党搞好自身建设的中心环节,重点是巩固和发展参政党与中国执政党长期合作的思想政治基础。要把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根本任务,增强参政党成员贯彻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自觉性,深

化对参政党地位、性质和历史使命的认识，自觉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加强参政党的组织建设，主要是推动他们按照1996年《关于民主党派组织发展若干问题座谈会纪要》和1999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加强自身建设若干问题座谈会纪要》的精神，把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参政党成员队伍和党派领导层当作一项刻不容缓的重大政治任务来抓，加大参政党中青年领导干部的培养和选拔。同时，在组织发展工作中，要注意引导参政党坚持政治标准，注重政治素质，建立健全组织发展程序，严格把好入口关，防止片面追求年轻化、单纯追求数量的倾向。此外，要积极协助参政党加强机关建设和基层组织建设。

执政党在支持参政党加强自身建设中，还要积极帮助改善工作条件，进一步解决编制、经费等实际困难，使他们更好地履行职能、发挥作用。

(4)加强制度建设

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和长久性，党际关系的坚持和完善应该建立在制度完善健全的基础上。1989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总结了中国执政党与参政党几十年来团结合作的历史经验，明确了我国多党合作的基本准则和进行政治协商、互相合作、互相监督等的内容和程序，是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和完善执政党党际关系的纲领性文件。2000年12月江泽民在第十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决定》都指出："建立健全配套

措施，使多党合作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加强多党合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就是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根据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对各地在多党合作中的好做法、好经验进行总结升华，上升为政策和制度规范，形成与此相适应、相配套的政策、制度体系。

在实际工作中，要在政治协商、合作共事、互相监督的各个方面都坚持规范化和制度化。政治协商要做到明确政治协商的内容、规范政治协商的程序、提高政治协商的效力，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法规的制定，各级人大、政府、政协和司法机关等方面领导人选的确定，应征求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并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合作共事要做到规范化和制度化，注意安排参政党担任实质工作和正职人数的比例，在程序上体现平等精神。互相监督的重点主要是参政党对执政党的监督。要健全监督机制，进一步加大民主监督的力度。由于党际关系之间的监督往往通过提意见、建议和批评的方式来进行，不具有强制性，监督效力一般不高。为此，可以考虑根据监督的不同范围和内容，使一些监督逐步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提高监督的效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2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第2版。

4.《列宁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邓小平文选》第1—3卷,人民出版社。

7.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8.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

9.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

10.《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1.《江泽民重要论述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2.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学习江泽民党的建设思想十五讲》,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

13. 张全景主编:《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 全面加强和改

进党的建设》,党建读物出版社 2001 年版。

14.《〈共产党宣言〉与全球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15.许征帆:《时代风云变幻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16.庄福龄主编:《马克思主义史》第 1—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17.秦宣主编:《邓小平理论研究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18.周新城主编:《越南、古巴社会主义现状与前景》,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19.周新城、关雪凌等:《苏联东欧国家的演变及其历史教训》,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20.春阳:《科学社会主义专题讲座》,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21.江流主编:《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青岛出版社 2001 年版。

22.刘林元、姚润皋主编:《跨越世纪的征途》,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23.冯国权:《中国共产党与跨世纪民主政治建设》,国防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24.求是杂志政治编辑部:《立党之本 执政之基 力量之源》,红旗出版社 2000 年版。

25.蔡长水:《党的建设历史经验与热点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1 年版。

26. 刘海藩、杨春贵主编:《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7 年版。

27. 朱汉国:《中国政治制度史》,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28. 程汉大:《英国政治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29. 赵明义主编:《当代社会主义》,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30. 陆庭恩、刘静:《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和政党制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31. 田为民、张桂琳:《外国政治制度理论与实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32. 周淑真:《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33. 李映洲:《外国政府制度》,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34. 时和兴:《关系、限度、制度: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35. 王浦劬、徐湘林主编:《经济体制转型中的政府作用》,新华出版社 2000 年版。

36. 刘春:《发达国家议会制度》,时事出版社 2001 年版。

37. 吴振坤主编:《20 世纪共产党执政的经验教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2 年版。

38. 林尚立:《政党政治与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39. 陈德成主编:《中东政治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40. 杨德山:《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学说》,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41. 王正泉主编:《剧变后的原苏联东欧国家》(1989—1999),东方出版社 2001 年版。

42. 李君如:《"三个代表"思想教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2 年版。

43. 张立昌:《党的建设的主题》,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44. 张健雄:《荷兰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

45. 张立平:《美国政党与选举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46. 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

47. 周民锋:《西方政治制度比较》,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48. 吴大英、杨海蛟主编:《政治关系论》,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49. 江金权主编:《"三个代表"与党建理论的新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1 年版。

50. 萧超然、晓韦主编:《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51. 李铁映:《论民主》,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52. 王邦佐等:《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53. 马啸原:《西方政治制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54. 李慎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55. 荣敬本、高新军主编:《政党比较研究资料》,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版。

56. 刘东国:《绿党政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年版。

57. 王绍臣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58. 蒋锐:《东欧人民民主道路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59. 王晓民主编:《议会制度及立法理论与实践纵横》,华夏出版社 2002 年版。

60. 吴必康主编:《美英现代社会调控机制——历史与实践的若干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61. 李景鹏:《权力政治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62. 顾俊礼主编:《西欧政治》,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63. 张全新主编:《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64. 宋士昌、王晓明:《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执政党

建设论》,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65. 魏泽焕主编:《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及其发展》,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66. 毛寿龙:《政治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67. 郑永廷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68. 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对制度的经济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69.《兴衰之路——外国不同类型政党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当代世界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2 年版。

70. 卢先福、端木婕:《中国执政党建设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71. 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72. 王长江:《世界政党比较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6 年版。

73. 王长江:《政党的危机——国外政党运行机制研究》,改革出版社 1996 年版。

74. 王长江、姜跃等:《现代政党执政方式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75. 刘战主编:《实践"三个代表" 巩固执政地位——苏共丧失执政地位的教训与启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1 年版。

76. 王邦佐、李惠康主编:《西方政党制度社会生态分析》,

学林出版社 1997 年版。

77. 郭定平:《政党与政府》,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78. 林勋健主编:《西方政党是如何执政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1 年版。

79. 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2 年版。

80. 梁琴、钟德涛:《中外政党制度比较》,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

81. 王惠岩主编:《政治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82. 刘靖华等:《政府创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83. 王长江主编:《世界政党比较概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3 年版。

84. 刘炳香:《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3 年版。

85.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 2002 年版。

86. [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等:《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

87. [美]梅尔·格托夫:《人类关注的全球政治》,新华出版社 2000 年版。

88. [美]丹尼斯·朗:《权力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89. [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 1989

年版。

90.[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91.[美]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8 年版。

92.[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 1998 年版。

93.[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 1999 年版。

94.[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 1989 年版。

95.[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96.[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97.[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2 年版。

98.[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 1998 年版。

99.[美]卡尔·博格斯:《政治的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100.[匈]玛丽亚·乔纳蒂:《转型:透视匈牙利政党——国家体制》,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101.[美]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领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102.[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03.[美]塔尔科特·帕森斯、尼尔·斯梅尔瑟:《经济与社会》,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104.[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105.[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106.[法]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107.[美]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08.[美]莱因哈特·本迪克斯:《马克斯·韦伯思想肖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09.[美]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110.[美]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111.[美]利普塞特:《政治人》,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112.[美]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13.[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14.[美]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115.[美]伊恩·罗伯逊:《社会学》(下),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

116.[美]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117.[美]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

118.[美]理查德·K·斯克尔:《现代美国政治竞选活动》,重庆出版社 2001 年版。

119.[英]佩里·安德森、帕屈克·卡米勒主编:《西方左派图绘》,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120.[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华夏出版社 2001 年版。

121.[意]萨尔沃·马斯泰罗内主编:《当代欧洲政治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122. Anthony F. Heath, Roger M. Jowell, John K. Curtice. The rise of New Labour : party policies and voter choices Oxford [UK]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23. Basingstoke, Party and government : an inquiry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s and supporting parties in liberal democracies. Hampshire : Macmillan Press, 1996.

124. David R. Mayhew, Divided we govern : party control, lawmaking, and investigations, 1946—1990,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25. J. P. Monroe. The political party matrix: the per-

sistence of organization, Albany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

126. J. A. Downie, ed., Party politics London : Pickering & Chatto, 2000.

127. Jaap Woldendorp, Hans Keman, and Ian Budge, Party government in 48 democracies (1945—1998) : composition, duration, personnel, Dordrecht, Netherlands ; Boston :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0.

128. Kudryavtsev V. N., Sogrin V. V., editor-in-chief, The Party and perestroika, Moscow : "Social Sciences Today" Editorial Board, Nauka Publishers, 1990.

129. Kurt Richard Luther and Kris Deschouwer, Party elites in divided societies : political parties in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1999.

130. M. J. Laver and Ian Budge9eds., Party policy and government coalitions basingstoke : Macmillan, 1992.

131. Margaret Pemberton, Party in Peking, North Yorkshire : Magna Large Print Books, 1993, 1987.

132. Maureen Moakley, Party realignment and state politics, Columbus :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33. Mervyn Matthews, Party, state, and citizen in the Soviet Union :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Armonk, N. Y. : M. E. Sharpe, 1989.

134. Paul Allen Beck, Frank J. Sorauf9ed., Party politics in America New York, NY : HarperCollins, 1992.

135. Paul G. Lewis, ed. , Party development and democratic change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 the first decade , London ; Portland, OR : Frank Cass, 2001.

136. Peter Mair, Party system change : approaches and interpretations, Oxford : Clarendon Press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37. Richard S. Katz and Peter Mair, Party organizations : a data handbook on party organization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1960－1990 London ; Newbury Park, Calif. : Sage Publications, 1992.

138. Robert Williams, Party finance and political corruption,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 Macmillan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University of Durham ; New York : St. Martin's Press, 2000.

139. Shaun Bowler, David M. Farrell, and Richard S. Katz, Party discipline and parliamentary government, Columbus :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后　　记

拙作《执政党论》一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就。尽管我在论文开始时已做好了知难而进的心理准备，但是随着写作之进展，理论之跋涉，还是越发感到科学地把握和驾驭该论文之困难远非想象的那种程度。由于执政党理论博大精深，各国各类执政党实践千差万别，我在谋篇布局、理论阐释、材料取舍、比较研究、结论的演绎和归纳等方面，都进行了慎重的考虑。论文的主旨是在对各国各类执政党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探寻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论证执政党的执政机制，探讨执政党的执政规律，从而加强中国执政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感时时萦绕在我的心头，加之本论文选题的重要性及该问题本身的奥妙，总是令我心存使命，兴趣盎然。但是，由于本人才疏学浅，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时常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总有一种诚惶诚恐的感觉。

所幸的是，我的导师沈云锁教授对我耳提面命，帮助我克服了论文写作中遇到的所有疑惑。这篇博士论文从选题、立意到谋篇布局、直至撰写和修改，导师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劳动。导师高尚的人品、渊博的知识、诲人不倦的教风和严谨

的治学态度，深深地感染着我、激励着我、鞭策着我。师恩浩大，难以言表。惟愿我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不断进取，踏实做人，奉献社会，以不辜负导师的教诲和厚爱。

十分感谢秦宣教授、叶卫平教授对论文选题、文章结构安排及主要观点等方面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著名教育家霍懋征先生对我的殷切关怀和谆谆教导；感谢张怀西先生、钟哲明教授、李克富先生多年来所给予的帮助和教诲；感谢许征帆教授、梁树发教授、段忠桥教授、吴潜涛教授、刘建军教授、赵汇教授、陈登才教授、刘林元教授、刘玉芬教授、周建明教授、龚廷泰教授、公丕祥教授、文晓明教授、王小锡教授等专家学者所给予的学术惠顾；感谢陈凌孚先生、杜文生先生、王德忠先生、陈先奎先生、安宇先生、高中华先生、黄震云先生、沈正平先生、朱传耿先生、朱悦龙先生、龚锡恩先生、夏志方先生、沙飞鹏先生、谭庆璘先生、成潮先生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感谢曹招根博士、李大勤博士、杨德山博士、王明进博士、马先辉博士、吴安春博士、祁松博士、谢德明博士、李善良博士、蔡道通博士、李义松博士、周显信博士、田崇雪博士、胡瑞仲博士等朋友所给予的帮助和鼓励；感谢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00级博士生班这个优秀班集体全体同学的帮助和支持；感谢我的师兄弟(姐妹)们的关照和帮助。感谢诸多给我鞭策与帮助的师长和友人！

感谢我所在单位徐州师范大学的组织和领导，是他们给我提供了进一步学习深造的机会；感谢我曾先后工作过的徐州师范专科学校、徐州师范大学二部、教务处的有关领导和老师，是他们对我的学习给予了理解和帮助；感谢我现在任职和

任教的徐州师范大学科文学院、法政学院的领导和老师，是他们为拙作的完成提供了精神鼓励和时间保证。我衷心感谢徐州师范大学——这一给我学术给养和事业发展的殿堂！

我家的老老少少对我的支持与期望，是我所难以忘怀和感动的！我的妻子彭霞女士一直默默地支持着我的学业。她对我已达耄耋之年的父母无微不至的孝敬，对幼女辛勤的抚育，为该书的完成所提供的最大的理解和支持，常常令我非常感动。我对她表示深深的谢意！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江苏省重点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术著作出版资助专项资金资助。沈云锁教授、崇庆余教授欣然作序，体现了对后学的殷切关怀之情；江苏省委宣传部理论处的王建润同志、中共党史出版社的一青研究员为该书的出版给予了悉心帮助和支持，在此谨向他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拙作难免有许多疏漏与不足，敬请师长和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权伟太

2004 年 9 月